

的動亂中

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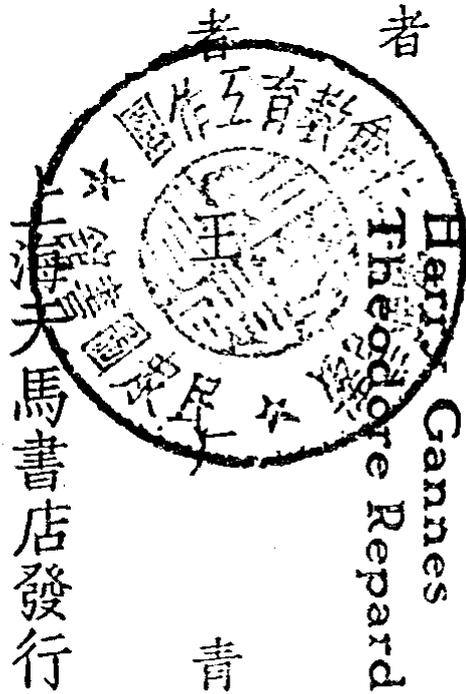
8042

SPAIN IN REVOL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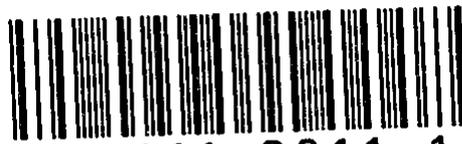
動亂中的西班牙

原著者

譯者



青



3 0661 2811 1

目次

第一部

一、	大騷動·····	一一五
二、	革命的歷史根源·····	六一一八
三、	從諸波旁王朝到諸民主政府·····	一九一二八
四、	完善的民主政府·····	二九一三七
五、	法西斯的威脅·····	三八一四五
六、	在敵人手中的民主政府·····	四六一五八
七、	十月暴動·····	五九一七一
八、	異教裁判所重生了·····	七二一八三
九、	人民陣線·····	八四一九一

十、	勝利和陰謀·····	九二—一五
十一、	內戰的幕後·····	一六一—一四三
十二、	世界大戰的隱現·····	一四四—一六二
十三、	人民陣線的政府·····	一六三—一七二

第二部

十四、	革命的經濟根源·····	一七三—一八五
十五、	無土地的人民·····	一八六—一九六
十六、	西班牙的教會·····	一九七—二〇五
十七、	軍官階級·····	二〇六—二一五
十八、	國內民族問題·····	二一六—二二七
十九、	勞動運動·····	二二八—二四〇

二十、結論……………二四二—二四六

附錄

一、各政黨表……………二四七—二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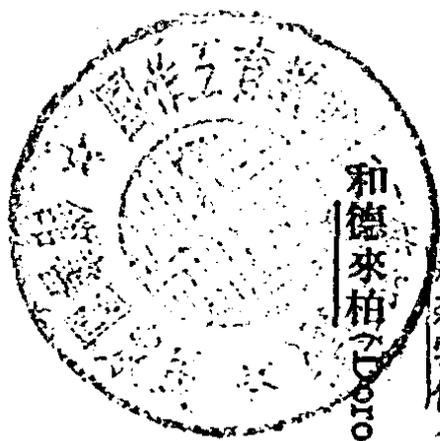
弁 言

西班牙在目前是十分重要的。同時釋明變叛的歷史根源的文章，無論是可信或不可信的，都感到十分缺乏。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第二次民主政府成立以後的一個時期，尤其爲人所忽略。近代西班牙問題的現有文獻是極度的有限和不夠的，連在西班牙文中也是這樣，在英文中尤其如此。一九三三年以後的西班牙歷史，在任何文字中，都不曾有過一次一貫的，有系統的敘述。

我們編本書的目的，大半在於釋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法西斯叛變的最近背景。其次對冗長複雜的西班牙史，也做一點通盤評判的工作。爲此理由，一九三一年以後的時期，在本書中要佔最大的篇幅。最近五年來，我們一部分的日常工作，就是追隨着西班牙的發展。

羅森勃倫 (Herbert Rosenblum) 弗里曼 (Minerva Friedman) 羅斯 (Pearl Roth) 和德來柏 (Dorothy Sapan Draper) 諸先生爲本書搜集材料和幫忙，我們特此誌謝。

著 者



第一章 大騷動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發生的法西斯和保皇黨的聯合叛變，把西班牙衝進了歐洲政治的激流。現在西班牙無論發生什麼事件，歐洲立刻會有反響，並且更進而影響全球。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班牙侍得避免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却大有由她引起的可能。意卑里亞半島在世界上一向是個不重要的因子，現在却急起直追，以求補償。西班牙已成了一個樞軸，在最近的將來，世界可在這個樞軸上轉到法西斯的一邊，或者轉到民主的一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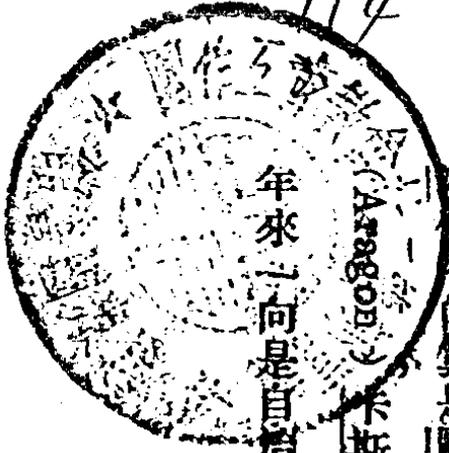
使西班牙和歐洲隔離的不單是庇里尼斯山脈，同時還有經濟落後的深淵。西班牙是在歐洲，但不能算是歐洲的。山脈把全國分成許多孤立的省分，鐵道和公路的聯絡還不充分。亞拉岡 (Aragon) 卡斯提爾 (Castile)，葡萄牙，加泰隆尼亞 (Catalonia)，那瓦拉 (Navarra) 數百年來一向是自治省。葡萄牙現在已經是一個標準法西斯獨裁的獨立民族了。



(南)

746.128

114



除法國外，西班牙是歐洲疆土最大的國家。它的二四、五八三、〇九六個人口，分布是很不均勻的。每方哩的人口密度相差得很大，巴塞羅納（Barcelona）周圍的工業中心每方哩有六八四·二人，同時沙立亞（Soria）僅有三九·七人。它佔意卑里亞半島的十三分之十一。其餘的十三分之二就是葡萄牙。它有一九〇〇、五〇方哩面積，加上巴利阿利（Balearic）羣島和加那列（Canary）羣島，一共有一九六、六〇七方哩。這樣它的大小約當大不列顛的兩倍，比紐約、紐澤稷（New Jersey）、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俄亥俄（Ohio）和印第安納（Indiana）諸州面積的總和還要大些。

遊歷家和社會學家都看到西班牙是一個極度對立的地方。有阿爾卑斯山般莊嚴高聳的山脈與巨大的流域和平原對立。低地有些是美麗嫩綠的田野。有些却是乾燥得像沙漠般的荒土。在人民中，也有同樣矛盾的對立。身擁巨大地產，財富驚人的地主和封建貴族，與數百萬無地耕種的農民相隣地住着。教會內部也有劃然的鴻溝，和乞丐差不多的教區牧師在那些財富驚人的主教邸宅的餘蔭下生活。在軍隊中，上級軍官的俸給很高，士兵的所得却不足一飽。在文

化上，對立也同樣地尖銳，西班牙有世界聞名的學者，科學家，作家和智識上的領袖，而同時却有百分之四五·四六的人口是不會讀書寫字的。

西班牙地理上的位置在歐洲是最重要的。意卑里亞半島正位在歐非兩洲的十字路口，並且是到近東和遠東去的要道。大不列顛老早就認識了直布羅陀的地位，當它是通印度的鎖鑰，就佔取了這塊「基石」。意德兩國還在陰謀獲得那些在軍路上有同樣重要的非洲西屬殖民地，和巴利阿利羣島與加那列羣島。自從意國征服阿比西尼亞以來（那時英意幾乎開戰），地中海的霸權已成爲世界未來的一個最主要的問題。誰支配西班牙，就是誰控制了西部的入口——歐洲到地中海的大門。地中海是不列顛帝國的「生命線」，是歐洲到近東和遠東，到北非和西非的要口，是世界最重要的海道。西班牙未來的政制和社會秩序將成爲戰爭或和平的朕兆。不管它國家的政體如何，西班牙當前的基本問題是在於未完成的土地革命。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從事農業的，農業上的收入要佔總收入的一半，但農業還不會擺脫封建的枷鎖。不擺脫那種枷鎖，任何發展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社會的進步了。必須先打破封建地主的束縛，然後

農民才能變爲民主國的自由公民。現在土地仍舊是反動的地主主義，貴族政體和復辟思想的培育場所。全國人口可怕的奴隸地位仍舊繼續着。土地問題如不能解決，西班牙民族問題也就不能解決，巴斯克（Basque），加里西亞（Galicia）加泰隆尼亞諸省正在圖謀着民族自治。土地問題一天不解決，就一天起着錨的作用，拋在西班牙近代普羅列塔利亞的志望上，使它不能進步。工業在比較上不論有何進步，依舊隸屬在鄉村的落後狀況之下。安放在封建主義根基上的資本主義，正像在死屍上塗了一層濃厚的脂粉，仍舊帶着農業的半封建性質。

其他各國在歷史的前進曲有利於資本主義在封建殘址上迅速發展的時候，早已遇見過這個根本問題。法國在一七八九到九三年的大革命中已經解決了那個現在西班牙所遇到的難題。采地的地主被壓服了，土地分配給法國的農民，資本主義有了繁榮的機會。美國用着它自己的特殊方法，越過了這條道路，第一次是一七七六年的革命，以後是一八六一年的南北戰爭。在英國克倫威爾諸戰爭已完成了這個目的。其他的民族也都各不相同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在蘇聯這問題是新近才告成功的，結果創造了一種新的社會——社會主義。

西班牙如不能解決土地問題，其他迫切的教會，政治，軍事，民治，及工業與文化進步的諸問題，卻休想獲得澈底的解決。

第二章 革命的歷史根源

把西班牙革命史上的顯著形態先加一番草草的涉獵，對一九三六年的內戰的認識上當然會大有助益。

遲至七二一年，西班牙的發展還和其他西歐的封建國家相像。在七二一年，回教徒的侵掠瀰漫着那個半島。直到十四世紀的中葉，接二連三的摩爾人入寇的威脅方告終止。摩爾人的最後的子孫是直到十五世紀中葉，方由格拉那達（Granada）逐出的。

摩爾人的統治和文化在西班牙的繁盛的農業上，手工業上，藝術上和科學上，都留下很深的痕跡。驅逐非洲人和猶太人的鬥爭使西班牙更加四分五裂，更加貧乏，結果遂變成了封建地主的獵物。西班牙在摩爾人統治的全盛時代共有三千萬人口，到了自主王國的衰微時代，僅僅剩了八百萬了。還有，驅逐摩爾人的延長的戰役使國內已經分野的地方主義更加顯明起來。

西班牙在光復的結束時期已經分成兩個主要的王國，一個簡稱為卡斯提爾和雷翁（Leon）王國，位在意卑里亞山脈的西邊，和瓜達拉瑪山（Guadarrama）的南面；還有一個簡稱為亞拉岡王國，位在意卑里亞山的東坡和中部的大高原上面。

從光復的完成起，到一四六九年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薩伯拉（Isabella）結婚後，卡斯提爾和亞拉岡二王國的聯合為止，西班牙是受着基督教化的統治。基督教化不單是一種宗教教育的心靈上的步驟，同時也是一種對阿拉伯文明和影響的觀念上的根除，它保證着歐洲封建諸侯的政治統治，並加速着專制政體的建立。在西班牙，專制政體雖然從未建立，教會的完全治權却已有了卓異而經久的成功，教會任務的重要，本來是侵掠中的回教徒的特性，不料這種特性却在西班牙的地土中生成了很深的文明上的根株。對摩爾人的和猶太人的宗教殘餘的根除，在殘酷可怖的異教裁判所中已經到達了頂點。

亞拉岡王國的斐迪南和卡斯提爾王國的伊薩伯拉開始了西班牙的統一。在他們的朝代中，哥倫布得了伊薩伯拉的經濟助力，竟發現了美洲。那件事展開了劫掠美洲殖民地的道路。一

味收括金銀，顯然是一種征服殖民地的寄生性質。科德司(Cotés)親口坦白地承認，他只知收括黃金和寶物，至於土人的生命代價和對阿芝特克(Aztec)文化的破壞他都不管的。征服者所掠得的財富在西班牙封建的奢侈上浪費。因為有廣遠的掠奪，封建式的行政遂得建立起來。民族缺乏團結使布爾喬亞革命的統一發展成爲困難而又延長了。

西班牙雖然在蒙特須瑪(Montezuma)礦中有黃金的源流，但因為農業和手工業的衰微和摩爾人所導入的灌溉制度的沒落，終於被擠得落後了。

斐迪南和伊薩伯拉的獨子約翰死後，西班牙的統治權就落入哈布斯堡王朝的手中，那時西班牙開始了一個悲慘的時代，全國變成了天主教反抗新教的主要戰士。這王朝中的查理士一世同時向西班牙自由的兩根柱石施行政擊：第一，他攻擊着哥德人式(Goth)的老議會，其次他攻擊着世襲自治市和選舉自治市的聯合，這些自治市從羅馬時代以來早就存在着的，差不多從未有過間斷。在一五二二年，查理士一世終於把佛拉拉(Villar)的諸自治市打倒了。過了約摸四百年之後，在一九三二年，這些諸自治市竟能掀起反對國王亞豐璜(Afonso)十

三世的怒潮。

在十八世紀中，王國的統治從哈布斯堡王朝過渡到波旁（Bourbon）王朝。這個過渡在西班牙的政治發展上是並不十分重要的。

在別處，資本主義都在開始生長了，在西班牙工業資本却發展得極度地遲緩。農業在事實上已被放棄了，人民多改營畜牧。工業受着大地主的桎梏，非常落後，因此布爾喬亞的顯身也十分遲緩。從殖民地來的財源增加了商業資本，而並不增加工業資本，這說明了商品的流通更加迅速，而生產却並不見增加。政府的官吏要佔全人口的五分之一。障礙的因子普遍地蔓生起來，那就是教會和軍隊，同時胚胎中的布爾喬亞却成熟得很遲。在這時期中別國的布爾喬亞都已經站在革命的前線了。一八一二年所訂的烏得勒支（Utrecht）條約把西班牙的衰微暴露無遺，實際上已成了英國的屬國。

直到一七一四年，半島中最前進的工業區加泰隆尼亞方被征服。加泰隆尼亞是西班牙的威尼斯（Venice），是一個繁盛的商業民主國。它和東方、非洲及歐洲其餘的地方進行着貿易。

它有發達得很早的工廠。因此到了現在，加泰隆尼亞和西班牙其餘各地比較起來，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要比較高些；那裏勞動階級已告成熟，民族上也有它獨特的發展，它並且負起了一種充作西班牙的愛爾蘭的任務，把反封建的鬥爭和民族解放的鬥爭配合了起來。

在過去的數百年中西班牙歷史上革命爆發的次數有不斷的增加。農民暴動接二連三地發生，雖然都無效果。限制君權，掃除封建桎梏和建立民主的運動也都源源而來。最後，在一八五四年的叛變中，近代的普羅列塔利亞竟更顯著地出現了，並且此後就站在決定的地位。因着普羅列塔利亞的加入鬥爭，就開始了大罷工和延長的叛變。民主主義的革命很迅速地完成了，社會主義的改造志望也介紹進來了。

在這些鬥爭中，布爾喬亞都不是單獨行動的。這種特性，在一九三六年的反法西斯內戰中尤關重要。在初期，前進的商人們和工業資本家們都想打破封建主義的束縛，他們和某種封建分子，如受剝削的農民或寄生的官吏結合起來。最後他們却不得不依賴普羅列塔利亞的支持和行動，或者和勞動階級實際合作。

一八〇八年拿破崙對西班牙的侵掠加速了革命的成熟，拿破崙利用了瑪德里朝廷的王族爭執，把他的兄弟約瑟（Joseph）扶上了西班牙的王位。西班牙就發動獨立戰爭來作回答。雖有庇里尼斯的高峯，結果還不足以防阻十八世紀的革命哲學從法德流入。

這次的抗戰襲取了原始而又殘酷的成分，使拿破崙的軍隊驚駭莫名。西班牙的戰士並不是正規軍，是一枝烏合的軍隊，就是一九三六年人民陣線軍隊的可敬的祖先。他們把每塊岩石當作堡壘，在每一山岩下都設着伏兵。有一個西班牙作家說，他們把牆垣改成了墳塋，把城市改成了墓地。像一次地震一樣，這次的侵掠把全國震醒，認清了民族的生存。人民在名義上是爲國王戰爭，其實對王朝都開始失掉信仰了。

雖然民黨（National Party）和非正規軍大半由浸染着天主教迷信的羣衆組成，但其中也有少數，而且是佔優勢的少數，把這次反抗拿破崙侵掠的變亂看做是一種復興西班牙的手段。這少數代表着正在興起的布爾喬亞，包含着城市的商人，早期的工業資本家，律師，醫生，作家，學生，甚至也有幾個教士。這次戰爭開始的時候，雖然是一種革命運動，但一到教會和封建財

產的物權在民族解放鬥爭中，感受到了威脅，它就變成了極度的反動了。

一個革命的指導機關，強塔斯（Tobias，西班牙的議會）或可稱為管理委員會，建立起來了。這個委員會非但不想打倒君權，反而承認了君權。當時馬克斯和恩格斯很熱切地研究着西班牙革命的每一形態。馬克斯說，強塔斯和法國的公安委員會同樣是應運而生的東西。驅逐外來侵略的必要，大有利於這個委員會的革命任務。在同樣的必要下，強塔斯還有一個很燦爛的機會，它可以在國內實行必要的方法，以打倒封建貴族和教會的特權。但是他們在這個任務上竟失敗了，他們也像其他西班牙布爾喬亞的議會一樣，不能使民主革命貫徹始終。在這個失敗中就興起了反革命的成功，民主革命遂有了代價很大的延緩。馬克斯結論着說，強塔斯非但不做工作，同時還阻止着別人的行動。

一八一二年在加的斯（Cádiz）通過的憲法也是一個失敗。斐迪南七世終於能在一八一四年五月四日解散國會，廢止憲法。國會中最活動的議員都被判處流刑，或被罰作船上的苦役，或被禁錮於非洲的監獄。

對美洲殖民地的叛變的鎮壓引起了第三次軍事性質的革命企圖。一八一九年立哥將軍 (Rafael del Riego) 所統率的遠征軍在加的斯叛變了。這次叛變雖然在加里西亞、伐朗西亞 (Valencia)、薩拉哥撒 (Zaragoza)、巴塞羅納和帕爾馬 (Pamplona) 諸省引起了嚴重的反響，但終於是失敗了。

一八二〇年，西班牙因為王黨和民主同盟之間互決雌雄的鬥爭所引起的騷擾，俄國的沙王亞力山大一世竟向神聖同盟建議實行干涉，他並慷慨地允許用他的軍隊來完成這個目的。因為英法的反對，才得打消了這個建議。

在這同時，美洲的西屬殖民地都已成功地掙斷了他們和母國之間的聯繫，建立了獨立的政府。他們完成解放，其間也深得大不列顛的助力。不列顛看到了西屬殖民地和瑪德里的獨佔貿易的聯繫一經破裂，就是它本國商業的極好機會。南美帝國的富源一經停止流入，就加重了西班牙工業的貧乏。封建地主因為沒有了國外的收入，就轉向工農實行更凶狠的榨取。

雖然是屢次失敗，西班牙的布爾喬亞終於堅強起來了，而貴族和王族因為失去了美洲的

殖民地，反顯得軟弱起來。於是封建政府不得不應時地於一八三四年，一八三七年和一八四五年先後頒布敕令，總算已有了一個滑稽得可笑的憲法。

一八五四年左右，布爾喬亞在和王黨的衝突中，覺察了同時必須對付那個正在成熟，生長，的勞動階級。這指示出資本主義的因子已有了發展。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把全歐洲爭自由的勞動階級，逼得指示出資本主義的因子已有了發展。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把全歐洲爭自由的精神解放了出來。在政治上時常落後的西班牙的布爾喬亞却不能利用這個有利的歷史時期。權力遂致落於專制主義者，封建的天主教黨的手中。

在一八五四那個重要年代的起首數月中，勞動階級的暴動和騷擾十分顯著。六月二十八日，端納 (Leopoldo O' Donnell) 將軍率領了瑪德里的防軍舉義。他向全國民衆發出民主革命的呼籲。西班牙的工業資本家，中等階級，和一般的民主主義者，因為懼怕勞動階級，都和封建分子聯合起來，這樣他們就無異放棄了本階級的民主革命。接連着來的一八六八年的革命是軍人，進步分子和民主主義者的聯合工作，那時他們是叫做共和黨。他們領導着勞苦大衆，用盡了一切努力，想創造一個堅強持久的政府，但旋踵間也宣告了失敗。

從一八五四年到一八七〇年，西班牙的工業有突躍的進步，這增強了封建主義和新興的資本主義間的衝突，但同時也使普羅列塔利亞更成爲布爾喬亞的敵對階級，雖然他們兩方都覺得在反君主上有合作的必要。一般說來，政治狀況依然是十分混亂。

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造者馬克斯和恩格斯所領導的第一國際，在西班牙已組成了一個支部，在各大城市中都有會員。但是西班牙的運動却受着無政府主義派的操縱。那個富有煽動性的無政府主義的領袖巴枯寧（Mikhail Bakunin）自一八六八年在國際上已成爲馬克斯的死敵。他在西班牙的工人中很佔勢力。馬克斯指出，工人運動中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是一種勞動階級的隊伍中的中產階級的觀念的反映。他們主要的立足地是在那些資本主義落後的國家，在西班牙尤佔勢力，因爲那裏，資本主義和勞動運動的發展，都和別處不同。現在只有西班牙還保留着很有勢力的工團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運動，不過它的性質也已因政治的迅速進展而有過極大的修正。

自一八七一年民主國傾覆之後，薩伏衣（Pavoy）的唐·阿美提窩（Don Amadeo）登了

王位。但是西班牙四周都受着困難的包圍。它須應付古巴的革命，須應付卡羅斯黨（Carlos）的叛變，還須應付竭蹶的財政的不安。唐·阿美提窩不久就在大暴動的威脅下退位了，和一九三〇年國王亞豐瑣十三「出去散步」有些相像。此後阿美提窩就被人稱爲「罷工的國王」了。

當一八七三年用軍事政變的手段建立了西班牙的第一個民主政府的時候，巴枯寧主義者因爲蔑視政治和熱烈地反對着任何方式的國家權力，竟拒絕參加。馬克斯的同工者恩格斯曾對這事加以嚴厲的譴責。

恩格斯寫着說：「當一八七三年二月民主政府宣告成立的時候，大同盟（是一個工人佔多數的組織）的西班牙黨員都覺得處境十分困難。

「西班牙是一個在工業上十分落後的國家，因此勞動階級決不能立刻得到解放。在達到那個目的以前，西班牙必須先經過各種發展上的預備階段，和清除道路上的一切障礙。

「使預備階段的時期儘量縮短，把障礙物迅速地撥過一旁——這就是民主的供獻。但是西班牙的勞動階級只有在政治生活中活躍地參加，然後方有利用這個機會的可能。那是勞工

大眾的情緒，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對一切事件都堅決地參加，利用機會活動，決不肯像從過去直到現在的情形一樣讓佔有階級的活動和陰謀自由發展。」

工人們在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之下，不能聽從馬克斯和恩格斯兩人的勸告。他們在民主政府的政治生活中並不積極活動，並且不和進步的布爾喬亞結成聯盟。全部政權盡操在民主黨的手中；但他們是不能保持的。不久，一次軍事政變結束了西班牙第一次真正的民主國的生命。布爾喬亞不能完成革命和結束封建統治，於此又得了一個證明。

亞豐瑣王十二世所代表的波旁王朝於一八七五年恢復了王位。於是又開始了一個反君主鬥爭的新時代，這鬥爭到現代還十分劇烈。

小布爾喬亞中官僚階層對民主的熱誠都轉向到君主方面去了，在西班牙有一個有名的故事可以說明這件事實。亞豐瑣十三世加冕後，不久就到一個小鎮上去游歷，市長和其他的官吏在歡迎會上大聲歡呼。他們高叫着：「萬歲！」直到叫得臉色發青。其中有一個叫得尤其起勁。他歡呼着，號叫着，並裝着如瘋如狂的手勢。國王對他們歡迎的誠意有些懷疑起來了，他轉身向

叫得最響的那個人說：「當心，不要損壞了你的身體。」這位熱誠者回答：「啊，陛下明鑑，我身體很康健，這樣地高叫幾聲，一點也不要緊的。你還不曾聽見過我在民主政府成立時的歡呼哩！那時我竟叫斷了一根血管！」

第三章 從諸波旁王朝到諸民主國

亞豐瑣王十三世是在「死」的表象下誕生的。他是個遺腹子，在父親亞豐瑣王十二世死後六月方才出世。在一八七五年恢復過來的波旁君主國本來是動盪不安的。到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亞豐瑣十二世死後，那種不安更加重了，直到遺腹子產生為止。此後直到一九〇二年，是一個攝政時期。那時正當帝國主義迅速興起的時代，世上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各處搜刮着殖民地。最後起的美國帝國主義在它的大門口找到了幾處西班牙殘存着的島嶼殖民地。美國托辣斯征服殖民地的貪慾，是如此地受着哈斯脫（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黃色報紙的培育，他們竟揀中了西班牙做他們的犧牲。這是有兩個理由的：（1）因為西班牙是歐洲強國中最弱的一個，（2）因為西班牙的殖民地正位在楊基帝國主義通加勒比海（Caribbean Sea）和遠東約路上。

西班牙放棄了對古巴和波托里科 (Puerto Rico) 的權益，並把菲律賓和蘇祿 (Sulu) 羣島讓給美國，以作在美西戰爭中得了敗績的代價。她後來並出賣了太平洋島國中其他的片段。

西班牙的海陸軍抱頭鼠竄地回到故國。由於這次的挫折，在西班牙的智識領袖中產生了一種新的精神，表示對君主的反抗已告復活。他們以為此次的災變是應由君主政體負責的。西班牙歷史上的「一八九八年代」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一個最偉大的，最有成果的時期。

個轉變點到來了。但是因為西班牙的發展通常是受着束縛的，一八九八年高潮的充分重要性直到後來才得表示出來。西班牙資本主義的重要殖民地已被褫奪殆盡了。它就決計設法推進工業的發展和依賴國內的剝削。在以前殖民地上的資本回到本國來了，工業遂發生了部分的復甦。在西班牙的外國投資也增加了。由於工業的擴大，革命的西班牙勞動階級的勢力也伸展了。

正當其他大國藉着優越的工業，建立着整體的托拉斯和集中的金融資本的時候，西班牙

却受着喪失殖民地的打擊。西班牙是絕望地落後。靠着假借來的資本主義發光的那枝君主政體的蠟燭是決不能長時搖曳不熄的。那時，西班牙的社會黨和工團主義者也已在革命運動中顯露頭角了。

在一九〇九年左右，勞動階級在反君主的鬥爭中已開始處於領導地位了。那年在巴塞羅納的有革命性的罷工，轉變為全國的總罷工。這次罷工的直接藉口是勞動者對摩洛哥戰事的抗議。實際的原因却是勞動者對經濟條件的不滿，再加上反君主情緒的興起。經過了三天巷戰之後，政府把罷工壓服了。全國都頒布着戒嚴的律令。那位以教育活動聞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非裏爾(Francisco Ferrer)被捕了。他是教會的死對頭，會罵教會是在護育着獸性的愚蠢和迷信。在舉行了一次戰地臨時軍事法庭之後，他於一九〇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正法了。

但罷工運動却繼續增加。一九一六年三月，總工會和全國勞動協會聯合要求政府抑低生活的費用。在十二月十八日，他們號召了一次二十四小時的總罷工，強迫政府實行了很大的讓步。這兩個前進的協會又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一致同意，號召工人實行無限期的總罷



工。他們此次的目的，是在強迫統治階級應許基本的立法改善，以保證最低的生活程度。反君主政體的傾向已瀰漫了全國。連那些保王黨也批評着君主政體了，他們希望使君主政體實行現代化，以求生存。由於勞動階級鬥爭的興起，再配合着西班牙布爾喬亞對民主政體的志願，把西班牙的落後（雖然已有了些比較上的進步）和其他大國的帝國主義的迅速發展對比起來，君主政體的一切腐敗越發顯然凸出了。

西班牙通問報 (*Correspondencia de Espana*) 的主筆羅密窩 (*Don Leopoldo Rodo*) 是亞豐瑣王私人的和政治的密友，是一個熱烈的保王者。他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在給國王的一封信上寫着說：

「陸軍一點也沒有近代的品性；海軍是在港口拋着錨的另一黨派；司法不過是一班依着代理律師的意志而在法庭上聚合的倖人；教會已為那些因受知於要人而獲得聖職的人所操縱，僅能做出使小牧師變成中牧師或使中牧師變成大牧師的事情；官僚是使權力腐化的機關；預算已變成了無盡藏的寶物，向着各方傾流，只求取悅於當地的聞人 (*Local boss*)；議會是一

個消磨時間的場所。西班牙不過是一塊君主議會的采地，這議會開始的議案是容忍麵包的分量減輕，收場的議案是把一班愚人尊爲神佛。」

我們看了世界大戰發生後內閣的屢次更迭，就可知道王位是極度地不穩。從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到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三日總共更迭了十二個內閣。每一內閣都不能應付里夫的殖民地革命問題，以及方興未艾的勞動階級的鬥爭，民主主義者的騷擾和加泰隆尼亞省民族獨立的要求。

法西斯獨裁已在意大利實行了。法西斯摩 (Fascismo) 和法西斯蒂 (Fascisti) 等字時常爲人聽到了。因此，當西班牙君主國因着軍事的挫敗而趨於崩潰的時候，獨裁制就建立了起來，以作民衆的憤怒和亞豐瑣王的責任之間的緩衝。一九二一年七月間西屬摩洛哥的安牛爾 (Anual) 發生了慘案以後，民衆的憤怒已漲到了頂點。這次慘案於一日中竟斷送了一萬以上軍士的生命。結果，指定了二十一個國會議員組織委員會，以確定事變的責任。

後來，在一九二二年的夏季，由皮卡沙 (Picasso) 將軍領銜的委員會的報告書呈送上去

了。各部長官的會議立刻把它禁止發表。可是它的內容民衆已略有所聞了。其中所牽涉的，不單是文武的僚屬，連國王本人也在其內。報告書建議把摩洛哥的高級軍官和幾個在瑪德里的部長判處死刑。

民衆聽到了政府欲把皮卡沙報告書置之高擱的消息，就爆發了一次抗議的風潮。國王就把國會解散。新的選舉也不能使情形有分毫改變。這樣就爲獨裁者開了一條進來的道路。里維拉 (Primo de Rivera) 將軍就成了這時代的人物。他對君主政體是有過籠絡民衆的批評的，對摩洛哥的屠殺軍士也有過抗議的，這些都於他大有用處。里維拉的口號是「祖國，君主，宗教。」用着鐵的手腕，他壓平了那個危害着國王本身的運動。貴族，大地主，教會中佔高位的牧師，受君主恩俸的官吏和負責的軍人，在里維拉的獨裁建立之後，都透過了一口寬心的氣。

里維拉的首次內閣完全是由軍人組成的。本來，軍官們通過他們的軍事委員會，已在西班牙的政治生活中有了巨大的影響的。里維拉恐怕他們干涉政治，就用着摧毀領袖人物的政策，以褫奪他們的權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間就有一個所謂民政管理部 (Civil Directorate) 起

來代替軍人內閣，這管理部是由三個軍人和五個文官組成的。

連社會黨也受着迷惘了。社會黨的領袖在那時並沒有認識法西斯的危險，他們反對那個有妨阻里維拉的軍事運動的可能的總罷工。事實上，在後來里維拉的統治中，社會黨的領袖已接受着政府的職位。那個規模很小，而內部又鬧着黨派鬥爭的共產黨，已被迫成爲一種非法的祕密組織了。

我們如果相信和外國法西斯獨裁者的談判是於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反革命運動中才開始的，那就犯了錯誤。上溯至一九二三年，西班牙的獨裁者里維拉，爲了反對英法在直布羅陀，坦支爾和摩洛哥等地的政策，早已和墨索里尼的使者進行過會商了。里維拉的外交部長阿爾巴(San-tiago Alba) 所簽定的瑪德里條約已建立了意西兩獨裁者之間的友誼合作的基礎。那時墨索里尼究屬有否預示征服阿比西尼亞或在地中海爭霸，我們不能確知。墨索里尼派遣了許多意國有名的法西斯主義者到瑪德里去演講法西斯摩的偉績，以幫助西班牙法西斯思想的發展。這些法西斯主義者之中以摩立(Stefano Molle)最爲卓著，他於一九二六年在瑪

德里的諸次演講，是有里維拉的獨裁在後面撐腰的。

里維拉的獨裁有一個弱點，是墨索里尼和後來的希特拉所沒有的。它缺乏羣衆的組織基礎，像墨索里尼的黑衫團和希特拉的衝鋒隊。還有，西班牙的獨裁者對籠絡民衆的法西斯藝術還不會熟練。後來，勞伯爾斯（Gil Robles）來補救了這個缺點。

財政的困難，腐敗的繼續，經濟落後的加重，信任的缺乏，民主情緒的高漲——這一切使西班牙成了正在興起的經濟風潮的最易得手的獵物。舉例來說，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的蹂躪的影響，西班牙感受得比美國更早。第一次政治上的變故就是一九二九年正月間獨裁制的崩潰。

里維拉在軍隊中的主要基礎，在經濟危機和民衆不滿的巨擊下滑走了。他覺得他的統治的末日近了。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他要求軍隊對他表示信任。軍隊對他的請求却一無反響。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在里維拉個人領導下的獨裁，急劇地結束了，但國王却用盡全力，想叫次等要人，像柏累格爾（Damazo Berenguer）將軍和阿茲那（Juan Azna）大將等，來

繼續獨裁的統治。

亞豐瓊王用盡了一切方法，來救護他類於顛覆的王冠。凡有利於建立君主政府的各黨各派，他都竭力拉攏。但是民主運動却在迅速地邁進。生活程度提高了。里維拉討好於教士和軍人的努力，弄得國家的歲出加多，賦稅增高，和預算不足。幣值繼續不斷地低落。

里維拉一去，君主政體的傾覆也就不遠了。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七日民主主義的諸領袖在聖瑟罷士梯安 (San Sebastian) 的倫特來斯 (Londres) 旅館裏開會。他們在極右派的民主黨諸領袖，如柴摩拉 (Niceto Alcalá-Zamora)，後來做着一九三一年共和政府的總統，勒樂 (Alejandro Lerroux)，後來和法西斯的領袖勞伯爾斯聯 在一起，摩拉 (Miguel Maura) 等的領導之下，草成了一張公約，把一切不同的政見調和起來，以冀獲得組織民主政府的共同目的。他們依賴着全國總罷工和大部分軍隊的擁護。

格蘭 (Fermín Galán) 大佐，(一位民主主義的英雄，曾著過一本復興西班牙的唯心

主義的書，叫做「新創造」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發動了那次所謂扎卡叛亂（Jaca Revolt）

格蘭大佐和他的隨員因為看到民主的民事領袖時常使革命遷延不發，就對他們不信任起來。他們時機未熟，就首先發難，希望能把「既成的事實」擺在民事領袖的面前，然後再推促他們前進。不幸這次的叛亂是一個慘敗。格蘭大佐被捕了，軍事法庭把他宣布了死刑。在審判中，法官問他，「你有同謀者嗎？」回答是：「有的。」「他們是誰？」「就是你們自己，你們這些懦夫！」那個被判罪的大佐高叫着說。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一日國王信託以前保守黨的領袖格拉（Jose Sanchez Guerra）組織政府。格拉曾參加一九二九年的反里維拉獨裁的叛亂。他曾被判處徒刑十月，後來為軍事法庭所開釋。

但是這條詭計却於事無補。在西班牙史上最關重要的第二次民主政府已經在叩着歷史的大門了。

第四章 完善的民主政府

一九三一年的民主政府是在一種過於信任的氣概中開幕的。公衆的輿論不可抑制地要求把君主推翻。那些國王的最忠實的走卒也都相信，君主政體必須長時斂跡，以恢復力量，否則就會遇到有歷史性的全部崩潰的。

四月間的市政選舉，使民衆在八年來有了第一次發表政見的機會。合格的選民都熱烈地期待着四月十二日的到來。此次投票是要選舉八〇、四七二個市政官吏，共有十五萬候選人加入競爭，這次運動，名義上是爲了城鄉議會的議席，其實完全是一種全國的普選。每人知道「市政」選舉的中心問題是「民主和君主的抗爭」。民主黨的口號是「你們的投票必須成爲一枝射到君主政體的心房中的弩箭」。

縱然對選區加以不公平的劃分，使鄉間的代表遠超過全人口的比例，反對君主的票數仍

無疑地佔了五、四四六、〇〇〇票的多數。在省會和較大的城市中民主黨得了九七二票，君主黨僅得了五九五票。一個統治者以爲對君主主義表示忠誠的國家，在一夜之間，就宣告歸順民主了。

亞豐瑣王和他的參贊——或者不如說僅有他的參贊——深知只有武力才能支持他搖搖欲墮的王位。然向民衆施行暴力，就有引起革命的危險。君主政體是必去無疑的了。在進行中的反君主革命大有把西班牙封建的下層建築驅除淨盡的威勢。君主政體的識途老馬向國王進諫，以爲在那時對民衆施行流血的壓迫是要惹怒命運之神的。

在四月十四日下午六時四十分，亞豐瑣王和他的大臣開着最後的會議。在七時三十分，民主主義的領袖們就傳出國王讓位的消息，他們擔起政府的任務，組織了一個臨時內閣。就在那天的早晨，柴摩拉和羅曼納斯（Romanones）伯爵很狂暴地請國王於傍晚工人散工之前離位。他們婉轉地警告着亞豐瑣，「若不如是，就會一悔之晚矣」。在晚上九時，國王就乘車向法國的邊境出奔了。

亞豐瑣從未真實地放棄王位的權利。他於四月十七日所發的陳述書，表示只要法西斯或保王黨以後能獲得瑪德里的治權，他依然可以復位的。在陳述書中，亞豐瑣承認西班牙的人民已不再愛他了。他承認國王是可以做錯事的，即使退一步說，他已做了錯事，也沒有什麼要緊。隨後他忠告西班牙再會聽他的話。他說：「我是西班牙人的王，並且是一個西班牙人……我不放棄一絲一毫的權利，這權利如果說是我的權利，還不如說是一種永久的監護責任，我將來必須交帳的。」這好像不單是西班牙的土地，連統治全國的大權，波旁王朝也當作是一種永久的權利了。

臨時的民主內閣，包羅着民主社會兩黨的人材，名單如下：柴廉拉，總統；勒樂，外交；里窩斯

(Fernando de los Rios)司法；拉內務不里托(Indalecia Prieto)財政；阿爾波納茲(Alvarez de Albornoz)公用；陀名哥(Marcelino Domingo)教育；阿柴那(Manuel Azana)軍政；吉羅格(Santiago Casares Quiroga)海軍；波立奧斯(Diego Martinez Barrios)經濟；卡波婁羅(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勞工。

這第一次內閣中，多數的閣員直到七月內戰依舊效忠於民主政府。只有柴摩拉，勒樂和摩拉是無意或有意地轉向到反動的一邊。

舉國歡喜若狂。民衆的情緒正像參戰諸國在休戰日所表示的一樣。街上充滿着舞蹈的羣衆，深夜還有六絃琴的樂聲。人民唱着歌，呼着口號，飲着酒，以表示對君主出亡，共和建立的快樂。保安隊（君主時代的警察）都飾着紫羅蘭色的勳帶，那顏色是西班牙民主的標識。紫羅蘭色的徽帶，紫羅蘭色的服裝，紫羅蘭色的領帶，紫羅蘭色的旗幟。在民主的熱情洋溢中，隨處都是紫羅蘭色的標識。民衆在五十六年的君主和獨裁中受盡了束縛，一旦得到自由，就狂熱地舉行慶祝。但他們對舊政府的絞刑吏，走卒或人員却從未加以危害。在民主政府的建立中，僅有一個耶穌會的神父因跳窗受傷。

在對民主政府宣誓效忠的許多人中，就有那個穆拉（Emilio Mola）將軍在內，他那時是祕密警察的總監，那些想混進新政府的底層，以便從中陰謀破壞的人，只要宣一次誓，就可進來了。

那些最保守的政客，富有的地主，銀行家，軍人，伯爵，公爵，牧師和冒險者，知道民主政府已成了他們所欲對付的實體了，他們就很快地承認了臨時政府。

在臨時政府執政三月之後，於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就產生了一個新選的議會。臨時政府在選舉前先作了一次選民調查。投票的年齡，君主時代是規定二十五歲的，現在減低到二十三歲了。議員的數目規定在每五萬人口中產生一名，那末一共就可有四七〇個議員。在君主時代的選舉中，村鎮是處於有利地位的，現在使它和大城市及工業中心一律平等。社會黨和民主黨在選舉中佔了議席的多數，這是毫不足異的。保王黨沒有票數，右翼的各反對黨一共有六

○議席

民主政府的第二件偉大工作就是把開國志士的目的和意志寫成一部憲法。憲法，正像美國，墨西哥和蘇聯等國的基本法中所證實的一樣，是一種在革命時期產生出來的樞要的文件，能幫助決定將來的路線。西班牙的民主主義者是洞悉這些事實的，他們抱着那個目的，熬費苦心，心地推選了一個憲法委員會，並指定了阿士華(Luis Jimenez Asua)，一位負時望的青年社

會主義者，為委員長。這委員會所作成的草案全部被接受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為議會所採納和公布的第二次民主政府的憲法，至少在文字上，是一種民主革命的進步的文件。它甚至採用了社會主義的口吻。

在新憲法上，西班牙是稱為「各階級工人的共和國」。教會和政治分離了。禁止以戰爭做國家政策的工具。規定並應許了各省的權利，彷彿和美國的憲法一樣。提出了民族問題的解決。規定了法律的平等。預定在三年之後政府停止對教會的津貼。發佈命令，使敵視民主的僧職舉行登記，並加以澈底的取締。初次公布了信教的自由。應許了公權，保障了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以及審判的公開。憲法上說：「國家的一切財富，不論為何人所有，都隸屬於民族經濟利益的下面。」

憲法允許了對工人的保護。答應了一個充分的社會主義的立法程序。指出了失業、老年、殘廢、意外和死亡的保險。此外還有許多條款限制着童工，規定着最多的工作時間和最低的工資，以及對女工生產的法律。

結婚建立於兩性權利平等的基礎上面，受着國家特別的監護，父母有撫養和教育子女的義務。

政府的機構在外表上是很民主的。它有一個一院制的議會，任期四年，由全國二十三歲以上的公民，不分男女，舉行平等的，直接的，祕密的投票，選舉出來。憲法更規定設一總統，任期六年，由議會的議員和同數的民選委員聯合選舉。政府的功能大半由內閣總理和他的閣員執行。內閣受有很大的權力。

憲法反映出，在民主政府的建立中，農民並不會積極地參加。一九一七年的墨西哥憲法所具備的對土地和教會的改革，西班牙的憲法上竟付闕如。然而西班牙的土地狀況和教會統治和墨西哥却並沒有多大的不同，因為那裏的教會和大地產，原來是由西班牙移植過去的。由於地主的有力的反對。直到一九三二年九月，方才通過了一個改革土地的法案；但是土地革命却從未實行。

加泰隆尼亞先前已在麥西亞 (Francisco Macia) 上校的領導之下，組織了獨立的加泰

隆 (Catalan) 民主政府。後來於四月十九日同意改爲一個半自治的省分，由駐在巴塞羅納的自治政府 (Generalidad) 統治。

臨時政府的總統柴摩拉當選爲第一任總統。在一九二三年以前，柴摩拉還是一個保王黨員，後來反對里維拉的獨裁才改進了民主黨。這位身材短小，鬚髮斑白的安達盧西亞 (Andalusia) 的律師，已有了五十四歲年紀。他是個富有的地主，在他的本鄉哥爾多華 (Priego de Cordoba) 附近，有一分地產。在他做總統的時期中，他反對分配貴族和地主的田地，反對取消僧職，又反對把保王黨和里維拉統治的維護者實施裁判。一九三一年的初頭，梵諦岡 (Vatican 教庭) 宣布着說，只要柴摩拉在位，西班牙的一切事件都無須擔憂的。他爲自己獲得了一個和王者一般的境遇，每年的俸金有二百萬貝沙太 (Peseta 西幣名)。

西班牙的共產黨是和民主黨處於反對的地位的。它雖然是在一九三一年民主政府組織的前後，指揮着普羅列塔利亞的力量，參加反君主的運動，它却反對社會民主兩黨的聯合，它以爲只有工農聯合的民主政府才能解決德謨克拉西的革命。西班牙的共產黨是在一九二一年

組成的。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一年，在里維拉的獨裁下，它是一個非法的組織。它黨內又時常鬧着鬥爭，其中最嚴重的就是安得烈斯寧（Andrés Nin）所領導的托羅斯基派的叛黨。共產黨不久就改正了和民主政府遠離的錯誤。在一九三一年六月的選舉中，全國七十個選區內，已有十一個有了共產黨的候選人。它所得的票數雖然僅有六萬，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它的票數就增加到四十萬了。在民主政府成立以前，它僅有一千黨員，不久以後就增加到三萬了。

正像一九三六年五月法國勃倫政府開幕後的情形一樣，西班牙民主政府的成立竟成了普及全國的罷工運動的信號。工人覺得君主的束縛已經崩潰，並受着新獲得的自由的戟刺，就開始加強他們工會的組織，向僱主要求增加工資了。

第五章 法西斯的威脅

當民主政府宣告成立的時候，一切承襲過來的利益都在散亂和狼籍之中。君主政府差不多是腐敗得不打自倒的。伏士（La Voss）那時誇着口說，「新政府出世，不會流過一滴鮮血。」軍隊是動搖的。里維拉和柏累格爾兩位將軍也表示出他們對壓制革命的無能。教會、地主和資本家都弄得手足無措。

但是新產生的民主政府不能或不曾善用它起頭的有利地位。當權的民主政府懼怕崩潰的反動派，比反動派懼怕民主政府還要利害。幾個比較頑惡的敵人雖已被迫出亡，但是舊的秩序却仍舊保存着，期待着第二次的暴風。

新憲法之下的言論自由，意思就是指保王黨、貴族和高級教士有用一切惡詞譏蔑民主政府的自由。舊勢力所獲得的言論和集會自由，比共產黨和無政府黨所獲得的還要多些。在議會

內部並有着保王黨，教士和貴族的代表。

政府畢竟僅有了上層的改革。鄉村的生活仍和以前一樣。軍隊的數量雖已減低了，但軍官階級却依舊保留着。在每一重要的問題上，清算的日子都怯懦地延宕着。

新政府的各種改革僅能激怒反動派而不曾解除他們的武裝。一切改變都是程度上的改變，而不是種類上的改變。裁減軍備是改革中的代表那些被裁的軍官（仍舊領全薪的）都矢志復仇，同時那些在位的仍舊組織着舊式的軍人會。民主主義者只要走錯一步，時代就會迅速地倒退的。

在混亂和衝突的波動中，右派的代言人出現了，他們對備戰的反動派的慫恿，正像希特拉在德意志以及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所作的慫恿一樣。他們看到，君主政府的崩潰，使一切聯繫或附屬於君主政府的利益，無論是經濟的或社會的，都湮沒無聞了。議會是懦弱的，但民衆已經覺醒了，他們的壓力是不能遏制的。勞動運動興旺起來了，它並開始要求有一個光明的地位。在一九三一年，共有七一〇次的罷工；在一九三二年，共有八三〇次；在一九三三年，共有一、四九九

次

只有應用法西斯主義才能把舊的秩序恢復過來，並把它保持得完整無缺。但是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是有它的特殊形態的。大工業的落後，教會和軍隊的擅權，在法西斯地主、教會和軍人之間，促成了一種密切的結合。大資本家和外國的受權人在西班牙是重要的，但並不是主要的。

在民主政府下面興起的法西斯主義，比里維拉式的法西斯主義還要像樣。里維拉是完全依賴軍隊的，同時他覺得有維持君主完整的必要。現在的法西斯主義是基於共同的社會利益上面的，並且沒有了君主的重負的牽累。第二，里維拉時代從未有過有力的、聯合的、戰鬥的勞動運動。事實上，里維拉已獲得了社會黨領袖的消極的中立。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社會黨的秘書安德烈斯薩波立脫(Andrés Sahorita)曾著說：「社會黨並不扶持現在的政權。它僅和現在的政權合作，以取得它應得的東西。」但是現在的法西斯主義却面對着一個根本不同的景象。尤其在一九三三年之後，勞動運動的內部分裂已開始治愈了，法西斯的政變若告失敗，他

們全部的社會機構必將陷入危險。

在民主政府成立的初期，就有幾個法西斯運動興起了。他們都盲目地抄着納粹的老樣。其中有一派，叫做西班牙長槍會（Falange Española）竟三不像樣地組織了希特拉式的衝鋒隊。它的領袖是約賽安東尼里維拉（Jose Antonio Primo de Rivera），就是前獨裁者里維拉的兒子。我們知道，在一九三四年的年初，地曾和希特拉有過會商。長槍會在活動的初期就和另一法西斯團體全國工團防禦會（*Junta de Ofensiva Nacional Sindicalista*）混合了起來。

里維拉的黨徒並不衆多，幾乎全部由流氓和暴徒組成，其間也夾雜了些「少爺」（*Gentlemen's sons*），工團防禦會的分子多半是些爲社會所不齒的學生和白衣領的工人。長槍會專門搗亂工人的集會，破壞罷工和暗殺政敵。

另一個同樣的法西斯團體，叫做西班牙復興會（*Renovacion Española*），是以以前的保王黨員哥科基（Antonio Goicoechea）所領導的。在里維拉的獨裁下，哥科基曾做過右翼保守

黨（是一個最反動的保王黨）的領袖。西班牙復興會從未發展成爲一種羣衆運動，它專門做着暗殺的工作。

法西斯的經費是由德國來的，本國的富翁也有許多捐助。西班牙的大富翁，也是民主政府的第一號的敵人，馬爾起（Juan March）捐助長槍會的經費，已成爲一件公開的事實。

馬爾起的致富是有過一番色彩鮮豔的經歷的。他出身是一個瑪約塔（Majorca）島上的漁夫，據說到二十一歲還不會識字。他是在戰時壟斷西班牙的烟草市場致富的。他財產的估計約有一萬萬元。在一九三一年，他被人告發曾向摩洛哥的高級委員和駐軍司令行賄，以使摩洛哥的烟草走私漏稅。後來，亞豐瑣王十三世決定給他烟草的專賣權，以免收稅的困難。

據說在里維拉獨裁的時候，他是出了很多的錢的。在民主政府下的初次選舉中，他竟厚着脸皮來作候選人了。他是當選的，但他要想在民主議會中做一個議員，就發生了困難。議會對他一一致拒絕，並把他交付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會在審查之後，說他有惡化行賄，和開槍擊人的罪名，把他判處了徒刑。

馬爾起在獄內羈留了十七個月，後來因爲有一個得賄的獄卒，「可憐他的境遇」竟使他越獄逃走了。這是在一九三三年的十一月間。過了三月之後，勒樂政府宣布大赦政治犯，他才從流亡地巴黎回到故國。

西班牙法西斯的真實發展已從發源接近到更有力的，更有身分的既得地位了。他們找到了勞伯爾斯來做領袖。勞伯爾斯是一個四十歲的青年，處事果斷，正有做法西斯領袖的資格。

勞伯爾斯是在那個「有名年代」（指一八九八年代）的蔭底下生長的。他於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於薩拉曼加（Salamanca），父親是一個虔敬的大學教授。他受着優等的教育，在拉良那（Laguna）大學得了博士的學位，並在那裏擔任過短時期的政治法的教授。

一九二三年，勞伯爾斯辭了教職，加入了更廣大的政治領域。他進了教會和貴族的主要機關報辯論報（El Debate），充任助理編輯，並成了該報總理奧立窩（Angel Herrera Oriol）的門客。奧立窩是被人稱爲耶穌會的靈魂的。在民主政府下的首次選舉中，勞伯爾斯當選爲農民黨的二十四代表之一。

勞伯爾斯的官星高陞得很快。由於訓練和癖好，他已成了教會的理想代言人和辯護者了。由於和勒佛拉及陀 (Revillagigedo) 伯爵的女兒結了婚，他更和貴族有了聯絡。他是一個使法西斯在西班牙立足的理想的人物。

他的政綱是澈底反對民主的。他反對政教分離，反對和梵諦岡斷絕關係，反對沒收僧衆的財產，反對世俗教育，反對離婚，反對土地改革，反對加泰隆尼亞省的自治。辯論報成了他個人的機關報了。後來，由於索德羅 (José Calvo Sotelo) 的拉攏，他更和保王黨有了聯繫。當一九三五年他在做軍政部長的時候，他叫富蘭科將軍做參謀長，這樣他又和西班牙軍人會發生了關係。

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季，勞伯爾斯開始把他的力量集合攏來。直到那時為止，人們都知道他是一個農民黨中的傑出的青年領袖。農民黨是一個大地主、教士和保王者的政黨，勞伯爾斯以爲它太累贅了，不足對民主政府實施正面的攻擊，他開始組織自己的黨，決心更矯捷地，更煽惑地實行活動，同時和農民黨仍舊保持着聯繫。

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季，受着奧立窩的援助，勞伯爾斯組織了天主教行動黨，宣示以非政治的立場，維護天主教的利益。這運動的幕後的意見是要把各黨中的天主教徒聯合攏來，以反對民主社會兩黨的集團。同時，奧立窩的民族行動黨已改組為民衆行動黨，是一種和天主教行動黨目的相同的政治組織。

一九三三年二月，勞伯爾斯更進一步，組織了西班牙自治右翼各黨聯盟（Confederacion Espanola de Derechas Autonomas），簡稱C. E. D. A.。他希望把一切受改革法威脅的地主都集合在這個組織之內。C. E. D. A. 不久就變成了他反民主的主要武器了。

里維拉和哥科基，兩位公然的法西斯主義者之所以扶持君主，是有意義的。勞伯爾斯之所以和教會地主密切勾結也同等地有意義的。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必須在受革命損失最大的社會勢力中方能立足。

第六章 在敵人手中的民主政府

民主政府的蜜月時期繼續了兩年半，雖然其間也有過劇烈的爭鬥。到了一九三一年的冬季，保王黨和其他的反動派知道惡劣已到達頂點了。他們對當前的景象一點也不戰慄。固然，那時的政府是完全由左翼各共和黨組成的：社會黨，急進社會黨，民主行動黨，左翼加泰隆尼亞黨和加里西亞民主黨。其他的各黨實際上都已退出了。他們在政府之外，和極右派的集團勾結得更加密切。

民主社會兩黨的聯合內閣，對實行一九三一年的民主政府的政綱雖然不大起勁，但終算已有了某幾種正面的成功。除採行憲法之外，加泰隆尼亞已准其在實質上自治，教會在形式上已和政府分離，教會學校已明令取締，世俗公立學校的教育制度，已開始建立，急進的土地改革方案已經草成，大規模的社會立法已經起頭。

但是在基本的土地問題上，却成功得最少。直到一九三三年的年底，僅有八萬零八百英畝大地產分配給五千農民。還有二百五十萬僱農和五十萬貧農得不到分毫的土地。

阿柴那是政府中最負時望的人了。但他的時望都是落空的。他雖然熱誠地工作着，希望能逐出保王黨在軍隊中的勢力。據他說，他的目的是要使軍隊轉變為民主政府的保衛者。但是直到一九三六年，阿柴那最初的政策和他在二月選舉後的微弱的努力，都證實沒有絲毫的成功。軍隊仍舊效忠於原來的目的。西班牙豢養軍隊，本來是爲了保衛王家的，在民主政府成立以前，它只知對國王效忠。

在一九三三年，我們看到民主政府下各階級間的裂痕已尖銳起來了。工人們看到民主政府非但不能使他們獲得民主的自由，同時也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程度和工作狀況，於是都表示着不滿。在民主政府創立後，興起的罷工風潮，到一九三三年，總共有六千次，參加的工人共有二百餘萬。

有許多罷工是帶有政治性質的。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八九兩日和十二月八日，無政府黨領

導着嚴重的武裝衝突。在有幾處地方，這些武裝衝突是一種有革命性質的羣衆運動。工人們以爲民主政府改革得太少了，所以發動鬥爭；反動的軍官們以爲民主政府改革得太多了，所以陰謀政變。勞苦的大衆想促進民主政府的工作，同時法西斯主義者想竭力使西班牙倒退。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的桑耶雅（Sanjurjo）叛變是一樁最嚴重的事件。一九三六年的內戰就是那次桑耶雅政變的嫡子。事實上，一九三六年法西斯叛變的總司令內定由桑耶雅擔任的。七月十八日桑耶雅將軍的墮機隕命，使西班牙的法西斯損失了一個最有經驗的軍事組織者。

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桑耶雅將軍以政變手段獲得了塞維爾（Seville）的統治權。他那時頒發通告，自任爲安達盧西亞省（Andalusia）的省長。全省的官吏都撤換了。桑耶雅將軍不會防到塞爾維工人的頑強的反抗，雖然瑪德里政府的行動十分遲緩，工人們却阻止着他的前途。桑耶雅逃走了，但是到八月十一日他在華爾伐（Huelva）被捕了。他雖因叛國的罪名而被判處死刑，柴摩拉總統却主張把他減刑。在過了短期的牢獄生活之後，桑耶雅將軍到德國去

了。那裏他和納粹黨會商着西班牙內戰的預定的計畫。

由於政府對保王黨的畏葸怯懦，使許多反動的，有法西斯思想的軍人仍得安然佔據要職。舉例來說，桑耶雅將軍對民主政府僅舉行了一次口頭的宣誓效忠，政府就委他做摩洛哥的總督，以後委他做安達盧西亞的省長，那裏，他才得於一九二三年發動首次的政變。桑耶雅一到安達盧西亞，就對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實施殘酷的迫害，并陰謀反對民主政府。

桑耶雅是藉着軍事的武器爲法西斯主義開路，同時，機詐的右派領袖也在政治方式中更堅實地，更狡詐地做着同樣的工作。從C. E. D. A. 組成起，到一九三六年二月爲止的一個時期，在西班牙史上創了一個劃一的紀元。這是一個強有力的法西斯運動的發展時期。法西斯運動以爲本身的力量已發展到足以爭取獨裁的政權了。當C. E. D. A. 組成的時候，勞伯爾斯是反對政府的。到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間，勒樂執政，勞伯爾斯就轉了方向，去扶持政府了。

在阿柴那政府的右翼反對黨之中，勒樂是一個爲人所公認的領袖。當那勞伯爾斯組織C. E. D. A. 的時候，勒樂已經是反對黨中的老手了。他在君主政治下面曾經做過民主黨的最傑出

的領袖，雖然他那時已上了年紀。當民主政府成立，已有六十七歲年紀的勒樂是在其內的，他雖然蔑視君主政府，同時却反對激烈的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他以為只要把君主推翻就已經夠了。

在一九三一年四月成立的臨時政府中，勒樂担任着第一任的外交總長，直到同年六月二十八日的選舉為止。後來，他被左派排去了職位，仍舊回到反政府的政黨中去。他不是保王黨員，也不是當時的法西斯主義者。但是他既然反對左派的民主社會兩黨的集團，就必然會和以勞伯爾斯的 C. E. D. A. 為首的極右派聯合起來。

在起初，勞伯爾斯和勒樂都是站在反政府的立場上工作的。他們共同的策略是使議會的工作極度地稀延和怠工。勞伯爾斯的目的是要窘迫民主政府而使它全部傾覆；勒樂的把戲是要使民主政府變成右傾，以保護地主和教會的特權。他們一同活動，應用着錯綜複雜的議會戰術，阻止議案提出。議案既經提出，他們就竭力稀延着，不使它有進步的議決。有時議會的怠工足以把議案打消，或把它稀延數月。已經通過的議案，他們竭力阻止執行。這一切手段的含義，是希

望在預定於一九三三年年尾舉行的選舉中，民衆的勢力會投向右派——後來這種希望果然證實了。

由於勒樂和勞伯爾斯兩派的稽延戰略，在民主政府的初期，教會過了多時的優裕生活。政府對他的敵人之一，仍舊慷慨地給以津貼。一九三一年，政府曾以六千五百萬貝沙太津貼天主教會；一九三二年，津貼了四千二百萬；一九三三年，津貼了二千四百萬。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選舉中右派得勝之後，這些津貼，仍舊用着各種不同的方式，繼續存在，直到一九三六年二月的人民陣綫，方才掃除了這個陋規。

政府爲了防止保王黨和法西斯派危害民國所頒布的法律，已逐漸用來壓迫它最好的朋友——工人了。

民衆對民主政府的應許，已從幻想中醒悟過來了。這一半是由於民主社會兩黨的膽怯，其另一半是由於勒樂和勞伯爾斯的右翼反對黨在議會中狡猾地搗亂，阻撓和怠工。勞伯爾斯和他的C. E. D. A. 無時或刻不鼓着如簧之舌，以利用着這種民衆的不滿。右翼各黨開始覺得他們

可以起來承受政權了。

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左右兩派的民主黨，對教會和土地的主要問題，發生了嚴重的裂痕。勒樂已對阿柴那政府提出彈劾，說它偏袒工農。九月十三日，阿柴那辭去了內閣總理。民主社會兩黨的聯合內閣結束了，以後就開始了法西斯的擅權。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月三日的兩次選舉，使勞伯爾斯交了橫運，這兩次選舉雖然不會使右派獲得壓倒的勝利，但已把民主社會兩黨的聯合打擊得一蹶不振。社會黨在議會的議席從一一四席減到五八席。急進社會黨，以前有五五議席的，現在弄得一席不留。阿柴那的左翼民主黨從三〇席降到五席，勒樂所領導的急進黨在新議會中要算席數最多了，它共佔了一〇五席。勞伯爾斯的民衆行動黨得了六二席；農民黨得了八八席；保王黨得了四三席。

因為勒樂是以前右派和中派的反政府黨的代言人，據邏輯而論，他就是未來政府的領袖。勞伯爾斯堅決地拒絕入閣，雖然內閣的生命是操在他的手中。但他對勒樂却給以有條件的扶持。

梵諦岡教庭對十一月選舉的結果，和勒樂的當選為內閣總理，都表示悅意。勞伯爾斯的機關報辯論報上說：「我們的候選人的大勝利，竟超出了我們的預期。」我們可把這句話和教庭的言論接讀起來，教庭的喉舌羅馬觀察報（L' Osservatore Romano）上響應着說：現在教會已有了「在西班牙尊嚴地存在的機會，它的權利和聖職的行使都會受人的尊重。」

勒樂的新政府，在勞伯爾斯的壓力之下，採取了各種步驟，來取消民主政府的初期的法案。政府的宣言已經很顯明地表示勒樂要想把社會立法加以全盤的修改。勒樂建議繼續補助農村的教士，他答應不再停閉教會學校，答應修改一九三二年的土地法案。同時對流亡國外的保王黨人的特赦令，在議會中迅速地加以通過，使馬爾起，索德羅，和瓜達爾霍斯（Guadalupe）伯爵等保王黨人可以回到故國。這些流亡者的回來，使勞伯爾斯有了和保王黨的政客結合的機會。尤其是索德羅，他在里維拉的獨裁時代曾做過財政總長。民國成立以後，他就逃到巴黎。在一九三三的選舉中，加里西亞省的保王黨選區亞蘭斯（Oran）選他為國會的議員，他在一九三四年的大赦令未簽字以前，始終未曾就職。他回國之後就和勞伯爾斯開始合作。這樣一直

繼續到七月的內戰。事實上，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三日索德羅的被刺是促成了法西斯叛變的早熟的。

勒樂在勞伯爾斯的督促之下，繼續不斷地引用着保衛民國的法令，以壓迫民主的革命的無產政黨。

在許多倒行逆施的社會政策之外，勒樂又竭盡力量，想限制加泰隆尼亞的自治。可惜右派和中派把自己的力量估計得太高了。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四日的自治政府選舉中，加泰隆尼亞開始團結一切力量，以反抗瑪德里取消他民族獨立的企圖。阿柴那在那次加泰隆尼亞的選舉運動中扮演着一個特別重要的角色。結果，康配聶斯 (Luis Companys) 所領導的加泰隆左翼民主黨得了壓倒的勝利。加泰隆尼亞通告勒樂和勞伯爾斯，它的自治權利，決不能容忍有任何侵害的。

同時，勒樂和勞伯爾斯的聯合機會也醞釀着風潮，中派和右派對各種政策究應反動到什麼程度，意見未能一致。

因為總統不肯在特赦九千保王黨員和反動派的法令上簽字，又因為把土地還給貴族的法案引起了堅強的反對，勒樂內閣於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辭職了。於是由杉浦爾（Edo Samper）為首，於四月二十八日，組成了中右各黨聯合陣容的新閣，勞伯爾斯一面依然扶持着杉浦爾內閣，一面在議會之外用了最大的努力，組織着法西斯的民衆團體。事實上，勞伯爾斯在這全時期中竭力地想為C. E. D. A. 造一真實的羣衆基礎。欺騙和從教會中來的巨大經費就是他主要的工具。他一面在口頭上宣傳着有劃分大地產的必要，一面在議會中贊助着保護大地主的法案。他用盡死力來組織天主教的農會和工會。但是他的極度的欺騙僅僅獲得了農民的懷疑，並不能得到所希望的羣衆的基礎。

四月二十二日，勞伯爾斯決定把他的羣衆力量，來作一次公開的展示。他的團體，如O. E. D. A. 天主教聯合會，民衆行動黨的青年團等，費了四個月工夫，用盡了一切努力，來組織一次在瑪德里附近的哀斯哥立厄宮（Escorial）的羣衆示威。勞伯爾斯的屬員們揚言，這次示威至少有五萬十足的人數參加。於是瑪德里就來了一次反示威，並宣布了一次二十四小時的總罷工。這

樣一來，就把勞伯爾斯黨徒們的熱心減退了。據中立派觀察者的估計，該次示威中所到的人數，僅有一萬五千到二萬之間，和那些在瑪德里著名的工會、社會黨、共產黨和左翼民主黨的反法西斯示威比較起來，不能算是一種驚人的羣衆勢力。在哀斯哥立厄宮的口號是十足法西斯性質的：「以戰爭制止階級戰爭；」「使人人獲得工作；」「打倒議會主義；」「打倒獨裁；」「民衆組織起來參加政府。」

在瑪德里政府更向右傾的當兒，加泰隆尼亞却迅速地左傾了。加泰隆自治政府通過了一條關於土地問題的法案，這條法案就成了推倒杉浦爾內閣和引起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工人武裝暴動的口實。自治政府的法案大意是要把土地分成許多小塊，以一份農戶所能耕耘的大小爲標準。法案上更規定，土地上三分之二的勞力，必須由農戶自己担承。其他的三分之一，他們可以僱用僱農代作。以前規定農民須付領主費的一切封建契約悉數取消。農民耕種土地，只要出最低的租費，以六年爲期，期滿再可續訂。農民在所租的土地上耕種了十八年之後，就有把土地收買的權利。

概括說來，農民的不安已經抓住了全國。社會主義派的土地協會在六月間收穫期開始的時候，號召了一次二百萬僱農的大罷工。他們籲請着工團主義派的僱農聯合會一致加入。由於工人中的分派，再加上政府的有力的壓迫，這次罷工宣告失敗了，但是這次的失敗益發加重了農民的不滿。

杉浦爾內閣從起頭就不能使右派感到滿足。勞伯爾斯看到民衆的情緒左傾，就決定必須用激烈的手段，使政府能更迅速地向法西斯主義移動。他以為杉浦爾這個工具不及勒樂的溫順。

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勞伯爾斯在一次演說中，嚴厲地批評着杉浦爾的議會演辭，這無異宣布了杉浦爾內閣的死刑。這位耶穌會的政客痛斥着杉浦爾的宣言，說它是「軟弱和卑屈」。勞伯爾斯以為杉浦爾內閣是會引起內戰的，因此把它毀滅了。好像是預先安排定的一樣，內閣中有二位閣員，交通部長失特 (Jose Maria Cid) 和羅波斯 (Filberto Villa Lobos)，提出辭呈了。杉浦爾政府的崩潰是法西斯主義跨了一次闊步的信號。

西班牙的普羅列塔利亞就在市街上接受了挑戰。

第七章 十月暴動

一九三四年十月的暴動是工人們對企圖建立法西斯獨裁的一種英勇的回答。這個時期，在西班牙史上是永不會被遺忘的。十月一日，以O. E. D. A.爲首的法西斯各派，深思熟慮地參加着新的勒樂內閣，目的在挑動內戰。西班牙的人民看到當前來了德意式的法西斯獨裁的威脅，就決計發動決死的戰鬥。在戰爭中，有一次他們想先發制人。他們要想建立工農的民主政府，以反抗法西斯獨裁的危險。

在事變過了許多時之後，勞伯爾斯爲欲推卸他故意挑動十月暴動的責任，辯解着說：「固然；我知道如果本黨的代表參加到政府中去，是要引起內戰的。但是我們不要這樣直頭直腦。若再等待二三個月，那就等於自殺。西班牙恐怕已變爲一個廣大的阿斯都里亞（Asturias）了，我們今天恐怕已有了蘇維埃了。」

在十月暴動以前，西班牙各派勢力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在一九三三年的議會選舉中，得了三分之二的議席的右中兩派的集團，在勞伯爾斯的駕馭下，是能團結它的力量的。右派和中派正着着勝利地進行着法西斯的聯合，同時工人運動，在聯合的形式和行動上，却進展得很慢。

那時勞動階級正在轉變期中，不久就遇到了兩次危機，每一危機的結果，都反而在普羅列塔利亞聯合的大道上，促成了極迅速的進展。在十月的前夜，加泰隆尼亞以外的西班牙產業普羅列塔利亞是在社會黨的影響之下的。他們特別受着卡波斐羅 (Tarigo Caballero) 所領導的社會黨左派的影响。在加泰隆尼亞，因為勞動運動的畸形發展，以及無政府主義的流行，無政府工團主義派的全國總工會 (O. N. T.) 和意卑里亞無政府同盟就在勞動階級中佔了優勢。他們反對聯合，對現存的民主政府和法西斯獨裁的危險都漠不關心。

共產黨繼續提出了實現聯合陣線以反抗法西斯的主要口號。法國人民陣線的成功使西班牙的共產黨特別受到鼓勵。起初和社會黨所作的談判是毫無效果，因為社會黨已在扶持着一個聯合陣線形式的團體，叫做勞動者同盟，因此，社會黨拒絕了共產黨所提出的由兩黨組織

正式聯合陣線的建議，并力請共產黨加入到勞動者同盟中來。共產黨看到勞動者同盟不大注意西班牙多數勞苦者——那就是農民——的政治和組織，就加以嚴厲的批評，後來，於一九三四年九月，它也加入同盟了。

共產黨一面同意贊助着「一切權力屬於同盟」的終極目的，同時它堅決地主張採取一個最低限度的直接政綱，以集合廣大的羣衆，來實行反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戰爭，只有這種經濟戰爭，方能保證政治的勝利。那個直接政綱包含下列的幾條：(1)無條件地沒收地主和教會的土地，分給農民；(2)解除一切法西斯的武裝；(3)由政府統制工業和銀行；(4)實行每星期四十小時工作制，工資仍以每星期四十八小時計算；(5)介紹社會的和經濟的保險；(6)懲罰大投機家和放高利貸者，沒收他們的財產以救濟失業者；(7)取消農民和小店舖對於銀行的欠款；(8)解放加泰隆尼亞，比斯開(Biscaya)和加里西亞的被壓迫民族，承認摩洛哥的獨立。

右派是最怕勞動階級聯合的怪物的，他們決定在無產階級聯合的向心力還未把農民吸收進反法西斯的堡壘以前，先發動一次內戰。

西班牙的工人還在用全力完成本階級的聯合，他們對各黨聯合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還不會有充分的認識。

勞伯爾斯在十月一日的行動，表示法西斯黨已想在西班牙建立第一次的獨裁。只有發動內戰，才能使這運動轉向，或至少使這運動遭受挫折。關於這兩點，勞動者同盟是認識得很清楚的，他們在十月四日和五日發出了全國總罷工的命令。

共產黨的社會黨的和許多無黨派的工人都執行了罷工的命令。無政府工團主義派對罷工命令却表示猶疑，甚至表示敵視。倘若在這時候還是無聲無息地沒有動作，那就無異在鼓勵着新組成的勒樂和勞伯爾斯的聯合政府，來採取更嚴酷的法西斯手段。建立獨裁的能否成功，完全要靠反法西斯和革命的熱情來作斷定的。

總罷工之後，全國的工業中心立即陷入了癱瘓狀態。在有些地方，總罷工都變成了反法西斯的武裝暴動。在阿斯都里亞 (Asturias)，比斯開，雷翁 (León)，瑪德里和加泰隆尼亞諸地，實際的戰爭尤為利害。

因為勞動階級沒有堅固的團結，又因為發動的不統一，這次十月的反法西斯暴動一開始就遭遇到波折的。但它的結果，却阻止了法西斯主義的流入，使工人和農民在英勇的事業中得到了興奮，最後，并促成了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選舉中的勝利。勞動階級的團結，在戰鬥開始的時候，是很軟弱的，後來在戰爭的烈火中却鍛鍊得和純鋼一樣，它只需要好好的指導。

十月暴動是很散漫的，沒有一個指導的中心計劃。但是工人在反法西斯的戰爭中也曾佔領了數十個城市和鄉村。

十月事件，我們僅能說它是一連串的地方暴動。和它同時爆發的，還有加泰隆尼亞的民族獨立運動。十月事件也不是無產階級一致爭取政權的全國暴動。後來，卜波斐羅宣布着說，十月的目的是在威嚇布爾喬亞，使他們放棄法西斯主義，它並不想在西班牙建立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權。只有阿斯都里亞曾建立過胚胎的蘇維埃，那塊地方，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比西班牙其他的地方，甚至比前進的瑪德里，還要來得成熟。

許多人常把十月事件誤指爲阿斯都里亞的叛亂，因爲阿斯都里亞的礦工，那時曾受過十五日慘烈的圍攻。阿斯都里亞的人民，自從羅馬人的征服和摩爾人的侵掠以來，就一向以勇敢聞名的。十月暴動和一九三六年的內戰，表示出阿斯都里亞人自古以來的英勇主義仍存在於革命的礦工中間。當一九三六年的內戰中，那些以炸藥爲武器的礦工，在基榮（Gijón），奧維陀（Oviedo），伊倫（Irún）和瑟罷士梯安（San Sebastian）等地參加着反法西斯的戰爭。閱報者看到他們奮不顧身的戰績，都會驚奇得透不過氣來的。這些礦工們以爲此次內戰是一九三四年十月暴動的不可避免的繼續。

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奧維陀和阿斯都里亞的大部分是在革命工人的手中，有十五天之久。雖然戰爭並不會有過片刻的停止，一個規模粗具的工農省政府竟建立了起來。

他們保守着法律和秩序，努力繼續着工業的生產，使店舖照常開張，並爲居民預備着糧食和必需品。一枝工人的民團募集捕來了法令的頒布都用着阿斯都里亞工農政府的名義，或由當地的革命委員會簽署，他們更佔據了兵工廠，用着百折不回的勇氣，開始製造必需的軍用品，

以進行反抗優越的政府軍的戰爭。

阿斯都里亞的無產階級一面反抗着優越的軍隊，一面維持着饑民的食糧，一面在敵軍的轟炸和封鎖下還要設法建立嚴明的紀律和秩序。這種英勇的精神連那些在阿斯都里亞的敵人，也不得不深加敬仰。

革命委員會發出佈告，嚴禁一切劫掠的行爲，違者就加以逮捕和鎗殺。一切工人的黨派和團體都被召到政府的大本營去，參加統治委員會的行政事務和安排工農民主國的保衛工作。工人的民團，雖然是匆促集合的，却組織得很好，紀律也很嚴明。他們大都由阿斯都里亞的礦工，兵士，兵工廠的工人和農民組成。軍官完全是由行伍中出身的。礦工又組織了一個轟炸敵軍的特別團。他們用着極大的勇敢和技巧進行着工作。正像一個西班牙的記者所說：「他們以驚人的效率實行着職務，絲毫不顧自己的生命。」

另一個記者報告着民團進奧維陀的情形：「我看着他們列隊行過。真是一個不可描摹的壯觀。爲首的人拿着盛着土造的手榴彈的竹籃。他們高叫着『同志們，向前！』衝進了在電話總

局的屋子內設防的保安隊的火線。」

奧維陀有一個醫生，曾被徵發到民團中去做軍醫，他在一家反動的報紙上寫出他的經歷，說到阿斯都里亞工人的不滅的英勇。傷兵開始像潮水一般地送進醫院來了。他們對醫生救治的延緩都不耐煩起來，他們要再上火線。這位醫生說到一個送進來的戰士。

「『快點把我包紮起來，』他要求着說，『先把我包一下，我是要回去的。我們必須攻下聖大克拉刺(Santa Clara)軍營。那裏駐滿着保安隊。』」

「『你必須到床上去臥着。』醫生吩咐着。」

「那人却不肯到床上去，他不聽醫生的話竟自去了。第二天有人見他死在路上。」

「一個受傷者到來了，由一個面貌像女子的瘦弱青年攙着。他肩上掛着一幹來福鎗，還有子彈帶。或許因為我和他立得最近，他轉身對我說：『真可慘。』『什麼事可慘呢？』我問。『皮拉姆同志被擊死了，他看我們進展得很慢，不能和他所預期的一樣。就毫無掩護地衝上前去，投擲炸彈，他們一排鎗把他擊倒了。』」

後來，阿斯都里亞的無產階級被擊敗了，那時的屠殺真令人可怕。他們把數百個男女和小孩驅到牆邊，用機關鎗向他們掃射。然後把死者和傷者的屍體堆疊起來，用火燒燬。

奧維陀是遭受着可怕的飛機轟炸和炮擊。工人們雖然被圍困着，仍舊表現出人道和體恤來。一位目擊者，朱爾（Hans Theodor Joel）在布拉格（Prague）德僑所辦的 *Neue Weltbühne* 週刊上，寫着以下的話：

「工人們並不壓迫民衆，連中等階級，他們也並不壓迫。他們不謀害人命，不作整批的摧毀，却幫助着一切受戰爭苦害的災民。」

「讓我在數千事件中舉出一個例子來。炮彈和飛機上擲下的炸彈使奧維陀的大學區起火了，那地方是民團的軍營和參謀本部，并儲藏着二噸以上的炸藥，時時有爆發起來使全區毀滅的危險，那時赤衛隊不但警告着中等階級的居民退出，同時他們一面進行着戰爭，一面竭力幫他們把東西搬出危險區域。」

勒樂和勞伯爾斯的政府覺得叫省防軍，甚至正規的海陸軍，去担任粉碎阿斯都里亞叛亂

的工作是不夠的，或是靠不住的。他們就把西班牙的客籍軍和里夫軍調到本部鎮壓阿斯都里亞的工人。這事在西班牙史上還是初次在戰爭期間，政府用飛機隨意轟炸，已把奧維陀的大部化成了灰燼。在十五天惡鬪之後，礦工終於屈服了，他們有一大部分退到山中。

因為加泰隆的暴動和瑪德里工人一致抗戰的失敗，阿斯都利亞的工人就陷入於孤立的危境中了。

在加泰隆尼亞，戰爭的性質要複雜得多，它牽涉了許多不同的利益。我們須記住，加泰隆尼亞是杉浦爾政府崩潰的藉口。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以前，加泰隆政府通過了一條於佃農和小地主有利的土地改革法案，西班牙的最高法院竟把這條法案廢止了。加泰隆尼亞以為最高法院的行動是在打擊着它從一九三一年共和後所獲得的獨立。

在加泰隆尼亞有許多不同的黨派。其中最主要的是：康配聶斯 (Compaytes) 所領導的布爾喬亞的左翼國民黨，無政府工團主義派所領導的最大的工人團體全國總工會 (C. N. T.) 和意卑里亞無政府聯盟 (I. A. I.)；還有社會黨和共產黨。當加泰隆自治政府的主席康

配聶斯宣布加泰隆尼亞獨立的時候，就有全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鎮和鄉村起來擁護。但他却沒有把工人武裝起來，以保衛獨立，使他們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來贏得自己的要求。同時無政府派拒絕參加和加泰隆左翼國民黨聯合的政府。他們以為受瑪德里剝削者的統治或受巴塞羅納剝削者統治，無論戴的是共和民主的面具或是法西斯獨裁的面具，於他們都無分軒輊的。個那組織雖小却很重要的託洛斯基派所抱的意見也和無政府派沒有多大的不同。

反抗勞伯爾斯挑戰的信號已經發出了，康配聶斯却還在虛費着寶貴的時間，運動加泰隆的防軍司令巴塔脫（Domingo Batet）將軍，想邀請他加入獨立運動。巴塔脫將軍要求給以一小時考慮的時間。誰知一小時未到，他有力的答覆就來了，他命令他的軍隊開火了。巴塞羅納的工人，社會黨員，共產黨員和青年的民主黨員都英勇地抗戰，但是由於數達萬餘的大軍有組織的襲擊，他們終於在十月七日敗得一蹶不振了。加泰隆的國民政府被迫降服了。瑪德里的法西斯主義者才得放了點心。他們現在能夠解決勇敢狹小的阿斯都里亞了。

在瑪德里，戰爭雖然劇烈，却多數是很散漫的。在工人區中，工人和軍隊立刻開始了散戰。工

人設起了障礙物，起初軍隊還敵不過他們。戰爭一直續繼到十月十二日。但工人們顯然沒有大規模的集體鬪爭的預備。最重要的，他們在事前並不會作過政治的鼓動，以團結工農，應付襲擊。在瑪德里，工人的大部分力量是集中於反對破壞罷工，同時工人中的突擊隊却在設法攻入政府的中心和精銳部隊。工人們用機關槍猛攻着議會，西班牙銀行和警察總署等機關。但是因為缺乏武器和組織，戰爭終於被阻止了。不多幾天之後，巷戰降為無效果的狙擊了。起初，政府反工人的行動很慢，他們很費心地揀選着最可靠的部隊。駐紮在瑪德里中央飛機場上的一部分空軍竟拒絕參加反工人的戰爭。

阿斯都里亞工農政府崩潰後的屠殺，就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內戰的法西斯恐怖的前奏。許多男女老幼都被政府軍用機關槍掃死，然後把屍體堆疊起來焚燬。勞動階級的死傷到處是很多的。單在阿斯都里亞一處，死難的人數在二三千之間。全西班牙，連阿斯都里亞包括在內，總共有五六千。被捕的人數共有六萬，後來有三萬人被判處自一年至終身的徒刑。監獄中都擠滿了參加暴動的男女犯人。

們只要把十月事件來作一個清醒的政治清算，再一看以後的發展，就會明白此次法西斯主義者所挑動的暴動之所以不會和不能獲得勝利的理由。主要的教訓是：第一，缺乏團結力，在普羅列塔利亞的諸革命黨間沒有堅強的聯合。第二，無政府派的中立，他們以為瑪德里的法西斯統治和巴塞羅納的民族革命統治都是一邱之貉。第三，並不會充分地把農民拉到工人的一邊以反抗法西斯的挑戰。第四，把中等階級忽略過了，一任他們在工人和法西斯的抗爭中保持着中立。這第四個缺點已於十月暴動失敗後首先補救過來了。

軍事運動雖然一敗塗地了，無產階級却一點沒有失敗主義者的情緒，這真是西班牙十月事件後最動人的政治現象。失敗的逆境和痛苦的經驗更促成了他們反法西斯敵人的聯合。法西斯主義能充分地利用着它的勝利。工人的團體，雖然是非法的，却仍舊保持着完整，甚且加強着他們的組織。

一九三四年的十月，雖然有許多錯誤，但它在西班牙勞動階級的意識中，却已成爲澈底解放的保證了。

第八章 異教裁判所重生了

如果我們想把一九三六年法西斯叛變的政治上的和軍事上的預備回溯到它的起源，那末，從十月暴動失敗到一九三六年二月選舉這一個恐怖和復仇的時期，我們必須加以考慮的。監獄中已禁錮了三萬個左派，著名的領袖都已被捕受審。反動派以爲支解民主政府的機會到了，他們預備實行最後的打擊，以使法西斯主義成功，即使引起內戰，亦在所不惜。

他們是雙管齊下的。一面以殘酷的恐怖手段對待着工人團體和加泰隆的國民黨左派。社會立法和土地改革法案都被一脚蹴開了。另一面，右派努力抓住了民主政府的各機關，緩和着內部不同的意見，並運動着布爾喬亞的中立派歸附他們，否則就把他們根本解散。

他們用了嚴重的刑罰對付十月的囚犯，希望能遏止工農的革命氣燄。戒嚴令實行了五個月。在戒嚴令頒布開始的二日中，共有七千以上勒樂政府的反對黨被捕。

阿斯都里亞省中的奧維陀礦工，在恐怖中正首當其衝。政府軍，特別是可惡的客籍軍，在步兵營中槍殺了七百個工人。在街上，在公共的廣場上，以及在曾經叛變的戰艦上，都有大批十月暴動的嫌疑犯慘遭槍殺。

十月罪犯的處決一直繼續到一九三六年二月的選舉以後，方告停止。

阿柴那，康配聶斯，卡波婁羅，曼南提士（Teodomiro Menendez）和庇那（Gonzalez Pena）都在受審的諸領袖之內。監獄都差不多要擠坍了。瑪德里的反省院容納了六千犯人，前一個人住的籠子，現在要住三四個人。十月的人口損失是很大的，雖然和七月內戰比較起來，它已顯得不甚重要了。下面是最可靠的數字：入獄的人數，六萬至八萬；死的，五千；傷的，一萬。

他們更濫用私刑，尤其在阿斯都里亞。我們只要一看那張奧維陀政治犯的抗議呈文，就可明瞭他們所受的殘酷了。那張呈文上共有五百六十四個已決的或待審的政治犯簽名。他們向檢察官宣告着說：

「一個近代的異教裁判所已經成立了：扭陰囊，燒灼生殖器和身體上其他的部分，用鉄鉗

夾手指和足指，用老虎礮，用鎚敲打兩手和兩膝，用牙籤刺入指甲，用沸水燙，陪斬，叫犯人自掘墳墓，當着犯人的母親，姊妹或妻子的面前毆打犯人。」

康配聶斯和其他六個加泰隆左派的黨員受審了，他們被判處了三十年徒刑，是爲了「教唆軍事的叛變。」康配聶斯堅持着說，這事應由他個人負責的，但是三十年徒刑已是最後的一句話，他們沒有上訴的權利。阿柴那在法庭上受了一番呵斥，被開釋了。十月事變後逃到巴黎的兩個社會黨的議員，不里托 (Indalecio Prieto) 和納爾根 (Señorita Margarita Nelken) 也定了罪。

曼南提士和庇那的受審要算是最動人的一幕，因爲這次審判所激起的民衆情緒使勒樂和勞伯爾斯的反動集團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他們被控的罪名是領導奧維陀的叛變。雖然他們被判處死刑，但是民衆的憤怒已高漲得不可遏止，終於使他們的死刑不得不停止執行。

法西斯和反動派關於恐怖的屢度問題，內部發生了爭論。一個隱伏的危機在政府中發展起來了，勞伯爾斯和 C. E. D. A. 堅持着要有更多的恐怖，激進派却恐怕更多的徒刑和屠殺會激

起民衆的新的叛亂。

農民和工人的情緒都是很興奮的。勞苦大眾沒有一點失敗的氣象。他們不像意、德、奧等國的工人在法西斯主義勝利後所表示的一樣。固然他們還沒有把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完全克服，但他們克服法西斯主義的意志和計畫却是有的。因為經濟情形的轉惡，民衆的不滿遂繼續沸騰着。法西斯派縱然用着無人道的恐怖，也不能限制或摧殘工人的組織。在恐怖下，工會、社會黨和共產黨實際上仍有發展，同時工團主義派和無政府派的組織，因為在戰鬪中採取了中立政策，已稍形失勢了。

許多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都被禁錮在一處，這盛況真是空前的。一種有趣的政治運動遂在監獄中發展起來。監獄已變成了無產階級聯合的發祥地了。監獄又好像成了許多從暴動失敗中採取教訓的學院。在監獄中並組成了聯合陣線委員會，囚犯和獄吏的交涉都須由委員會執行。馬克斯圖書館也建立起來了。卡波婁羅的社共兩黨必須趕速聯合的結論也是在監獄中決定的。

在十月暴動之後，雖然革命的出版物都橫受壓迫（無政府工團主義派的出版物除外），工人要求結社自由的運動却仍舊普遍有效地興起。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警廳才允許社會黨的本部在瑪德里，塞維爾，和華爾伐（Huelva）等地公開。

十月以後，勒樂和勞伯爾斯是一致合作的。勒樂甚至指定勞伯爾斯做他的後繼者。這是很顯然的，勞伯爾斯和索德羅已成了全國的魂靈，勒樂不過是奉行着命令。

十月四日的政府是側重於右派，而也受着中派的助力的。換句話說，它是一個民主政體的政府，但大部分的組成員却都公開堅決地反對民主的。

統握政府大權的右派，開始有組織地摧毀着一九三一年民主政府的成績。土地改革法案被廢止了。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市參議員都被免職，改派了反動派充任。教會的地位增強了。它和政府的約章都重新訂立。憲法上所應許的加泰隆尼亞和比斯開的自治權也都受了限制。

在十月失敗後企圖成立的那個法西斯集團，在性質上却是軟弱無能的，他們要想組織一個堅強的獨裁政府，意見不能一致。其間最顯著的事件，就是一連串的內閣的危機和閣員的辭

職。社會黨不贊成重回議院，勞伯爾斯決計實行剪削異己的政策，想把阻礙法西斯主義進行的閣員驅出內閣。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外交總長杉浦爾和軍政部長喜台爾哥（Hitelgo）被迫辭職了。

喜台爾哥和杉浦爾的辭職，可說是勞伯爾斯第一次戰勝了激進黨的領袖，他更利用優勢迫令那個自由共和黨出身的教育部長佛拉羅波斯（Villalobos）辭職。耶穌會的勞伯爾斯以爲佛拉羅波斯做教育部長太忽視宗教教育了。接着又有農黨出身的農政部長維拉斯科（José Martinez de Velasco）提出辭呈。維拉斯科是爲了右派的原因而辭職的；他以爲政府對付十月囚犯的政策太仁慈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天主教黨和農黨反對赦免庇那和曼南提士二人的死刑，結果，勒樂和勞伯爾斯的內閣辭職了。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內閣成立以來，這已是第五次的危機了。爭論的主要點就是恐怖的限度問題，和應用法西斯主義反對革命工人的程度問題。C. E. D. A.，農黨和自由共和黨都主張貫徹到底。激進黨因爲比較的接近輿論，恐怕放縱的法西斯恐怖要釀

成不幸的後果，所以發出溫和的論調。當庇那和其他十九個人被宣判死刑的時候，潰決點到來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六日，勒樂組成了新閣，容納着五個大衆行動黨的黨員，勞伯爾斯是擔任着軍政部長的不祥的職位。在這個十月後的期間中，C. E. D. A. 已採取了一個簡捷的政策。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和農黨勾結，以保護大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因爲C. E. D. A. 是一個沒有羣衆衝鋒隊的法西斯團體，又因爲它是在一個天主教獨占的國家中，它就依賴着天主教的感人的欺騙。它尤其向貧農和失業者進行宣傳。它希望爲它的反動目的創造一個普羅列塔利亞的羣衆基礎。它建議了一個父道式的失業綱領，甚至沒收了幾塊大地產（把相當的補償給與地主）來安插少數的農民。

勞伯爾斯做軍政部長是很活動的。他爲什麼這樣的活動，只有他的親信曉得。他親自到阿斯都里亞去監督軍事演習。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有人公開地控他，說他改組軍隊，圖謀政變。勞伯爾斯對這控告激烈地否認。他誇口說，如果他要實行政變，他是無須軍隊的，民衆會和他站

在一起的。在他任職期間的瓜達拉瑪 (Guadarrama) 山地的軍事演習，使一九三六年的民主政府受了很大的損失。一九三六年法西斯軍的水泥戰壕，就是一九三五年他任職的時候所築成的。

勞伯爾斯更擬定了在巴利阿利羣島增設堡壘的計劃，以和內部的軍事復興同時並進。

在把軍事預備好之後，勞伯爾斯和他的僚屬就打算於年終以前修改憲法。那時議會已自動解散。改選的計劃已擬定了，右派以為一定可操勝算的。其餘的事都可由軍隊輔助着合法的當局實行。勒樂的新政府只存在了不多幾月的時間。農黨因為不滿於勒樂內閣的政策，和它把五個內閣職位裁併為一的行動，又因為反對把公共工程從加泰隆尼亞移轉到瑪德里，就起來促成了內閣的辭職。

以後的內閣是由乍配不列塔 (Joaquin Chapaprieta) 為首的。對於勞伯爾斯和索德羅，這次內閣的改組可說是在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在經濟困難的藉口之下，閣員的人數已從十二個減少到九個了。勞伯爾斯連任着軍政部長。這次風潮發生的時候，他還不曾

完成內戰的準備。柴摩拉總統鑑於阿比西尼亞的戰爭，以爲需要一個經驗豐富的人材，於是叫勒樂擔任了外交部長。左派因爲政府經常發生危機，就堅持着主張解散議會，重行改選。

到十月的後半月，乍配不列塔內閣發生了卑劣的受賄醜聞。一個叫做斯脫勞斯（Daniel Strain）的墨西哥公民向乍配不列塔總理正式控訴，說他曾以兩百萬貝沙太（Peos）付給一位關員，某幾個右派的議員和其他的政府官吏，以謀運動開放聖瑟罷士梯安（San Sebastian）的賭禁。在民主社會兩黨的聯合政府下，西班牙的賭博是早已懸爲厲禁的。乍配不列塔把這醜聞的詳情祕不發表，以爲須經檢察長的審查。

一個於地主有利的土地法修正案在議會中迅速地通過了。農民羣衆對這件事當然比對那件不甚明瞭的醜聞更加恨惡。他們把這法案說得天花亂墜，當它是一件賜給農民的恩物。農民可以得到土地，喪失土地的地主也可以得到適當賠償的保證。農民須以分期付款的辦法償還地主的損失，並規定利息四厘，至還清爲止。這計劃於地主竟如此地有利，無怪有一個議員要說：「現在地主們可以列成了長隊，等政府慢慢地來收買他們的土地了。」

西班牙被拉到經濟的災害中去了，這件事的嚴重更過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以後的恐怖，一九三二年所通過的基本勞動法都被毀壞了。都市工人的工資從十個和十二個貝沙太降低到四五個貝沙太。農村工人的工資，男工從八九個貝沙太減低到一個或一個半，女工竟減到〇·六個貝沙太，工作的時間要從日出到日沒。政府更通過了幾條分畛域的法律，以對付小農。

政府化着數百萬的巨金來津貼教會和鐵道公司，來豢養軍隊，保安隊和警察，據官方的統計，西班牙的失業人數一九三三年為五三六、〇〇〇人，一九三五年為七八〇、二四二人。但據私人的估計，失業的人數却有一、五〇〇、〇〇〇人。一面失業的人數在繼續地增加，一面公共工程的預算反而在繼續地減少。在一九三三年，是八七三、〇〇〇、〇〇〇貝沙太，在一九三五年，已被減為六二八、〇〇〇、〇〇〇貝沙太了。

國民經濟實際上已為右派所毀滅了，在一九三五年世界其餘的國家在經濟上都表示有些改善，在O. E. D. A. 和中派統治下的西班牙，生產和國外貿易都反顯出實質的低落。西班牙的輸出從一九三三年的一、五四八、四二四、〇〇〇貝沙太，降低到一九三五年的一、三

九三、三七〇、〇〇〇貝沙太，這真是違反一般的世界趨勢的。

除了政府本身所遇到的困難之外，它又遭受着工農和人民陣綫運動的繼續增長的反抗。人民陣綫運動是要使社會共產兩黨的聯合陣綫和民主黨及激進的中等階級聯合起來。因為中立派的政策已和C. E. D. A. 通同一氣了，阿柴那所領導的左翼民主黨遂於十月暴動之後。在力量上有了很大的長進。

左翼民主黨已成了中等階級表達反法西斯憤怒的合邏輯的通路了。當西班牙民主黨的傑出領袖阿柴那被控告的時候，所有反法西斯的人都團結起來爲他辯護。連那些被迫害得不能公開集會的工人也得參加左翼民主黨爲阿柴那所召集的羣衆大會，以合法地表現自己的力量。這件事不單是一個權宜的策略，也是一個人民陣綫大聯合政策的結果。人民陣綫的政策是要使各黨各派在制止恐怖，打倒法西斯，救護民主的中心問題下聯合起來，他們以爲民主政體是使西班牙進步的最善的工具。民主黨已回到下院，做着反法西斯陣綫的代言人了。

一九三六年那個有關命運的年代到了。那時勞伯爾斯以爲已到了把民主政府獨占過來

的時期，於是極端相反的爭論就起來了。柴廉拉總統不信那時已可由民主政治直接過渡到法西斯獨裁。因此，在一月七日，議會被解散了，規定於二月十六日和三月一日進行改選。

這次運動中實際上只有一個問題，就是民主政治反抗法西斯主義。

第九章 人民陣線

十月的暴動和挫敗使西班牙的人民，尤其是勞動階級，受了很多的苦難，但同時這次暴動也給了他們一個戰鬥的武器，以備在下次運動中應用。那個武器就是聯合。許多年來，腐敗到極點的君主政府之所以仍能存在，大部分是因為反政府黨的內部常有鬥爭。民主政府下的反動派好像沒有了這種幸運了。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七日，國中的進步分子進行着第一步的聯合，所謂聖瑟罷士梯安公約就是在那時由各民主黨和社會黨共同簽定的。這個公約載明了反君主共同陣綫，此外並沒有別的條款。無疑的，它是推翻君主的最重要的因子之一。到第二年，君主果然被推翻了。

但是聖瑟罷士梯安公約的限制却是很大的。它除了幾條應許信教自由和加泰隆尼亞自治的空洞條款之外，簡直都是消極的概念。這公約完全使社會黨屈就了最胆怯的，最動搖不定

的中等階級的民主黨，民主黨中甚至包含着像勒樂摩拉和柴摩拉等最頑固的人物。權力和責任，在中等階級和勞動階級的中間，分配得一點也不公平。

結果，聖瑟罷士梯安公約和君主政體一同死去了。第一次民主政府中的社會黨員把民主黨的缺陷都彌縫了起來。那時的勞動部長卡波婁羅在一九三一年春季所作的談話中，使這種線縫的功能，得了一個公式。他說：

「我接見了一個很有勢力的代表團，是巴塞羅納的實業家和西班牙商會的代表所組成的，他們向我表示，對於勞動階級的某部分所作的自私行動，深為驚懼。尤其在加泰隆尼亞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強迫性質的。代表團要求政府，採行有力的策略，以對付這種工人的行動。

「我回答說，以我看來，這種行動，和那些挾持資本逃亡國外，以抵制西班牙的人是同樣的不愛國的。這兩種妨害我們的新制度的運動，我們都不能容忍的。

「勞動階級在民主政府建立之後，當然不肯放棄它的要求，但同時它必須同意休戰。」但是這個休戰是用了勞動階級內部團結的代價來完成的。在民主政府成立後的兩年中，

社會黨共產黨和無政府黨之間的裂痕一點也沒有減少。社會黨所領導的全國總工會 (U. G. I.) 和工團主義派的勞動協會 (C. Z. F.) 仍舊繼續着衝突。同時勞伯爾斯的反動團體民衆行動黨和 C. E. D. A. 却已經修好了政治藩籬，準備來一次反攻了。

在一九三三年的年底，共產黨就開始請求社會黨組織聯合陣線，以反對勒樂政府，但是他們的請求都遭拒絕了。就在那時，卡波斐羅轉變了，他不斷地向着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策前進，主張和共產黨聯合。但在一九三三年，贊成他的人還是少數，社會黨的右翼領袖不里托 (Rodriguez Prieto) 和卑斯推羅 (Julian Besteiro) 都堅決反對和共產黨或無政府黨共同行動。

共產黨所主張的聯合陣線運動，直到一九三三年年底民主社會兩黨選舉失敗以後才開始進展起來。這個進步大半在社會黨的下級幹部中間，而且僅限於某幾個地方區域。一九三四年，在許多罷工和示威運動中，共產黨和社會黨已開始合作了。

在一九三四年的夏季，有一個因了「右傾」而被共產黨開除出來的毛林 (Joaquín Maurín) 發動組織一種空空洞洞的工人同盟。社會黨和毛林合作，把工人同盟視爲全西班牙

牙的模範組織。在起初，共產黨拒絕加入同盟，并對毛林和社會黨諸領袖施以嚴厲的批評，以爲他們對同盟的概念錯誤。

共產黨批評的主要點以爲工人同盟不過是一個各組織間的聯絡委員會，並不是由工廠和農場普選出來的羣衆組織。社會黨當這同盟是一個預爲革命時期設立的參謀本部，而並不會當它是一個將來或現在的日常鬥爭的傳導機關。共產黨的批評中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事實，以爲工人同盟在活動的領域中根本忽略了農民。他們以爲在一個農業佔優勢的國家中，這一點是應該積極主張的。因此就提議把工人同盟改組爲工農同盟。

共產黨抵制着工人同盟，而並沒有加入到裏面去設法改變他們，關於這一點，他們後來也追悔了。他們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廿三日終於改變了戰略，加入同盟，雖然他們並不會放棄批評。僅僅過了兩個星期，加泰隆尼亞，阿斯都里亞和北部各處的暴動發生了。官方以爲這次暴動是由同盟領導的。其實，除了阿斯都里亞以外，他們並不會起過作用。在叛變以前，甚至在叛變的前夜，社會黨的，共產黨的，或工團主義派的工會，和農民，失業者，兵士，都不屬於——或不能屬於——

——同盟的，所以同盟不能領導暴動，獲得勝利。這就是他們致命的缺點。

正在那時，人民陣線的主張已在法國略具端倪了。法國的共產黨和社會黨已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簽訂了合作的公約。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南特（Nantes）舉行的法國急進社會黨的大會上，法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托來士（Maurice Thorez）更提出了人民陣線的意見。據托來士說，人民陣線是要把工農中等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團結起來，共同奮鬥，以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改善勞動民衆的工作狀況和生活狀況。人民陣線的組成員必須通力合作，以反對共同的敵人，但同時他們毋須放棄獨立的行動和政綱。他更明白宣稱，並不委任或希望人民陣線來實行革命的改革——共產黨以爲那種改革只有蘇維埃革命才能完成。他們只希望人民陣線來擊退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來改善生活的和工作的狀況，同時能爲更高階段的階段鬥爭預備道路，以達到社會主義。

法國的事件在西班牙不久就起了反響。西班牙的共產黨就開始主張組織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以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危險。那時代表法西斯主義的，不單是勒樂和勞伯爾斯的集團，還有

里維拉的西班牙長槍會，哥科基（Garcachos）的西班牙復興會和勞伯爾斯的 C. E. D. A. 法國人民陣線的公約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簽字了，這件事大有助於西班牙的運動。

在一九三四年九月間西班牙的共產黨和社會黨組成了聯合陣線，接着就發生了十月暴動。同樣，在人民陣線縮成的時候，又來了另一個生死關頭，那就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的選舉。西班牙的人民陣線，建立比法國較緩，但它的效果却並不亞於法國的人民陣線。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正當選舉一月以前——共產黨，社會黨，阿柴那的左翼民主黨，波立奧斯的民主聯合黨，康配聶斯的加泰隆尼亞左黨以及寧毛林（Nin-Maurin）的馬克斯工黨簽訂了一個共同行動的公約。馬克斯工黨是方纔由毛林和安德斯烈寧（Andres Nin）的黨徒聯合組成的，人數較其他各黨要少，勢力僅在加泰隆尼亞一處。安德烈斯寧是一個托洛斯基的信徒，後來因為不肯依照托洛斯基的命令，把本身的組織解散，加入到社會黨去，遂失了托洛斯基的歡心。這個黨不久就脫離了人民陣線，開始佈置着反對全部政策的障礙。

人民陣線的公約共分八部，差不多各簽字者都表示着某種限度的妥協和讓步。在大體上，

它一點不像法國人民陣線公約的急進，也一點不像法國人民陣線公約的能令左翼分子滿意。

第一部分規定了一個廣泛的特赦令。舉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以來因反政府活動而入獄的政治犯都可邀赦。政治犯的數目約計三萬——在歐洲，除德意之外恐怕要算最多了。它又提明，一切因政治原因或政治罷工而被開除的官吏和公私企業中的工人，應立即使其復職。

第二部分答應改良司法，以補救民主政府憲法上的保證的不足，改良議會和省市的法規，担保私人安全，不得任意拒捕，使監獄制度合乎人道，調查警察和軍隊的腐敗。

第三部分答應農民減低賦稅和租金，增加農村信用借款，重新調整農產品的物價和頒佈新租地法。第四部分規定保護小工商業。第五部分是為失業問題的，提出了一個廣大的公共工程的計畫。第六部分是說到通貨和金融的，答應頒布私人銀行的法規，修正直接稅的制度，由西班牙銀行以改良信用。第七部分主張重訂勞動法，規定最低的工資，由政府指揮及統一私人的慈善事業。第八部分是說到教育的，答應添設新的學校，創辦職業教育，為勞動階級的學生寬放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最後，公約上說明西班牙的國際政策完全依從國聯會的原則和策略。

這個公約一點不能說是革命的。有許多地方，它並沒有實踐勞動階級的簽字者的期望。然而它確然是進步的，它在行將到來的選舉中已爲一切進步勢力確定了合作的基礎。如果人民陣線獲了勝利，勞動階級相信這公約就會把數千萬的政治犯釋放出來，這些政治犯能使他們的鬥爭獲得新的生命，新的力量，和新的感應。公約的本身以後可依着經驗的要求而修改的。

這時候，民主政治的維護者已經聯合了他們的力量——無政府黨和馬克斯工黨除外——他們就準備從事二月間的選舉戰爭了。他們的解放或滅亡都將在這次選舉中來決定了。

第十章 勝利和陰謀

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是西班牙歷史上存亡所繫的日子。人民陣線的大勝利把法西斯主義者的希望打得粉碎了，在那一天，法西斯主義者，保王黨和其他民主政治的敵人眼看得他們所苦心經營的，利用民主政府的計劃，已被反法西斯投票的崩雪壓沒了。他們從未想到人民陣線會有這樣優越的勝利。最後一步，他們只得設法使人民陣線陷入僵局。他們相信，萬一僵局發生，議會就會現出不可調和的分裂，這樣，它就不配做行動的工具了。如果局勢真的如此，權力的發源就會落到軍隊的身上。那當然能令法西斯主義者滿意的。

對右派的不滿意，對法西斯策略的恐懼和不信任，對屠殺一九三四年十月罪犯的憤怒，對O. E. D. A. 的鼓惑的失望——這許多細流都匯聚到人民陣線的怒潮中，把議會中反動派的把持都掃蕩無餘了。人民陣線勝利遍及了西班牙全國。在一九三三年十月獲勝的右派集團，現

在被集中於人民陣線的左派打敗得落花流水了。越反動的領袖，在選舉中失敗得越利害。在西班牙史上，從來不曾有過這樣重要的選舉。它的結果竟震撼了世界。

這次，人民陣線在競選運動中竟說服了許多無政府派的工團主義者投票，他們以前是絕不染指的。工人同盟開始把共產黨社會黨和工黨主義者集合起來。這個聯合的無產陣線再投身到更廣大的人民陣線的中間。

這次存亡所繫的選舉的詳細數字，不單是記錄着人民陣線的勝利，對於昭示內戰的爭點也是很有價值的，議會中四百七十三席的總數中，人民陣線各黨獲得了二百六十八席的絕大多數，右派，中派和道地的法西斯各黨失去了一百四十七席。西班牙已一致把民主和進步的責任付託在人民陣線的手中了。

選舉結果的最後數字，把議會中各派的陣容表明如下：

人民陣線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三

多得

左翼民主各黨

一五八席

六二席

九六席

各工人黨

一一〇席

五九席

五一席

總計

二六八席

一二一席

一四七席

中派和右派

中派

四八席

一三九席

九一席

右翼各黨

一五七席

二一三席

五六席

總計

二〇五席

三五二席

一四七席

依照最主要各黨的構成，其變化如下：

人民陣線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三

得或失

左翼民主黨（阿柴那的）

八一席

七席

得七四席

民主聯合黨（波立奧斯的）

三六席

二三席

得一三席

加泰隆尼亞左黨

二九席

二三席

得六席

社會黨	九八席	五八席	得四〇席
共產黨	一六席	一席	得一五席
其他各左黨	一八席	九席	得九席
中派和古派			
急進黨（勒樂的）	八席	八〇席	失七二席
C. E. D. A.（勞伯爾斯的）	九四席	一一三席	失一九席
農黨	一三席	三九席	失二六席
自由共和黨	一席	九席	失八席
加泰隆尼亞右黨	一一席	二三席	失一二席
保守黨	三席	一八席	失一五席
保王黨	二四席	三二席	失八席
其他中右各黨	五一席	三八席	得一三席

參加選舉的民衆也比一九三三年來得多。舉例來說在瑪德里，一九三三年投票的人數佔全選民的百分之七五·〇二，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却佔百分之七七·四八。其他各主要城市的數字是：巴塞羅納，一九三三年，百分之六〇·一五，一九三六年，百分之六九（巴塞羅納的數字之所以特別低，是由於無政府派工團主義者的拒絕投票，一九三六年數字的增高是歸功於該派對投票態度的改變）；巴達和斯（Badajoz）一九三三年，百分之七四，一九三六年，百分之七五；馬拉加（Malaga）一九三三年，百分之五一·七六，一九三六年，百分之八〇。

西班牙的民衆已經發言了。

法西斯主義者和保王者對選舉的結果都痛加攻擊，勞伯爾斯在辯論報上宣告着說：「這問題是一個叛亂，是一個用着社會主義這個正敵以反對法律和秩序，以反對宗教，財產和家庭的尊嚴，以反對民族統一的叛亂。」

以德謨克拉西的方法所獲得的德謨克拉西的勝利，竟被西班牙舊制的擁護者視為叛亂。

保王黨員索德羅在投票以前，已經較索直地提出這問題了。他說：「西班牙的德謨克拉西必將不可避免地引到共產主義那裏去的。」因此德謨克拉西是必須毀滅的。

在德謨克拉西使人民陣線在選舉上獲勝之後，法西斯主義者祇有一個方法，可以「改正」民意了，那就是他們已經用過的老方法——壓迫、恐怖、流血。民主政府是在這樣快樂的精神中產生的。他們對於君主的廢黜，對於目前選舉的勝利都歡喜得不可名狀。他們大不相信反動派會用最後的手段。

選舉勝利後民衆第一個念頭就是要打開可恨的監獄，那裏，從一九三四年十月以來，有三萬個兄弟、姊妹，子女朋友和同志受着禁錮。民衆的耐煩竟衝破了一切的界限。有幾個監獄受着羣衆的襲擊，囚犯都被釋放了。他們急於要使勒樂和勞伯爾斯恐怖中的受難者恢復自由，竟至不顧一切。這些受難者的罪名就是要結束封建的，保王黨的和法西斯的統治。政府趕忙釋放了三萬獄囚。接着又很迅速地使數千因參加十月活動而被開除的工人和僱農恢復了職務。如果柴摩拉仍舊做着西班牙的總統，議會的勝利就不能算是完全的。柴摩拉，在大多數西

西班牙人民的眼光中，是一個屠殺阿斯都里亞工人的主要的共謀犯，是一個勞伯爾斯和勒樂的順服的代理人。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彈劾柴摩拉總統的辯論開幕了。社會黨的右翼領袖不里托 (Indalecio Prieto) 代表着議會中的多數黨發言。他像律師一般地列舉了柴摩拉的罪狀，并宣告着說，柴摩拉的繼續在位，是違反二月選舉中所表示出來的民意的。勞伯爾斯為柴摩拉辯護。他像一個聰明的耶教士一般地，在辯辭中處處向民主黨打動，叫他們和社共兩黨分離。那種辯辭在人民陣線的目光中當然是更可罪責的。共產黨的議員罵柴摩拉是殺人犯，並大呼着說：「把他監禁起來以抵在阿斯都里亞所犯的罪。」

在驅逐柴摩拉的投票中，贊成的是二百三十八票，反對的是五票，其餘的都放棄投票。只要有二百零九票就可以廢黜總統了。於是議會的主席波立奧斯就變成了第二次選舉前的過渡總統了。

在四月二十六日產生選舉總統的代表的時候，保王黨和法西斯黨都放棄投票。人民陣線得了壓倒的勝利。五月十日，人民陣線選舉唯一的候選人阿柴那為第二次民主政府的第二任

總統。

社會黨和共產黨曉得右翼各黨正在積極努力，以謀拆散左翼各民主黨和各各無產黨間的聯合，他們就立即表明對阿柴那政府的立場。他們各別地設法阻止人民陣線隊伍的破裂。由於法西斯的消極抵制和經常搗亂，局勢已愈趨嚴重，社共兩黨的行動也愈趨一致了。

右翼各黨乘間引起阿柴那和他的黨徒的——尤其那些在人民陣線中較阿柴那更右傾的分子的——恐懼，他們揚言着說，因着民主黨的助力而獲得選舉勝利的普羅列塔利亞，現在要背賣它的同盟者了，他們要跨過同盟者的身體，以達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以達到波爾雪維克主義。

爲欲打破這種論調，在選舉後不久，左翼社會黨的機關報克拉列達報（*Claridad*）就著文聲述卡波婁羅及黨內多數人的立場，它說：

「我們將用一切必要的決意，站在政府方面，以助其實行共同的政綱，雖然這政綱並不能令我們全部滿意。但是我們對政府，也不再像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一樣，加以無限制的

信任。那個教訓是太嚴酷了。我們爲欲保持勞動階級的警惕，決不肯放棄批評的權利。現在勞動階級正向着最後的目標邁步前進，若政府有絲毫軟弱的表示，我們即當號召勞動階級以反對它現在的同盟者。」

共產黨的總書記，瑪德里區的議員狄阿士(Jog. Dian)當人民陣線勝利的消息傳出時，也發表了一篇下列的同樣性質的聲明。

「人民陣線必不可任其解體。反之，我們必須把它加強起來，並給以一切可能的活動。我們相信共產黨社會黨和無政府黨必須繼續共同行動，在工農同盟的組織中堅固地聯合起來，再進而和左翼民主黨及德謨克拉西的羣衆結合，要實現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革命的終極的涵義，這是最好的保證。」

連那些比阿柴那更右傾的領袖對復興的民主政府的成功也表示着熱誠和希望。舉例來說，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的下半月舉行的民主聯合黨的大會中，波立奧斯也列舉着民衆聯合的成功，并主張這種聯合必須繼續保持，以反抗法西斯的挑戰。他說：

「我們在二月中勝利了，重新負起了執掌民主政府的命運的責任。此後就顯示出三件事實：第一，實踐了人民陣線公約的義務，第二，廢黜了民主政府的第一任總統，第三，造成了西班牙的現狀。讓我們把這三件事實來考慮一下。

「自二月十六日以後，我們已經完成了下列各事：大赦政治犯，使開除的工人復職，作成了改革保證法庭（Guaranty Tribunal）改革治安法，和改革司法的草案。

「一個政府能把所應許的事情，實踐了這樣多的一大篇，是很難得的。我的證言是公正無私的，因為我本人並不參加內閣的工作。但是我們不單應在信守人民陣線公約這一方面督促政府加緊步伐，同時在其他方面，我們也應作同樣的努力。

「當這些工作完成時，人民陣線的各黨應否各自分離呢？在這答案中就存在着一個嚴重的責任問題。以我和民主聯合黨看來，這事是無所用其選擇的。當各反對派繼續向民主政府襲擊時，人民陣線是必須保持的。

「人民陣線公約是責令各民主黨，有依照原約共同保持勢力的義務的。這條款也有改變

的可能。但是，要怎樣才能把它改變呢？它的改變是不能違反民主黨的政策。同時請容我說明我們並不拒絕把人民陣線的政綱加以擴充，我們也並不拒絕把社會黨要想握權的隱說加以考慮。

「那些在黨的紀律中負有特殊任務的人，請聽我幾句最後的話。你們在分派定的城市中，不要放棄警備的崗位。這不單是你們的意念叫你們這樣做的，同時也是爲了祖國的安全。」

普羅列塔利亞各黨把二月勝利及人民陣線所主持的民主政府的成就，開了一篇下列的清單：

- 一、一九三四年一月後因參加政治活動而被開除的工人都一律復職了，并規定給以三個月至六個月的工資，以補償其損失。
- 二、因一九三四年十月事件被捕的政治犯概行赦免了。
- 三、恢復了加泰隆尼亞半自治的地位；答應了比斯開自治。
- 四、使八萬七千個農民有了田地，這些農民連家族在內一共包含五十萬人民。使那些被

地主逐走的農民恢復了原位。

五、恢復了民主政府初期的社會立法。

六、解散了幾個較小的法西斯團體。

七、把幾個警署中的法西斯分子清除了出去。

八、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以判明十月屠殺、壓制、禁錮和非刑的責任。

在勞動階級各政黨和各工會的隊伍中，有兩派勢力在進行着。但尤其重要的，是聯合運動正在發展起來。同時反動派也竭盡力量，以醞釀着分裂，以挑動互相牽制的罷工，以阻止勞動階級更密切的聯合。

二月十六日之後，社會黨所領導的各工會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各工會之間的聯合，以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之間的聯合，要算最著成效了。社會黨和共產黨組織上的聯合運動——就是兩黨的合併運動——也大有進步。

當共產黨的統一勞動總同盟和社會黨的總工會聯合起來的時候，這個結合的組織就發

展得很快，遠超過兩派勢力的總和。這個結合的團體仍舊叫做總工會，在六月間它已有九十四萬產業工人和二十六萬農業工人做它的會員。

只有無政府黨的很有勢力的全國勞動協會仍舊留在外面。這個全國勞動協會反對着工會的聯合，但同時不能乾脆地屏除勞動階級一致團結的意見。因此在一九三六年的全國勞動協會的大會上提出了一個聯合的條件，主張社會黨和共產黨應先和人民陣線分離，然後再組織新的聯盟。社會黨和共產黨看到這條件，不單是一個危險的討價，要想拆散他們和左翼各民主黨的聯合——這正是法西斯黨所希求的——同時也是無政府黨拒絕聯合的表示。

其時，卡波婁羅所領導的社會黨的瑪德里黨部，已經通過了一個決議，準備在下次社會黨全國大會中提出，促成和共產黨進行組織上的合併。爲了這個決議，社會黨的領袖中遂發生了嚴重的裂痕。

卡波婁羅是毫無疑義地爲大多數社會黨員所擁護的，這在後來的內戰中可以得到證實，而社會黨右派領袖不里托却想設法把他排除出去。這個社會黨分裂的驚人的危險，以及後來

罷工風潮中法西斯派的挑撥所造成的嚴重局勢，以及無政府派工團主義者和聯合總工會之間的衝突，都大有利於法西斯派的事業。

共產黨的正式機關報孟陀奧勃里羅（Mundo Obrero）報對法西斯派，托洛斯基派以及無政府工團主義派拆散人民陣線的努力深表憂慮，它發着警告說，不論在任何情勢之下，各左翼民主黨和各無產黨的聯合行動是必不任其破裂的。

在內戰未爆發以前，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已經投下了一個內戰行將到來的黑影。在選舉不久以後，法西斯派就克服了他們的沮喪。他們不顧民衆的壓倒的勝利，不顧勞苦者爭取政治所保證的經濟條件的決意，仍舊表示出一種驚人的，挑撥的大胆。

最初，有產階級訴諸一致的經濟消極抵制，以答覆人民陣線選舉的勝利。資本輸出的數目，值數萬萬貝沙太，他們大量提取銀行的存款，裝運現金出國，并應用各種操縱金融的方法，以迫令貝沙太的國際匯價低落。他們故意使營業停滯起來。連那些大地主也以消極抵制相恐嚇，把大塊的土地荒廢起來。他們宣告着說，僱農的工資高漲，農民又爲了要分配土地擾攘不休，威嚇

着他們對收穫物的主權，他們從事種植已無利可圖了。

四月十八日，勞伯爾斯，索德羅，和聞多沙（Juan Ventoza）共同向阿柴那提出警告，叫他們必須把國家從波爾雪維克主義和紛擾中挽救過來，他們并威嚇着說，「法律和秩序」若一天感受威脅，西班牙的經濟就一天沒有改善的希望。

右派批評阿柴那的目的，是想叫他和左翼的各無產黨分離。在答覆這些批評時，阿柴那宣告着說：「你們以為在某天早晨醒來時，就會看到共產主義統治着全國了。我們的國家決計不會有這個危險的，西班牙所急切需要的是社會的正義。我的目的是在一方面防止少數人積聚大量的財富，一方面防止多數人挨受飢餓和貧乏。」

西班牙的工人要求迅速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很和勃倫政府成立後的法國工人相像，雖然他們的組織和貫徹的程度並不相同），農民直接地圖謀解決土地問題——這些事實是法西斯黨所最反對的。

三月間充滿着暗殺和騷擾。還有許多明顯的徵象，表示法西斯黨不肯接受民衆選舉的決

定，也不肯接受繼起的工農行動。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法西斯黨圖謀行刺社會黨的著名議員阿士華（Luis Jimenez Asua），結果把他的同伴兼衛士擊死了，阿士華本人幸免於難。刺客一共有五個人，用着美國式棍徒的方法，從一輛駛行的車上，向阿士華和他的同伴開放排鎗。在法西斯黨人中，美國棍徒的暗殺方式變成很流行了。他們有人供給金錢，車子和機關槍，很易使騷擾進行，很易造成一種人民陣線不能維持秩序的空氣。

在四月間，早就有謠言了，民間盛傳，軍事政變已在開始進行了，軍官們即將創立里維拉式的軍事獨裁了。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四日，正當民主政府成立五周年的前夜，審判官庇特里格爾（Manuel Pedregal）被法西斯黨徒槍殺了。據他們的推測，他的罪名是因爲曾經判決過謀刺阿士華的六個法西斯黨徒。民衆就襲擊了幾個法西斯的黨部，擊斃或擊傷了部內的人員，以作報復。那些有窩藏軍火嫌疑的教堂，也被侵入，有時竟被放火焚毀。

四月四日，孟陀奧勃里羅報上早就公布了共產黨對阿柴那政府所決定的政策，并警告着法西斯主義的危險。它說：「法西斯主義預備用武力來打擊一下，以冀建立血污的獨裁。這件事

在我們的面前興起了一種迫切的需要，我們必須加強並擴大工農民團，使其成爲一種民衆式的、廣泛的自衛組織。」

共產黨的書記狄阿士，在四月九日喀他基那（Cartagena）所作的演說中，宣告着說：「現在你們可以看到，C. E. D. A. 爲什麼要裝出一種退出議會的姿態。這是爲了什麼，你們知道嗎？因爲他更容易和軍隊勾結（在軍隊中你們會找出許多民主政府的敵人，）因爲他可以和保安隊勾結；因爲他可以在俱樂部中和小姐們的閨閣中進行密謀。在那些地方你們會找出許多軍器。我們必須把他們清除淨盡，必須及早行動，以免後悔莫及。」

共產黨很尖刻地抨擊着阿柴那總統和吉羅格（Casares Quiroga）總理，以爲政府應付日趨顯明的政變，手段太嫌遲緩。它指出，在半島上被免職的法西斯派的軍官，長槍會和 C. E. D. A. 的會員，都被派到摩洛哥去，并出他們更高的薪水。里夫已成了招募法西斯的中心，勞伯爾斯常到法國作神祕的旅行，他自稱這些旅行爲「取樂的遊歷。」實際上，他是去和法西斯內戰的經濟老板馬爾起及亞豐瑣王會商的。索德羅在臨死數天以前還說過，法西斯主義是西班牙君

主政府的產婆。

阿柴那的政治報 (La Política) 警告着右派的各黨，說他們的挑釁已經超越了一切界限。它說：「此後，我們要取決於自衛的本能了。」

一枝工人的防守民團組織成立了，目的在反對日會增長的法西斯的攻擊。他們輔助政府，維持公安。這些民團是駐紮在瑪德里的近郊的。他們在來往的車子中查抄軍火，夜間在可疑的行人身上查抄文件。他們的紀律很好，和政府共同合作，以維持秩序。民團的團員中有左翼民主黨的青年，有農民，有共產黨員，有社會黨員，也有加泰隆尼亞的國民革命黨員。

騷擾，武裝衝突，法西斯的挑釁，罷工，沒收土地，擲炸彈，暗殺，經濟的消極抵制，以及富有的資本家和有地產的貴族的頑強抵抗，都很惡劣地繼續發生。經過了整千次分裂的示威，從雇主同盟休業起到軍官叛變爲止，反對派已明白表示，不肯讓民主政府進行着貫激人民陣線政綱的工作。法西斯派和其他的保守派的懼怕是很對的，他們以爲封建隄防上一個小小的缺口就會釀成革命的潰決的。

反對派武器的犀利真堪自誇。各次衝突中雙方死的人數約略相等。政府要想防阻法西斯黨徒，就把那個盲目做倣希特拉的里維拉和八個長槍會的會員拘捕了起來，里維拉的團體也被解散了。話雖如此，阿柴那政府却並不把里維拉以背叛民國論罪，它僅僅控他「擾亂治安」，給了他一個較輕的判決。

在內戰爆發的兩月以前，接着軍事叛變的謠言，在瑪德里外面的阿爾卡拉·提·亨納來斯（Alcala de Henares）軍營中發生了一樁事變，這事變對政府已可算是最充分的警告了。五月十八日，當騎兵軍官和工人發生了一次衝突以後，吉羅格總理決定把兩團軍隊調到伐倫西亞和薩拉曼加兩團中的軍官拒絕調動命令，實行叛變了。這次叛變不久即告救平，共有六十二個上下級的軍官被捕。但是政府對這個軍隊上部不安的確鑿的徵象，注意得還不夠充分。

在六月中旬，各種事態顯然已達到危機了。法西斯軍官的組織，西班牙軍人聯合會，對政變的準備已進行得很多了。那瓦拉（Navarra）已有許多軍器秘密運入，保安隊的制服已在私自製造，許多行跡可疑的軍官，都到了軍事的要地——這些事實政府都已覺察到了。

同時有二十五萬工人參加的大罷工還在繼續。那時，法西斯黨人正在利用每一不安騷擾和經濟怠工的機會，以冀挑起內戰，罷工運動當然要使阿柴那政府舉措不安。社會黨和共產黨察知了這個嚴重的危險，就積極設法，以使罷工運動在最有利的條件下，獲一最早的解決。但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却並不十分關心人民陣線的問題，他們仍舊表示反對。後來才知道法西斯黨人，特別是西班牙長槍會的會員，曾經得到上級機關的訓令，叫他們在各處盡可能地嗾使罷工的擴大和惡化。七月六日，在一個被捕的長槍會會員的身上抄獲了許多文件，叫他們「盡可能地推動并醞釀最多人數的罷工，尤其在公共機關中。」

六月六日，復僻的謠言使瑪德里城內大感不安。私運軍火的諜報加多了。共產黨就向工人呼籲說，鑑於以前法西斯叛亂的危險，解決罷工的時期已經到了。

六月九日，法西斯政變的謠言復熾了。保王黨甚至散播流言，說無政府工團主義派企圖顛覆政府了。政府在一所房子中搜獲了許多保安隊的服裝。

當法西斯黨把全西班牙投入血污中的一月以前，勞伯爾斯和索德羅對人民陣線大施好

像有歷史意義的抨擊。他們想預為未來的叛變鋪下合乎道德的基石。六月十七日，勞伯爾斯在議會中抗議着說，全國已有二百五十個教堂被暴徒焚毀或部分地搗毀；已有二百六十九個人民被殺，（其中一百六十個是右派，還有一百零九個他不曾提及，當然是被法西斯派所殺的了。）已有一千五百個人民重傷。他對二月選舉後所發生的三百四十次罷工深致不滿，并描繪出十家右派報紙的印刷所被搗毀的情形。

索德羅公開地提出了法西斯叛變的威脅，以作這抨擊的奧援。他無異向左翼民主黨提出最後的警告，叫他們和普羅列塔利亞及農民分離，他大呼着說：「軍隊已變成忍無可忍了，萬一發生事故，政府是應當負責的。」

左翼各黨的大報克列達報 (Claridad) 社會報 (El Socialista) 孟陀與勃里羅報 (Mundo Obrero) 政治報 (Politica) 都一致駁斥勞伯爾斯和索德羅的抨擊。他們發表了被法西斯軍隊中的棍徒所暗殺的，所打傷的，或所恐嚇的工人和人民陣線中的人數。孟陀與勃里羅報的主筆黑南提士 (Jose Hernandez) 特別針對着襲瀆神聖和打毀教堂的抨擊，發

表下面的意見：

「焚燬教堂是應由誰負責的呢？我們不能單純地以一部分擺脫宗教成見的人民對教堂的恨惡，來說明這個事件。事實是這樣的，西班牙的教堂已是法西斯派組織的中心，並且已成了他們的武器的儲藏所了。在大多數的事件中，教堂被縱火之後，就發現出許多密藏的軍火。那些反對工人示威運動的人，就是從教堂中取得武器的。那些暗殺工人的法西斯黨徒就是以教堂為通逃藪的。教堂既站在反動和法西斯主義這一邊，民衆對教堂的——並不是對天主教的——憤怒就可想而知了。在許多事件中，並不是民衆直接向教堂縱火的，而是反動勢力激令民衆縱火，以冀引起信徒的反感。共產黨向民衆說明，焚燒教堂和寺院的行動，是適足以助成反革命的。」

七月十二日，地獄開放了。卡斯提羅（Castillo）中尉被人刺死了。他是襲擊隊著名的青年隊員，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也是反法西斯軍人聯合會的會員。在卡斯提羅中尉被刺的六小時之後，索德羅也被人暗殺了。瑪德里都知道行刺卡斯提羅的命令是索德羅所發出的。

殺死西班牙主要的保王黨員也是最激烈的法西斯黨員索德羅的，是一個保安隊的上尉。這位上尉於七月二十九日在瓜達拉瑪山地的雷翁 (Alto de Leon) 口，爲了保衛瑪德里，捐棄了自己的生命。在索德羅的葬儀中，法西斯黨企圖騷動，結果有兩個黨徒被警察槍殺。兩家右派的報紙，依帕卜報 (Epoca) 和洽報 (Ya)，因爲在描寫索德羅被刺的幾篇文章中，鼓動攻擊政府，都被禁止出版。

西班牙已到了歷史上最嚴重的時期了。社會黨共產黨，工團主義派，左翼民主黨及其他民主政府的擁護者，都知道危險的時鐘聲已經打過了；但他們還沒有充分地把握住這個危險的程度。七月十三日，正常內戰開始的三天以前，社會黨，共產黨，全國總工會和許多青年的聯合團體共同開會，一致宣誓堅強團結，黏附在人民陣線之中，擁護政府，以反對法西斯派建立獨裁的威脅。這誓約上說：

「人民陣線中的各工人團體的代表，在社會黨執行委員會的會所中共同集議，草成了下列的文件；

「下列簽字者所代表的政黨和工會，鑑於與民主政府及普羅列塔利亞爲敵的反動分子的陰謀，就舉行會議，成立了無條件的一致的協約，決以他們後面的羣衆力量扶助政府，以保衛民主政制，和抵抗反動派對民主政制的攻擊。

「這個協約並不是暫時的，反之，它將和需要這協約的環境同其恆久，以加強人民陣線，并實踐經那些已被敵人放入險境中的，勞動階級的計劃。

「全國總工會代表羅埃斯(Manuel Lois)社會主義青年同盟代表卞立羅(Santiago Carillo)，共產黨代表狄阿士，人民社代表陀名奎士(Edmundo Dominguez) 社會黨代表阿士華。」

在卞斯提羅和索德羅的葬儀以後，瑪德里是平靜得驚人。這是暴風雨以前的沉靜。

第十一章 內戰的幕後

真的，當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法西斯的叛亂爆發時，全西班牙的人民並不感得驚異，但是他們對叛亂的範圍、深度和嚴重，却並沒有充分的估量。政界中最初的印象，以為這次叛亂是桑耶雅進兵塞維爾的一九三六年版本。甚至正當叛黨調集勢力的時候，政府就發出公告，說叛亂已經全盤解決了。在其他的情形之下，這種樂觀主義或許會變成不可救藥的。

索德羅的被暗殺並不純然是一種復仇或個人恐怖主義的行動。這是民衆憤怒的風信標，是索德羅在議會中接二連三的威脅所激醒的。索德羅本人代表着王族、教士和地主的寄生利益。他是這些利益的代言人。他的被刺是一個政治的警告，說明第二次民主政府的第五年已和第一次民主政府絕對不同了。這警告雖然是自然發生的，却提出得並不錯誤。

索德羅的被暗殺，使政府陷入了危機，反動派在抗爭中，除叛變之外，已經用盡了一切方法。

他們已經退出議會，宣稱不再回來。他們已經在阿爾卡拉·提·亨納來斯 (Alcala de Henares) 進行過預演。他們已經作過多次的威脅。索德羅的被暗殺突然把所下的賭注增加了，反動派要想再下賭注，只有用實際的叛變了。

叛變的性質嚴重，佈置周密，決不是短期間所作成的。原來的計畫是主張向全國各主要中心實施猛烈的突擊。要實現這個計畫就非有共同的行動不可。我們看到多處前線上的共同行動，就知道這次叛變是有過多時的談判和精密的設計的。

叛變的發生差不多一如原來的計畫，但是因為計畫不十分完密，使那個動搖不定的政府，有時間和機會，決意行動，以抵住這首次的突擊。正像繼起的事實所證明的一樣，叛變的成功是完全靠着全國五六處的合拍的襲擊。這五六處地方各有數百哩的距離。那些慣於單獨叛變的將軍們，也都共同動作，勉強獲得了或然的勝利。

政治上的和社會上的叛變形態在數月以前早就有了成就了。二月選舉以後，大量的金錢開始很神祕地輸出國外。食糧被他們有組織地壟斷起來，以冀促成各城鄉的饑荒。反動派的議

員在議會中竭力鼓動黨徒，反對政府。但是政治社會的一方面和軍事的一方面是嚴格地分工合作的。叛變一經爆發指揮權就握在將軍們的手中了。

軍事叛變是靠著八個主要的將軍發動的。這些人實際上恰是一九三五年勞伯爾斯政府下的參謀本部的全體。他們是富蘭科，哥代特（Manuel Goded），蘭諾（Queipo de Llano），摩拉，樊求爾（Joaquín Fanjul），卜班尼拉斯（Miguel Cabanellas），巴塔脫（Domingo Batet）和桑耶雅，他們的人數已多過上次叛軍領袖的一倍。

這八人中，當然以桑耶雅為最年老，最聞名。他更是最熱練的叛亂老手。共產黨每次說到最近的叛亂，就稱它為一九三二年的桑耶雅叛變。他此時已有六十四歲了，生平做過許多成功的事業。他是里維拉的知友，是獨裁制的忠實擁護者，是「里夫的獅子」。一九二三年他做過薩拉哥撒（Saragosa）的都督。在一九三一年革命期間，他擔任過指揮保安隊的要職。民主政府成立後，他降級為騎兵司令——實際上是一種侮辱。

一九三二年的叛變壓平後，他站在瑪德里的軍事法庭前受審了。他的代理律師，為他辯護，

著重對於社會黨的攻擊，打算用這種戰略，向柴摩拉總統呼籲。總統是有權把死刑減輕為無期徒刑的。

「桑耶雅將軍是想設法使西班牙免受社會主義的危害，這是他人所認為必要的，」他的代理律師大聲疾呼地說。

桑耶雅將軍被判處了死刑，但是他的判決果然不出所料，獲得了減刑結果，他在加的斯度了一個短時的刑期之後，就被開釋了。此後，他被迫流亡到葡萄牙。他是一員自一八四一年後不死在西班牙的叛將。

富蘭科的履歷是很和桑耶雅相像的，但是或許還要燦爛些。他是被人目為英才的，只有四十五歲年紀，在軍隊中要算年齡最輕的將軍。富蘭科在三十二歲時首次擔任軍職。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他擔任摩洛哥的客籍軍司令，大著聲名。在一九三四年征服阿斯都里亞工人的戰役中，他的大名和那個簡短而活現的頭銜，「屠夫」聯在一起了。在一九三五年的一個時期中，他做着勞伯爾斯的參謀部長。那時，時常有人說他是受着勞伯爾斯或索德羅的象養，預備

扮演出希特拉的戈林，一九三六年二月選舉後，政潮重新轉向左傾，富蘭科就被逐出軍部，發送到加那列羣島上「充軍」，以為他在那裏，不會再作惡了。這又是另一事件，表示民主黨雖把反動派的羽翼打折，却並不會把他們本剪除。

在富蘭科未竊得「屠夫」的尊銜以前，摩拉要算是全西班牙所最恨惡的人了，他也在亞豐瑣王時期，和里維拉時期中做過學徒。在介於里維拉和民主政府之間的兩任內閣中，他擔任過全國警察總盟，這位置，使他能殘酷地處置罷工，急進的集會以及農民的騷動。在民主政府被導入的一月以前，摩拉辭職隱避了。當社會民主兩黨的聯合政府就職，摩拉是首次被通緝的諸人之一。他們他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中屠殺工人，那時警察向舉行葬儀的隊伍開鎗，是由他發的。忽然間，摩拉投案受審了，但是將軍們是邀特赦的。富蘭科再叫他擔任着活動的職務。

蘭諾將軍是另一個帝制的餘孽。在一九二四年，他在摩洛哥 里夫人的戰役中犯了幾件反叛的錯誤，就被里維拉政府削除了現任的軍職。此後他在君主政府上表現得很壞。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他在瑪德里的空軍站裏，與雷門富蘭科 (Ramon Franco) 空空洞洞地同謀着

推翻帝制的叛亂。這位雷門富蘭科就是富蘭科將軍的兄弟，後來曾做過駐華盛頓的西大使館的空軍武官。這次叛變不久即告救平，雷門富蘭科和蘭諾都出奔到葡萄牙，那個失意的西班牙軍人避難的友邦。當富蘭科將軍在位，他就把蘭諾招回，主持塞維爾的防軍。

巴塔脫將軍就是在一九三四年擊破加泰隆叛變，把康配聶斯判處三十年徒刑的那位先生，康配聶斯看錯了人，預先通知他叛變的消息，并限他於一小時內決定態度。誰知那個統率巴塞羅納防軍的巴塔脫於半小時之內，就發兵攻擊，不久以後，康配聶斯就被捕入獄了。

其餘各人也都有相像的履歷，不過不及以上各人的顯惡，他們都是西班牙有經歷的將軍，早已熟習了在帝制下所知道的一切。他們之所以容忍民主政府是因為力有未逮，一有權力，就要把它推翻的。



叛亂的計畫是叫富蘭科從加那列羣島回來以指揮摩洛哥。那個被政府放逐在巴利阿利羣島上的康配聶斯代特飛到巴塞羅納和巴塔脫共同主持一切。蘭諾是本來在塞維爾的。摩拉在北部。卜班尼拉斯在東北部的薩拉哥撒。桑耶雅也將從里斯本回來了。

富蘭科和蘭諾從塞維爾向西部的巴達和斯(Badajos)進兵，同時，摩拉的軍隊從北部下來。那時，法西斯軍的南北兩翼就可聯合一起，會攻瑪德里了。

七月十七日，叛亂在西屬摩洛哥的休達和美列拉(Melilla)以及加那列羣島的巴爾馬斯(Las Palmas)爆發了。富蘭科已經在位。這時候，瑪德里和巴塞羅納還平靜無事，政府竟發出了失之過早的公告，說摩洛哥已被鎮服了。當時，雖有政界的樂觀，蘭諾已佔據了塞維爾，摩拉和卡班尼拉斯也在北部開始了行動。

在瑪德里和巴塞羅納，亂事也發動了，但這兩塊地方，於七月二十日的下午，即告平定。

叛軍的勢力在瑪德里最感脆弱。左翼民主黨政府，恰巧在一九三六年選舉以後，把一切最頑惡的亂黨都驅出了京城，這使叛軍的計劃留了一個很大的缺口。他們委託了沒有軍職的樊求爾，擔任集合瑪德里防軍的工作。

雖然計畫曾經過仔細的預備，瑪德里的叛軍却始終不曾踏進過街道一步，轟擊樊求爾指揮下的蒙大拿(Montana)軍營，要算是唯一的劇戰了。後來，一位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對那

鮑瑪德里的插戲，寫出了下列的生動的報告：

「七月二十日，星期一，黎明時，全城不快意的睡眠被巨炸聲驚醒了。在屋頂上可以望見濃烟和火焰從古阿脫羅維也多斯（Cuatro Vientos）飛機場，以及卡拉班起爾（Carabanchel）其太非（Getafe）和佛克卜羅（Vicalcaro）諸駐屯所中出來，但是唯一稠密的礮火却在市中。經過了四小時的轟擊以後，蒙大拿軍營豎白旗了，因為下級軍官和士兵都不願反抗政府當局。

「許多法西斯黨徒和軍官已在礮位邊和胸牆邊送命了。抗抵削弱了，士兵又都倒戈，把那些死牘下來的軍官驅入了營中央的空院。政府軍衝入營中，看到他們和軍校的學生以及黑衫隊同在一處。一機關槍就把他們掃死了許多。營內約有二百具屍體，但都是血肉模糊，一點認不出原來的面目。

「在駐屯所外也有幾個軍官想用着誇張的宣告，說教式地煽惑士兵，他們也遭受了槍殺。其餘的叛變都被民團，警察和空軍懾服了。

「由於蒙大拿軍營不能首先制勝和其他軍營不能積極響應，最要緊的，由於士兵擁護的

游移，一次佈置得很周密的運動終於消滅了。大廠全部在叛黨的手中。後備來福槍的機鈕也已秘密地輸入了蒙大拿軍營。政府僅在軍械修理廠中獲得了一架重砲和二架野砲。此外就只有五千桿舊式的來福槍。

「他們用一輛啤酒廠的運貨車拖着大砲，並臨時湊集了發砲的人員。這個倉卒編成的砲隊却幹出了驚人的工作，他們竟克勝了蒙大拿軍營的戰壕白砲。」

在蒙大拿軍營降服以後，瑪德里雖然還有不少的戰鬥，但他們大都是暴徒和民團間的小戰。

巴塞羅納的叛黨較爲僥倖，因為他們的戰略更合時機。在七月十九日（星期日）黑夜的死寂中，有五千人正規軍，由法西斯黨人指揮，開入了城市的中心，並佔據小科倫（Cole）飯店和加泰隆那（Cataluna）廣場等軍路上的要地。他們在中等階級區和工人區中掘壕固守。在工人區中的海關、砲兵營和哥倫布紀念碑都被他們佔領了。

比及天明，政變的消息已傳遍了全城，形勢立刻危急起來了。工人們把鋪路的大石塊掀起，

充作障礙，這些障礙在上午十時就出現了。有少數工人在清晨就武裝了起來，向法西斯黨攻擊，或許他們已得了點勝利。下午，政府執行了一個最善的方法，廣播出解散一切軍隊的命令。叛軍中的下級軍官和士兵都人心惶惶了。在巴塞羅納大學中，立刻有四百個軍士轉變了過來。

最關重要的，是康配聶斯不再蹈一九三四年的覆轍了。他把軍火廠開放了，一任民衆自由取給。在一次慘烈的、血腥的巷戰之後，法西斯的指揮團，連哥代特將軍在內，於上午四時被政府俘獲了。

一星期之內就有約計五萬的工人武裝起來，組成了工人的民團。他們和保安隊，警察合作，主持着巴塞羅納和瑪德里的一切。他們巡邏街道，攻打狙擊者，并管理食糧的供給。工人們覺察了叛變的嚴重，知道了摩拉在爪達拉瑪山地的軍隊所加於瑪德里的危險，就無分男女，都很踴躍地陸續加入民團，担任前線的工作。

經過了簡短的談判之後，加泰隆尼亞反法西斯民團委員會於七月二十二日成立了。委員會中的各左派團體一致通過了一個頗列着目的的文件，這個文件是西班牙一切反法西斯勢

力第一次合作的成績。內容如下：

加泰隆尼亞反法西斯民團委員會宣言

依照加泰隆自治政府於本日所頒布的法令，加泰隆尼亞反法西斯民團委員會，議定下列數條，望全體公民，嚴加遵守：

- 一、建立革命的秩序，屬於委員會的一切團體都有維持這個秩序的責任。
- 二、委員會已指派必要的特派員數人，負責履行委員會的法令，以期保持統率和警備。諸特派員執行職務時必須攜帶證件，以資識別。
- 三、諸特派員是委員會所唯一信任的人員。凡行動不遵從特派員指導者，均將視為敵人，當由委員會議定辦法，加以懲戒。
- 四、夜間值班人員尤應特別嚴厲，以取締擾亂革命秩序的人。
- 五、早晨自一時至五時，祇有下列各式人等可在街上通行：（1）民團委員會會員團體所信託的人員；（2）由上述人員隨伴而認為可靠的人；（3）受環境驅迫，有正事離家的人。

六、爲欲招募人員加入反法西斯民團，民團委員會的各會員團體有權設立招募處及訓練場。招募的條件可在私人接洽中詳細制定。

七、委員會認爲必須建立革命秩序，以反對法西斯團體，但切望實行此種決議，不必訴諸紀律。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由於先發制人，叛軍處了堅強的地位。西班牙有八個軍區，司令部設在拉科命那(La Coruña)，不耳各斯，法拉多利(Valladolid)，薩拉哥撒，瑪德里，塞維爾，伐朗西亞，和巴塞羅納諸地。這八個軍區中，除瑪德里和巴塞羅納以外，都被叛軍握住了。他們在西北部佔領了不耳各斯，法拉多利，薩拉曼加(Salamanca)，基榮(Giron)，奧微陀，和判帕羅納(Pamplona)，在東北部佔領了薩拉哥撒和華斯卡(Huesca)，在中部佔領了托里多(Toledo)，在南部佔領了塞維爾，加的斯，加失里斯(Cadix)和哥爾多華(Cordoba)，還有西屬摩洛哥和巴利阿利羣島。可是，他們也成了樂觀主義的犧牲者。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塞維爾法西斯派的聯合報(La Union)

在封面第一行的標題上就說：「法拉多利縱隊已進瑪德里」，「不里托 (Indalecio Prieto) 乘飛機逃往荷國，『熱情之花』 (La Paasionaria) 在薩拉曼加被捕。」

武裝勢力的分野較法西斯派所意料的還要平均。當叛亂爆發時，服軍役的人數約有二三五、〇〇〇。正規軍有一一七、三五〇名駐紮在本部各防區中，有三八、〇〇〇名和客籍軍，摩爾軍駐紮在摩洛哥。此外，還三二、〇〇〇保安隊，一六、〇〇〇馬隊，一七、〇〇〇突擊隊和一八、〇〇〇海軍。法西斯派以為這些人的百分之九十是會幫扶他們的。

實際上，只有絕大多數的正規軍——約計百分之七十五——轉到叛軍的一方面去，這多半要歸功於富蘭科做軍政部長時的甄別徵募。保安隊的分配比較來得平均。誰控制這地方，保安隊就歸附到誰的方面。這對於法西斯派真是特殊的不幸，因為瑪德里和巴塞羅納的保安隊都是站在政府方面作戰的。大部分的突擊隊是維護政府的，他們的百分比差不多和正規軍維護叛軍的百分比一樣。

話雖如此，叛軍却全由國內曾受訓練的軍隊所組成的。摩洛哥軍尤為受過鍛鍊的，有經驗

的唯一軍隊。在北部，叛軍也像政府軍一樣，多半是招募攏來的志願軍。但在南部，情形就不同了，那裏，軍隊可從摩洛哥運送過去。到了八月中旬，巴達和斯 (Badajoz) 被克服以後，摩洛哥軍也可向北部安然移動了。

但在兩個國防部門中，法西斯派是感受了顯然的挫折。他們在空軍中從未有過多大的成功。民主黨對於拉攏航空人員是很有把握的。這完全是由於社會原因。第一，因為空軍是新近才成立的，它不像陸軍一樣，有封建殘餘在裏面生根。第二，因為空軍需要專門技術，爲「紳士的子弟」所不熟諳的，所以航空人員多半是中等階級出身的。

在海軍中，民主黨也佔優勢，這又是以社會原因來決定的。水手的奮鬥生活和寄生主義是絕不相同的。實際上在任何海軍中，船上的情形都是萬分嚴酷的，連英國海軍中近年也有了反對薪水低微和食物惡劣的反動。左翼的宣傳在海軍中也很有勢力。

大部分海軍的效忠，使富蘭科不能於戰事最初的兩星期中，把巨量的軍隊從摩洛哥運到本部。海軍在南部的巡弋，使海上運送有了極度的危險，富蘭科只好用飛機輸送，但這是很迂緩

的。這在方面，海軍又使政府有了組織防務和清查實力的機會。

但是法西斯派還有一個主要的，或許也是致命的弱點。他們除了在北部瓜達拉瑪山旁的老卡斯提爾（Old Castile）和那瓦拉（Navarra）之外，在民間並沒有羣衆的基礎，當政府開始武裝工人時，它就能徵發無盡藏的軍需和人力。大量的男子和婦女，其中有許多是從未拿過一槍的，都踴躍地向前線出發。在這種情形之下，法西斯派要想獲得勝利，只有把民衆全部毀滅。民衆是要抗戰到死的。

在南部，法西斯派是在極度敵視的區域中活動。舉例來說，在蘭諾佔領塞維爾以前，他不得不先把城中的工人區轟毀。多年的戰事使西班牙的民衆學會了游擊戰的技術，即使叛軍已佔領了目的地，他們仍舊要付出可怕的代價的，如果沒有適當的警力，他們休想詐取勝利的果實。後防的危險使他們不能迅速地進前。這在叛軍從塞維爾向巴達和斯推進時尤為明顯。在葡國邊境的巴達和斯終於被佔領了，但是這塊地方的農民是最急進的，以前，他們曾經毫無儀式地分配過土地。

在戰爭初期，從表面上計算起來，叛軍已攻佔了全國的一半，這一半從東北部的薩拉哥撒一直伸展到大西洋岸，只有極北部相近畢爾巴（Bilbao）的一狹條地方除外，再從薩拉哥撒引伸到哥爾多華（Cordoba），格拉那達（Granada）和塞維爾，成了一個很大的弧形。政府控制着東部的半壁，包含着一切大的海口，只有加的斯除外。但是這種計算是絕難望其準確的，因為許多法西斯派的地方不過是些敵視區域中的孤島，叛軍沒有餘力從事四鄉的征討。

還有一個情形是戰鬥中另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政府區的人口比叛軍區要密。據阿和拉報（Ahora）八月十九日所作的估計，政府的半壁中共有一千五百萬人，叛軍的半壁中僅有八百萬人。

爲了這種緣故，富蘭科將軍遂不得不借助摩爾軍，以反抗西班牙的人民。數百年來，摩爾人被逐出西班牙，後來在摩洛哥又被征服。桑耶雅就是在一九二〇年代征服摩洛哥的戰役中榮膺「里夫的獅子」的尊銜的。富蘭科也在這些戰役中成了殘酷幹練的戰士。法西斯的高級人員想把摩爾人對西班牙統治階級的應有的仇恨，轉移到反政府的路上。同時他們也知道這是

冒險的行動，因為這事甚至在他們自己的擁護者中，也難免要挑起反感的。他們一向以為摩爾人是些只配屠殺的東西。連送摩爾人這回事，使法西斯派要求民衆擁護的宣傳有了奇特的揭露，同時使人民陣線的宣傳有了憑信。人民陣線以為法西斯主義祇可安置在西班牙的死人身上的。

除法西斯派和正規軍以外，還有駐紮在摩洛哥的客籍軍和整批加入到摩拉的北軍裏面的卡羅斯黨徒（Carlists），也是擁護叛軍的主要力量。

西班牙的客籍軍是以暴徒和罪犯著名的，這枝軍隊是從全世界各國的社會敗類中招募來的，在摩洛哥，它絕不和人情有所接觸。它是孤零零的駐紮在一個離休達二十哩的大營中，一點受不到人類的影響。他們有自己的食物，軍火，軍妓和醫院。在五年的入伍期內，沒有一個軍士可以獨自離營。也從沒有人去設法提高他們社會責任的標準，因為客籍軍的工作完全是下流的。

卡羅斯黨員是一團花花綠綠的人物，戴着紅色的帽子，裹着綠色的臂甲，臂甲上面綴着一

個紅色的十字。他們的成因是略帶幻想的。

卡羅斯黨的糾紛開始於一八三〇年，那年四月五日，在位的國王非琅多七世（Fernando VII）用政務詔書，改變了王位承襲的系統。自一七一三年以來，西班牙是遵守着所謂舍拉法典（Salic Law）的，這法典應許男子有承襲王位的權利。非琅多的兄弟卡羅斯（Carlos）想承襲王位，做卡羅斯五世。

但是，非琅多在一八二九年又娶了瑪利克立斯梯那（Maria Cristina）做第二次的續絃，到翌年十月十日就生了一個女兒，叫做伊薩伯爾（Isabel）。瑪利克立斯梯那就強請她的丈夫，改變王位的系統，以傳給他女兒。後來非琅多病了，卡羅斯和他的維護者都十分惱怒，他們強迫着國王收回成命，那時他們以為國王要宴駕了。誰知非琅多竟恢復了健康，他又改變了對王位繼承的意見，終於傳給了他的女兒。

從此以後，保王黨分成了不可調和的兩派，僧望王位的卡羅斯黨徒就不辭勞苦地發動了四十年的內戰，其實，他們存在的原因早已消失了，只有對民主政府的憤恨依舊留着。從這一點

上，法西斯派就得了實益。

整個的勞動運動，民主運動，和民族運動都站在政府的一方面作戰。

共產黨，社會黨和政府黨並立着作戰，在西班牙歷史上還是初次。在一九三三年，他們的門戶之見是無可救藥的。在一九三六年戰爭開始時，連無政府黨的各領袖也發表出有利於民主政府的言論了。那時工團主義派的全國勞動協會諸領袖，對叛軍控制下的薩拉哥撒的工人，發了一個通令，叫他們援助政府，這是一個西班牙勞動史上劃時代的事件。他們以前以為法西斯派，民主派，社會主義派和共產主義派都是一丘之貉，就把他們統統放在一隻袋內，用同一根主義的戒尺敲打他們，現在顯然已改變了老政策了。

勞動運動中各派勢力都有了一個特性。他們把一切不同的意見，都擱過一旁，以謀執行當前最重要的任務，那就是保衛民主，以反抗法西斯的襲擊。

在八月上半月，法國共產黨的人道報(L'Humanite)發表了下列的聲明：

「西班牙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託我們向公衆宣布，以答覆某種報紙所發表的狂妄消

息。西班牙的民衆，在反抗叛變的鬥爭中，決不企圖建立無產階級的獨裁。他們只知道一個目的：就是保衛民主的秩序，同時尊重財產的主權。

「這個爲國家謀福利的工作，已得了勞動民衆的各社會階層以及各團體的合作，其中不但有民主黨，共產黨，社會黨，和無政府黨，連天主教徒的很保守的巴斯克（Basque）國民黨也在其內。這事實證明富蘭科所說的「西班牙有『馬克斯主義的危險』」的言論，完全是一篇謊話，并昭示出愛秩序的民衆所應負的責任，叫他們毫無例外的站在保衛西班牙秩序的一邊。」

社會黨最前進的領袖卡波斐羅在七月二十四日對巴黎沙愛爾報（Paris Soir）的訪員也作過很相像的談話：

「直至現在，西班牙的勞動運動中還有三種動向。在過去的數月中，我們已消除了許多紛爭的成分，但使我們隔離的事物仍舊很多。後來我們接到了首次的警告，說軍人已經勾給了一切反動勢力，正在準備決死的鬥爭，於是聯合陣線就立刻不折不扣地建立了起來。

「我新近才從瑪德里來，那裏溫和社會派，急進社會派，共產派，工團派，和無政府派之間在

以前仍有不同的意見的。後來，在一天之內，這些不同點都消滅了，我們立刻成立了好幾個各派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在西班牙各民主勢力中，已不再有黨派的紛爭了。那裏只有廣大的羣衆，準備犧牲生命，使西班牙脫離反動派威脅的惡夢。我們必須剷除好亂的分子，貴族和軍人。」

意卑里亞無政府同盟和工團主義派全國勞動協會在戰爭中也發表了一個性質相同的公報，以說明他們的地位。這公報上說：

「意卑里亞無政府同盟對（巴塞羅納反法西斯）委員會的態度是很溫和的。全國勞動協會正在竭盡力量，以使社會生活恢復常態。它已宣布終止總罷工，並立即解決一切懸宕的糾紛。某幾個產主所放棄的企業，已由工團指導下的工人實行接辦，但並沒有立刻採行無政府自由共產主義的意向。」

「最應首先著手的重要工作，就是反法西斯黷武主義的偉大門爭。」

戰爭開始的三天中，政府更換了兩個內閣總理。七月十八日，當叛變的消息傳入內閣時，吉羅格總理（加西里亞同盟黨的領袖）就辭職了。阿柴那總統委任議會的代言人波立奧斯（

民主聯合黨的領袖）組織新閣。波立奧斯組成了一個比前任略見右傾的內閣，它僅維持了八個鐘頭，然後就由海軍部長柏來拉（Jose Giral Pereira）掌握組閣的重柄。柏來拉是阿柴那總統的左翼民主黨的黨員。

柏來拉在八月下半月發表了一篇聲明，他把戰爭的雙方辨認得明明白白：

「軍人、教士和法西斯派發動了公開的叛變，以反對民主政體及民選的合法政府。西班牙的現狀就是他們所激起的。」

「馬德里的現政府是純然的民主政府，內閣中並沒有有一個社會黨員或共產黨員，但社會黨和共產黨是擁護現政府的。人民陣線一致同意二月間的普選，發動了反對反動派和法西斯派的運動，以冀獲得他們政綱的果實。」

「這件事損害了極端保守派的特權，他們現在實行叛變了。」

一方面，政府的維護者都堅持着說，這次戰爭是民主政治對抗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另一方面叛軍却堅持着說，他們的鬥爭是在反對共產主義。富蘭科將軍本人，對這次法西斯叛變的國

際的和國內的重要性，曾作過一番生動的估價。他在七月二十一日發表了一篇聲明，說有兩輛裝炮的坦克車轟擊休達。他接續着說：「因此，當我們的軍號聲送過直布羅陀海峽時，關係生死存亡的決不止西班牙一國的利益。」在另一次，他宣告着說，叛亂的目的是在「拯救西班牙和西歐，脫離俄國共產主義的恫嚇。」

勞伯爾斯在七月三十日動身赴葡萄牙以前，曾和巴黎沙愛爾報 (Paris Soir) 的訪員作了一次最有趣的會見。正像通常一樣，勞伯爾斯開始是略見左傾的，到結果，仍舊是十分右傾。全部的會談如下：

訪員：「據說你會參加叛變。」

勞氏：「那是不真確的。我絕對不負任何物質的和道德的責任。從上次選舉中左派獲勝之後，我在每次的議會中和公共集會中都時常反覆說明，我反對政府是只用議會政策的，但是我也告訴過內閣總理和內政部長——並且告訴過好幾次——叫他們不要再使極端危險的形勢發展開來。他們應該在還有餘暇的時候終止罷工和攻擊。我是時常預料到要發生叛變的。」

訪員：「你以爲領導叛軍的諸將軍如何？」

勞氏：「我和他們都很熟識的。我做軍政部長時，和他們常時接觸，這是盡人皆知的。他們當然都是愛國志士，他們要想強迫政府採行強硬的政策，以反對極端派的恐怖，或者要求政府允許軍隊自由行動，以重建秩序，并掃除無政府狀態。誰知政府竟以「開火」來答覆富蘭科和桑耶雅的最後通牒。其實政府是應該採取另一種解決法的，就是叫富蘭科擔任軍政部長，非常的時期是需要非常的政策。即使首批摩洛哥軍在阿幾西拉斯 (Algeciras) 登陸之後，如果政府願意妥協，內戰仍舊有避免的餘地的。」

訪員：「但是那將軍已經組成了臨時政府哩。」

勞氏：「那是真的。但他們是在叛變的第六天才組成臨時政府的，那時他們不能和平談判的形勢已很顯然，此外剩下來的只有兩個解決辦法：西班牙不是受軍事獨裁的統治，就是受共產主義的統治。」

訪員：「那末你是擁護軍事獨裁的嗎？」

勞氏：「在現狀之下，我以為軍事獨裁可看做一種過渡的政府。但是富蘭科、摩拉和蘭諾在趕走瑪德里政府及解放巴塞羅納之後，是要組織延攬民事專家在內的政府的。改組政府，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才會生效。我們國家所最需要的是和平，有了和平，才能在廣大的復興運動中，把一切右翼的黨派組織起來，從卡羅斯王黨（Carlitas）起，到里維拉的法西斯團體為止。」

七月二十七日支加哥每日論壇上發表了一篇富蘭科將軍和該報記者阿倫（Jay Allen）的談話。這篇談話表示富蘭科和勞伯爾斯的答語有許多地方是若合符契的。在其他許多事情中，阿倫問：

「你對工會的意見如何？」

「工會在未受階級鬭爭學說的流毒時是很好的，」就是富蘭科的回答。

以後，阿倫問：「你的政府是軍事獨裁呢？還是民事獨裁呢？」

「軍事獨裁。以後我們常舉行全民投票來決定西班牙所需要的政制，」富蘭科說。

再談到政綱：

阿倫：「你的政綱如何？」

富蘭科：「我們當在國民經濟的能力之內，實行一切可能的改革。凡是國家經濟能擔負的一切事情，我們決不裹足不前的。」

阿倫：「土地改革呢？」

富蘭科：「把貧乏的土地分給貧乏的農民是沒有用的。所重要的不單是土地，還須有連用土地的金錢。再過二十五年，大地產自然會分成小地產的，布爾喬亞的農民自然會形成的。」

我們回想起，一九三三年以前德國納粹黨的政綱，是包含着許多令人興奮的，唱高調的條款，例如分配土地，沒收財產等。現在西班牙的法西斯派竟連事先的空答應也不肯多作了。

當戰事進行之際，慘酷的傳說多起來了。慘酷的故事是最易捏造的，也是最難證實的，何況慘酷是會產生慘酷的。慘事之多，真為任何內戰中所罕見的，這或許是由於現代革新的變遷。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記住，焚燒教堂這些事，在某一國中，或許是一種發洩民衆憤怒的，最普遍的因襲方法，同時在其他國中，却可成爲褻瀆神聖的大罪的。

八月二十一日，紐約報知論壇（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訪員羅維爾（Robert Neville）在坦支爾（Tangier）發了一個發微的電訊：

「在直布羅陀，多數的報館記者，只是發些「恐怖」消息，我真深為驚奇。他們好像毫不領悟這種狀況中的國際關係。

「一位著名的戰事通信員，帶了兩個金髮碧眼的女書記，十六隻皮箱和兩架無線電收音機到了這裏了。這些通信員專門報告着赤色恐怖的消息，然而本通信的作者却已在格拉那達做過了二十三天白色恐怖的證人。」

雖然國際的報紙上，或是大部分的國際報紙上，充滿着「恐怖」故事，尤其着重於「赤色恐怖」的一角，叛軍這方面在攻佔巴達和斯（Badajoz）和伊倫（Irun）之後，好像曾由摩洛哥軍執行過血污的屠殺，客籍軍在殖民地是習慣了多年的屠殺，他們在本部上當然也繼續着平常的戰術的。富蘭科將軍曾用無線電發出警告，說他如果攻克京城，決將所有的一馬克斯主義者「斬盡殺絕。這種恐嚇，當然要使那些不幸留在瑪德里的法西斯黨徒感受生命的危險。八

月十五日紐約泰晤士報引了一段瑪德里英國僑民給外相艾登的電報，說：「瑪德里的英國僑民很憤激地否認英報上所登載的神經質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是從這裏逃出去的難民所捏造的，使我們的親友發生無謂的罣慮。」

第十一章 世界大戰的隱現

西班牙的內戰一開始，世界大戰的危機就送了它一副更廣大的骨架。我們對這次法西斯軍事叛變和繼起的屠殺戰爭的透視，有時十分模糊，以為它不及一九一四年大戰前薩拉耶夫（Sarajevo）地位的重要。

政論家所推定的許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地點中，西班牙要算是最後的一塊，但是，由於法西斯要求殖民地和重新分配領土的慾望，全世界竟無處不充滿着戰爭的危機，任何藉口，都足以發動那次不可避免的屠殺。

希特拉和墨索里尼法西斯統治的未來目的，是在擴張領土，這是誰也不會懷疑的。墨索里尼在新近的一次行動中，征服了非洲僅存的「自由土」阿比西尼亞，希特拉正和不列顛開着收回非洲德屬殖民地的談判，一面在預備戰爭，想把蘇聯的烏克蘭攫為己有，「要求殖民地」

已成為希特拉的得意口號了。在這樣情形之下，當富蘭科將軍佔據摩洛哥，他的夥伴佔據巴利阿利（Balearic）羣島，對西政府開始內戰的時候，德意兩國都以為在西地中海的要地上獲得殖民地的機會來了。我們曾經指出，在一九二五年，墨索里尼和獨裁者里維拉（Primo de Rivera）是建立過密切關係的。那時他們一致反對英法。不過那時墨索里尼正用全力增強着國內的法西斯主義，以致不能充分地應用這個合作。但是當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內戰開始的時候，情形就不同了。墨索里尼已經在東非和地中海的蘇彝士要口上初次戰勝了英國。

富蘭科將軍對法西斯助力所出的獎品足使希特拉和墨索里尼甘冒一次世界大戰的大險。為索墨里尼所垂涎的休達（Ceuta）是西屬摩洛哥的要塞，差不多正和直布羅陀遙遙相對。若一旦落入意大利人的手中，設以堅強的近代防務，它就立刻可以粉碎不列顛對地中海門戶的控制。正在直布羅陀近旁的巴利阿利羣島，最易截斷不列顛從直布羅陀到馬爾太的道路。以西班牙的殖民地充作獎品，是最為墨索里尼所歡迎的，那時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鏈索將包含巴勒摩（Palermo，在西西利）、卡拉里（Cagliari，在撒地尼亞）、馬洪港（Port Mahon，在巴利

阿利羣島中的米諾卡島上）和休達（在摩洛哥）諸地。這些地中海的接腳石之間的距離，僅有半天的航程。

再加上了紅海西岸的堅固的軍事地位，墨索里尼真可認為比征阿比西尼亞戰後更接近新羅馬帝國了。在這些狀況之下，通印度的道路將在休達和巴布厄爾曼得（Bab-el-Mandeb）兩地受到威脅了。對於納粹黨的德國，巴利阿利羣島或加那列羣島（Canary）將成爲到非洲本部去的根據地，以便作更進一步的侵掠，或而以便和不列顛討價還價。

對於德國，還有一個更決定的問題，就是要在法國的後方安置一個法西斯的同盟，這個同盟在那次柏林以爲必來的戰爭中可以舉足重輕。法蘇互助公約使希特拉的自傳「我的奮鬥」中所表示的野心有了很大的艱阻，因此柏林正著眼於一種反法的運動，以作對抗。

德意西三國的法西斯一致同意通力合作，以謀打倒西班牙的合法政府。這件事的真實，我們不但在兩法西斯強國的實際行動中可以看出，同時還有從重要方面來的可靠的證據。

孟却斯特導報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宣告着說：「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德國政府事前是

知道變亂的計畫的。西班牙的桑耶雅 (Sanjurjo) 將軍是在柏林，那裏他在指導着關於西班牙的祕密談判。」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的倫敦報知日報 (Daily Herald) 也說，七月間在漢堡裝運，供給西班牙法西斯派的德國轟炸機，是在三月間由桑耶雅將軍預定的。

孟却斯特導報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揭露着一個消息，說德意法西斯派幫助西班牙的叛軍是有交換條件的。導報上說：「前星期，摩洛哥和巴利阿利羣島上新到了大批的意德人員。這些人員參加着軍事活動，同時也行使着某種政治的勢力。叛軍以為有了兩個強國援助，精神愈加奮發。現在在他們手中的軍器都是從意國來的。這情形在摩洛哥尤為顯然。」接着，導報又說：「德國的勢力在巴利阿利羣島上最強。她顯然想在那裏獲得權利。」

倫敦相信德法意的法西斯派事前獲有諒解，這在八月十二日喜爾曼 (William Hillman) 的通訊中可以全盤看出。喜爾曼是法西斯的美國經理哈斯脫 (Hasteb) 報館的通訊員，他把法西斯對西班牙所訂立的合同，列舉如下：

一、如果富蘭科組織穩固的合法政府宣告成功，意大利就供給借款，以復興西班牙的實業，

并幫助西班牙完成復興。

二、此項借款以西班牙的鐵道爲担保品。

三、兩國政府締結「防禦公約」。

四、若無阻礙發生，富蘭科允將西屬摩洛哥的休達港和地中海中的米諾卡島讓與意國。如果因外交上的障礙，而不能移轉實際的治權，富蘭科允許意國在該兩要地上有建設海軍根據地的權利。

有了這種說素，西班牙的法西斯就可從兩個同謀的法西斯國中得到一切必要的軍器。納粹的德國於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首先承認意大利占領阿比西尼亞，預先爲這種侵掠開闢了一條法律上承認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西班牙政府發表着說，它已獲得許多文件，證實德國政府和西班牙法西斯的計畫有關，其報酬不單是在西班牙建立反對法國人民陣線的同盟，在西屬摩洛哥和巴利阿里羣島上也有實質上的讓與。

孟却斯特導報再加工一段說：「在西班牙本部，德國操縱着一個廣大的，組織嚴密的國社黨支部。這支部於西亂發動前的數星期內，補充了許多由德國來的新的人員。德國還操縱着一個強有力的政治軍事的間諜機關，隱在外交和教育的幕後，進行着工作。」

八月十八日倫敦的新聞記事報公布了許多文件，證明在西班牙有一個大規模的納粹間諜網和許多恐怖團體。間諜們對在西班牙的一切德人，從微賤的亡命者起到大使止，都作着按期的報告，全國都設着祕密法庭，以懲罰那些冒犯納粹黨員的人。新聞記事報並把一張駐瑪德里的納粹間諜於一九三四年五月二日寄到柏林去的報告，用影寫版披露了出來，以作它言論的佐證。這文件開頭寫着「萬密」兩字，是加泰隆尼亞（Catalonia）政府在巴塞羅納（Barcelona）搜查納粹黨本部時所獲得的內容如下：

「韋爾斯石克（Welszack）伯爵，大使：我聽說他已加入了黨。」

「伏克爾斯（Volkers）博士，大使館參贊，自一九三三年就在瑪德里，娶了一個馬來種的荷蘭婦人。以前的行動和政治傾向這裏不甚清晰。」

「梅(Mey)博士，使館參贊：迄今在政治意義上是並不顯要的。獨身者。在允准他入黨以前，必須先確知他是否屬於亞立安(Aryan)種，及在大戰中的行動如何。

「科斯(Korth)博士，使館秘書；有民族的外貌。曾經參戰。獨身者。

「非雪(Fischer)博士，領事館秘書；到此地不久。獨身者。虔信天主教，以前或和中央（天主教）黨有關。贊成新政體。

「安日(R. Enze)，商務參贊；已在巴塞羅納入黨。對運動一無興趣。

這些就是用影寫版公布出來的報告。關於其餘的人員，文件上說：

「賴森(E. Larsen)，大使館員的領班；娶了一個南美洲的婦人。曾有一時做過民主思想的健將，現在已成為百分之一百五十的納粹同志。不是戰鬥員。不能容其入黨。

「科爾勃(F. Kolbe)，領館秘書；以前是熱誠的馬克斯主義者，和這裏的猶太人與可疑分子往來。入黨萬難允准。

「林特納(K. Lindner)打字員；有民族外貌。尙未結婚。她的入黨可無問題。

黨。

「吉卜立斯(H. Zipfies)打字員：以前是敵視的。

「士威克(C. Zwick)書記：已經是黨員。很活動。

「厄培德(Ebert)門丁：政治上的廢材。以前是國家社會主義者。因為智識幼稚，不允其入

「斯坦因(E. Stein)園丁：不參加運動。

「希特拉萬歲！

「駐西黨務總裁兼代理外交委員W. 2。」

根據「褐色間諜網」一書，駐西的納粹間諜指導員兼瑪德里德大使館的特務密使是叫做克勞斯(A. W. Claus)上面的報告的著者或許就是那個克勞斯。「褐色間諜網」共舉出了三十餘個駐在西葡兩國的納粹專員的名字，在摩洛哥也有一個支部指導員。

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左右，爲了各種實際上的目的，西屬摩洛哥竟成了意大利的保護國了。紐約報知論壇(New York Herald Tribune)在摩洛哥坦支爾城(Tanger)的訪

員聶維爾(Robert Neville)報告說：

「意大利人在西屬摩洛哥竟變成如此的根深蒂固了，要到內地去，必須先向意國公使領取護照……記者曾見到一張到西屬摩洛哥去的護照，簽名的並不是西班牙的官吏而是一個意大利人。這裏的意國公使好像是富蘭科事實上的代表。」

在西班牙北部的不耳各斯 (Burgos) 追隨穆拉將軍的叛軍的，哈斯脫的通訊員聶克鮑克 (H. R. Knickerbocker) 對德國供給叛軍軍火的事實從未加以隱秘。他說法西斯所用的軍火，飛機，機關槍，炸彈，來福槍，子彈，和鋼盔等，大半都從德國來的。

即使在一九三三年五月間，在西班牙受僱的德籍人民和其他外人比較起來，已經要算最多了，在一八，四二〇個外人的總數中，德人要佔四，六〇〇個上下。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間守舊派得了勝利之後，勞伯爾斯鼓勵着納粹黨人向西班牙移殖，正像里維拉 (Primo de Rivera) 在獨裁時期便利意國法西斯宣傳員流入一樣。

反法西斯勢力的法國友人雖然也以軍火和其他的助力供給瑪德里政府，但在叛亂發生

以前，法國的人民陣線却從未有過干涉。法國的助力是決不能及到兩法西斯強國的比例的。

舉例來說，納粹政府藉口內戰（法西斯所發動的）危及了德國的公民，就開始斥責着瑪德里政府，控以謀殺了四個德國公民的罪名。因着這個藉口，德國的袖珍艦「德意志號」在戰爭的緊要關頭，竟實行阻止政府的軍艦向休達港轟擊，那時富蘭科將軍輸送客籍軍和里夫（Rif）軍到西班牙本部，正感困難。德國的軍艦在加的斯（Cádiz）和塞維爾（Seville）兩地訪謁着西班牙法西斯的司令。紐約泰晤士報在西班牙本部跟隨富蘭科將軍軍隊的記者克魯克洪（F. J. Kluckhohn）接二連三地報告着德國飛機由德艦起卸的消息。他在八月中通電說：「今天有二十架德國容克式重轟炸機和五架德國驅逐機，由德國的軍事航空員駕駛着，到達了塞維爾的叛軍本部。這些飛機先用船裝至叛軍的海口加的斯登陸，然後再飛到這裏。」約摸一星期之後，西班牙的巡洋艦在加的斯附近，阻止了德國的貨船喀麥隆號（Kamerun），恐怕它又裝載着飛機，和德國的航空人員，希特拉政府就把這事件當作藉口，命令在西班牙海面的德國海軍採取新的可驚的活動。

喀麥隆號從事輸送軍火，供給西班牙的法西斯，這回事實已爲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的阿倫（Jay Allen）君證實了。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阿倫君從坦支爾發電報告說：

「德船喀麥隆號運到葡萄牙的二十三車軍火已於今日取道巴達和斯（Badajoz）和薩拉曼加（Salamanca）轉運西班牙。還有二十三車也將由葡萄牙轉運。葡萄牙於西政府的軍艦阻留並搜查喀麥隆號，不准它在叛軍的要塞加的斯靠岸之後，仍容許喀麥隆號傍岸，實際上已在有五星期之久的西班牙內戰中，採取了交戰國的地位。」

德政府並提強硬的口頭抗議，一面命令德國的海軍司令，以如有西艦阻留德國商船，即當發砲轟擊。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正當塔拉未刺·對·拉·累伊那（Talavera de la Reina）周圍進行主要戰爭的時候，紐約泰晤士報的訪員發出電訊，說德國的轟炸機和驅逐機正在助叛軍反敗爲勝。他寫着說：「德國的航空員已不再穿西班牙的制服，假裝西軍了：我們很難相信德國的航空員是在訓練西班牙人，因爲他們自己整天出去工作，當然無須再訓練能擲

彈的航空員了。德國司令的辦公處就設在富蘭科將軍的司令部的貼鄰。」

在西屬摩洛哥也有德國的飛機登陸。巴黎硬報 (L'Intransigeant) 的駐摩洛哥訪員特愛斯密 (Jean d'Esme) 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致他本報的通訊上說，他親眼看見一架德國容克機飛到西屬摩洛哥。機上有卍字的徽記，

意國對西班牙法西斯的幫助尤為奇觀。一隊意機飛到西屬摩洛哥去，中途適遇暴風，其中有兩架在阿爾及利的奧藍 (Oran) 失事墮毀。駐法屬摩洛哥的總督提南 (Victor Denain) 將軍於八月六日報告巴黎政府說，兩機上獲得的文件，證實這遠征隊是由五架飛機組成，是屬於意國正規空軍第五十五、第五十七和第五十八各隊的。在毀機中的一具屍身上尋獲了一本領取軍餉的憑簿，這充分證明了墨索里尼不單派遣軍用機，同時也派遣空軍人員為西班牙的法西斯軍作戰。後來我們知道，意國的遠征隊是在波倫亞 (Bologna) 組成的，於七月二十九日由該港飛到撒地尼亞島卡拉里 (Cagliari) 的厄爾曼 (Elman) 飛機場上，七月三十日再由那裏向西屬摩洛哥的米立拉 (Melilla) 起飛。

八月十八日各方盛傳墨索里尼已命全部空軍準備飛往西班牙的消息。這事後來雖爲墨索里尼所否認，但同時他更申說，意國政府已充分準備，如遇必要，當採取一切干涉的步驟。在同一天，有一隊意國兵士在瑪拉加（Malaga）登陸，不單帶走了意國領事，同時也帶走了許多避匿在領事館中的西班牙的法西斯人員。

在八月五日的支加哥論壇上，阿倫君報告着說，當政府的巡洋艦自由號（Libertad）向塔立法（Tarifa）的叛軍堡壘實施轟擊的時候，有一羣意人駕駛着三引擎的單葉飛機向該艦投彈轟炸。

克魯克洪君在八月十八日的紐約泰晤士報上報告着說：「這個叛軍的城市（指塞維爾）已感覺到停泊在這裏的意國驅逐艦安東尼達諾立（Antonio da Noli）號是表示着叛軍的同盟者已經到了。」意國水兵乘着西班牙法西斯主義者徵發來的軍用卡車，在非琅多（F. rando）廣場上往來馳逐。

差不多從法西斯軍事叛變的第一天起，處在援助瑪德里政府的最優地位的法國勃倫政

府，就竭力向列強建議締結中立協定，以冀避免國際的糾紛。若把國際法加以嚴格的解釋，法國對西班牙合法政所需求的一切助力，實有供給的義務，因為西班牙軍人所發動的叛變和內戰，絕不能使西班牙喪失購買軍火的權利的。勃倫政府的政策無論是賢是愚，但他總算已經盡過了在外交上束縛德意的法西斯魔手的努力。

那時就開始了一個延宕的遊戲，這遊戲是意國的尤其是德國的法西斯所最拿手的。德意接近的事實更使邁齣危險的插戲容易進行。在西國內戰發生數月以前，這兩個敵對的獨裁者已經比較接近了。德奧協定的簽訂，暫時遏制了納粹黨的德奧合併野心，使柏林和羅馬在各種歐洲問題上能較前接近。英國政府對法國八月一日所發的中立建議表示同意，但極力主張應包括德葡俄三國在內。法國立刻接受了這些附加的條款。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左右，英國有名的外交評論家奧古爾 (AUGUR) 看到德意的味延宕，就著論說：

「在事實上，我們可以認為不干涉運動已經失敗了，因為軍火的供給正在向西班牙內戰

的雙方激流。」

法國把八月十七日劃定爲中立協定的生死關頭。雖然意國的覆文已使事態避免了危機，但明澈的諒解却仍舊未能獲得。墨索里尼在法國提出建議的二十一天之後，方才宣告接受。他以前對阻止公共募捐和徵募自願軍投效雙方所作的保留，現在雖已放棄了，但信守協定仍欲以英法德荷俄各國接受爲條件。

八月二十四日德國政府又把大批軍火裝運到西班牙去。柏林雖來了不干涉的諾言，但同時也來了一次軍事運動，向歐洲播送着戰爭的恐怖。希特拉藉口蘇聯的威脅，把德軍的服役時期從一年延長到了兩年。

在二十六個國家核准了「中立」以響應法國的建議之後，就在倫敦召集了一個會議，以研究實施一般協定的可能。供給叛軍軍火的主要發源地葡萄牙，連會議都不曾出席。九月十日紐約泰晤士報上有一篇通訊，描寫着倫敦會議的情形如下：

「德意兩國今天又表示着，他們只要費一舉手之勞，就能妨阻歐洲其餘各國禁止以軍火

供給西班牙以免內戰擴大的努力。

「不干涉國際委員會在今天舉行的首次會議，雖有二十六國的代表出席，顯然不能作成絲毫的進步。出席的兩大法西斯強國，實在沒有合作的誠意，同時準法西斯的葡萄牙根本不會出席。」

法國的政策是不難瞭解的。勃倫政府深覺西班牙法西斯政府的建立，不但會增加戰爭的危機，同時會使法國在那次戰爭中必然失敗。因此法國的一切意見，不論是歷史的，民族的，反法西斯的，社會黨的或共產黨的，都或多或少地要求以有效的助力，給與西班牙的政府。但是爲了國內的原因——恐怕右翼的急進社會黨倒閣——勃倫就採取了一個兜遠圈子的路線。

勃倫政府爲了不干涉協定的戰略受着法國各革命政黨的嚴厲的批評。社會黨，共產黨以及各總工會都在經濟上都繼續扶持着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他們的論點是：（1）西班牙的叛軍正在設法顛覆民主立憲的政府；（2）德意在西班牙的干涉，威脅着法國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3）西班牙人民陣線的失敗會使勃倫政府陷入最大的危險。

蘇聯覺得西班牙境內的自由干涉，會變成反蘇聯戰爭的序幕。日本當然不肯錯過歐洲紛爭的機會，而不侵佔蘇聯的西伯利亞的。歐洲和東方同時發生戰爭，蘇維埃政體的敵人就很易拉攏他們的力量。蘇聯的工人以巨額的款項捐助西班牙的人民陣線。勞動和社會主義（第二）國際的主席布勞克爾（Louis de Broekere）也以為世界和平是懸掛在西班牙的天秤上面。八布勞克爾宣布着說：「現在要挽救和平，必須先挽救西班牙的民主政府。如果因月初頭，為缺乏勇氣，竟任其傾覆，戰爭——在順利條件下進行的無情的戰爭，纔將成爲不可避免了。」

法國對西班牙的幫助並不是都落到人民陣線那方去的。法西斯的赤十字團也以金錢、軍官和技術家供給西班牙的法西斯。法國的退伍軍官奧古斯希立奧（August Heriot）於到達塞爾維之後，就和富蘭科將軍會商。

法國的政策是混亂而且又矛盾。英帝國基本的關懷是在於保持通印度的海道。應用到西班牙的內戰上，那種利益就是指直布羅陀和在西班牙本部的聽命的政府。保守黨的英國是永不會贊助法西兩國的人民陣線的勝利的。但是法西斯的勝利却又不能不妨害英國的利益。英

內閣中意見衝突的各派，最後才決定了一個「中立的」公式，着重於維護英帝國生死攸關的鏈索，無論何方獲勝，都和他們無關。如果英國的保守黨能為一個親英的法西斯取得勝利，他們就會毫不猶疑地去促成這種成功的。在雙方都收到了許多英國飛機之後，英國的通商部終於在八月十九日取消了一切輸出軍械、軍火和軍用或商用機到西班牙去的執照。

英國政府又發出了一個嚴厲的警告，反對干涉她和西班牙各地的貿易意思，是在指叛軍。英國的干涉是微弱而溫和的，但是在西班牙，英國正和德意兩國有相同的重要，或者還要重要些。在西班牙的內戰決勝以前，英國的關懷會起着一種主要因子的作用的。

距離遙遠的美國，在戰爭的許多問題中，也立刻受到牽涉了。歐洲戰爭的危險，和它在遠東的牽連，是最關重要的。它也有着矛盾。八月二十日代理國務卿威廉·菲力 (William Phillips) 把美國的政策總括如下：「本國對其他國家的國際事務遵守着不干涉主義」爲了那個理由，他繼續着說：「本國政府對西班牙現有的不幸狀況將避免干與……對西班牙人民深抱着友誼的美國人民和政府看了目前分裂該國的蹂躪的鬥爭，深致悲痛，並熱烈其能於最短期間宣告

終止。」但在八月二十七日國務部又和英德聯合反對西班牙政府封鎖叛軍口岸的命令。在九月十日，一切在西班牙海面的美艦都奉令撤退，那時還有五百個在西班牙的美僑曾受警告，政府將不予保護。

在這個世界勢力的複雜關係中，西班牙的民主主義不單在和國內的法西斯主義作戰，同時也在澈底地和世界的戰爭作戰。

第十三章 人民陣線的勝利

西班牙的人民一經武裝保衛民主，新式的國防政府必然會出現的。當內戰達到生死的決定關頭時，人民陣線的內閣就組成了，這在歷史上還是初次。

在戰爭的第六星期，柏來拉政府還不能轉取攻勢，只有攻勢才能保證民主的勝利。反之內戰在南部和東南部已變成「活躍」，在北部和東北部則轉趨「沉寂」。富蘭科將軍從南部迅速進軍，沿退加斯(Tagus)河向托里多(Toledo)和瑪德里進發。沿瑪德里北面的天然屏障瓜達拉瑪山脈，敵對的軍隊每天有小接觸，但是雙方都不能攻破敵軍，使戰爭有決定的勝利。

柏來拉政府中左翼民主黨和其他中等階級的代表，在防禦中，都已出盡了無價的助力。他們主持政府，維持工商農，最要緊的，是用了他們的技巧和熟練，指揮效忠的軍隊。但是戰爭的銳勢和民主的命運，却仍舊毫無疑義地握在工農的手中。民團大部分由工農組成，受着社會黨，共

產黨，總工會和無政府派全國勞動協會的領導。工人們在內戰以前是受慣了無產階級領袖的指導的，他們覺得在危險的戰事中更需要這種嚮導。此種觀念在九月初旬表示得尤為殷切。

要克勝法西斯派的軍事優勢必須有軍事的奇蹟。柏來拉政府自知沒有能力來鼓動這種超越的活動，我們必須記住，這個內閣大體上是阿柴那總統所領導的左翼民主黨和議院代言人波立奧斯所領導的民主聯合黨的集團。它雖然僅代表着人民陣線或人民陣綫議員的少數，却能深得一切反法西斯勢力的信任，但是只有這個信任是不足應付軍事的急變的。因此柏來拉政府，在和社共兩黨的代表作了數度懇談之後，就認識了西班牙只有在真正人民陣綫的代表政府之下，才能發出最大的力量。在這樣的政府中，無產政黨自然要佔據顯要的地位。這裏並不是說要把政府改成社會主義的性質，以和非無產政黨的利益敵對事實上，中等階級的各黨都嚴正地認識，若使羣衆的領袖負責指揮武裝的民衆，他們的利益以及民主的賡續生存，都能獲得最善的保證。因此他們一致組成了人民陣綫的政府。

九月四日，正當伊倫被叛軍陷落，全城化爲灰燼時，政治上毫無過失的柏來拉政府辭職了。

西班牙無產階級的偶像卡波斐羅 (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 就擔任了人民陣線的內閣首揆。

新內閣包含六個社會黨員，兩個共產黨員，三個左翼民主黨員，一個左翼加泰隆黨員和一個民主聯合員，其分配如下：

- | | |
|----------|---|
| 總理兼軍政部長： | <u>卡波斐羅</u> (社會黨員) |
| 外交部長： | <u>未雅</u> (Julio Alvarez del Vayo 社會黨員) |
| 空軍兼海軍部長： | <u>不里托</u> (社會黨員) |
| 財政部長： | <u>尼格林</u> (Juan Negrin 社會黨員) |
| 工商部長： | <u>格來西亞</u> (Anastasio de Gracia 社會黨員) |
| 內政部長： | <u>格拉柴</u> (Angel Galarza 社會黨員) |
| 農政部長： | <u>游賴勃</u> (Vicente Uribe 共產黨員) |
| 教育部長： | <u>黑南提士</u> (Jesui Hernandez 共產黨員) |

司法部長：

阜尼斯(Mariano Ruiz Funes 左翼民主黨員)

勞工部長：

庇拉(José Tomás Pierra 左翼加泰隆黨員)

交通部長：

里窩斯(Bernardo Giner de los Rios 民主聯合黨員)

公用部長：

甲斯脫(Julio Juste 左翼民主黨員)

不管部長：

柏來拉(左翼民主黨員)

卡波婁羅生於一八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他出身是個泥水匠，一九一八年以後，曾在社會黨和總工會中歷任要職。他於一八九〇年加入總工會，三年以後，再加入社會黨。在一八九九年，他早就當選為社會黨全國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一九一八年，他當選為社會黨六議員之一，并任里維拉政府下的樞密院長。在一九三一年民主社會兩黨的聯合政府中，他擔任了勞工部長。在這個全時期中，無政府黨和共產黨都把他當作攻擊的目標，以為他在勞動運動中扮演著內奸的角色。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政府控告他煽惑十月暴動，把他逮捕了起來。此後，他的事業就採

取了一個尖銳的轉變。他後來把社會黨領袖，如薩波立脫（Andrés Sabotit）等，有意使暴動的計畫怠工，并延發叛變訓令，坐視時機消失的事實，統統揭露了出來。在一九三三年的選舉以後，他主張採取實際行動，以反對勒樂政府的壓制政策，但他不能說服黨內的領袖，聽從他的意見。一九三四年四月三日他想辭去社會黨議員團主席的職務，但是未獲允准，同時他保證把辭職的經過保守秘密。

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他雖然患着病，終於辭去了職位，以抗議社會黨全國委員會的阻礙政策。十三天之後，他因「同謀」十月暴動的罪名被捕了。他並不經過審問，在獄內羈押了十三月之久。當出獄時，他就有了新的決意，要把社會黨引入革命的道路。他鼓勵着，并扶助着社共兩黨青年運動的合併，他起初對人民陣綫的政策雖然表示冷淡，但一經自知錯誤，就加以盡力的扶持。

新外交部長未雅是屬於社會黨左派的。他是西班牙最負名的，最燦爛的智識分子。他不單以新聞記者聞名，做外交人員也很著政績，他在首次阿柴那政府中曾做過駐墨西哥的大使。

不里托是一位可驚的人物，是社會黨的識途老馬，他是挺胸凸肚的，肌肉十分發達，有驚人的噪子和偉大的演說天才。他是黨爭的專家，也是社會黨「中派」(Centre)領袖的大敵。但是，內戰已經治愈了黨內分裂的威脅。不里托所最恐懼的法西斯叛變實現了，議會的辯論，當然不能使這次叛變消滅。甚至在人民陣綫政府成立以前，不里托已經在內政部中，盡着半官式的能力了。

共產黨的兩位閣員，里南提士和游賴勃，在一切共產黨中，要算是最先參加非無產政黨內閣的人員。新教育部長黑南提士，只有二十八歲年紀，是歷屆內閣中年齡最輕的閣員，他是共產黨機關報孟陀奧勃里羅報的主筆，是議會中共產黨的主要代言人，在黨內的威信和權力僅次於總書記狄阿士。新農業部長游賴勃是議會中共產黨黨團的書記。

另一個傳統的觀念，被新內閣打破了。無政府工團主義派竟打破了七十年來的傳統思想，保證他們對新政府的擁護。無政府黨的轉變是一個很好的預示，使新政府能很少阻礙地徵發一切物力和人力，以反對敵人。以前，人們都以為在內戰爆發以後，總工會和全國勞動協會的聯

合運動能更加接近起來。現在無政府黨對政府的擁護就加強了這個願望了。

新內閣在舉行首次會議以後，立即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聲明：

「政府，因為本身的陣容關係，自視爲是各派在前線爲保持民主而戰的政治勢力的直接代表。阿柴那總統以爲必須有一個代表基礎更廣大的內閣。諸新閣員所屬的各黨就立刻接受了這個建議，於是把以前擁護政府而並不入閣的各團體都延攬到政府之內。

「內閣的政綱是要堅決地配置人民的努力，以謀促成平亂的勝利，并主張聯合行動，以使人民的努力有最善的成就。其他一切的政治意見，都將從屬於那個目的。下面理論上的分歧都已經擱過一邊，在目前，除了保證壓平叛變以外，不許再有其他的希求。

「政府宣布了和平政策，因為西班牙並沒有帝國主義的企圖。這個和平政策不單符合閣員一致的意見，同時也符合國家的福利，因為全世界的和平將成爲我們復興的最大保證。

「政府以和平的精神，肯定了西班牙對各國的友誼，及對國聯盟約的遵守，希望別國能互惠地尊重我們，正像我們尊重別國一樣。

「政府表示了不可動搖的決意，以保持國家土地的完整，以反對叛軍勝利後割地的危險。政府對海陸空軍和民團保衛民主的努力，表示最大的敬意。政府的至高目的將力謀對得起這種英勇的戰士。政府將成爲戰士們要求社會改良的忠實保證者。」

這篇宣言表示左翼各黨仍舊信守着在戰爭初期所採行的政策。保持德謨克拉西民主的工作，需要他們立刻效忠。在終極目的上的一切歧異，都已從屬於打敗法西斯主義的前提下面。

人民陣綫的政府，像柏來拉政府一樣，是一個致力於反對法西斯主義及反動派的鬭爭的政府，不過更代表着，也更鼓勵着廣大羣衆的情緒。宣言的第一段指示此次的改組並不是強迫左翼民主黨實行的，反之，却是阿柴那總統已看到了需要新的政府。五個各中等階級政黨的代
表參加卡波婁羅內閣，表示人民陣綫已把一個中等階級所領導的政府安然引渡到一個工農所領導的政府，新政府代表着人民陣綫的最高階段。它畫分着一個轉變——一個從人民陣綫所擁護的政府進展到代表人民陣綫的政府的轉變。

除了軍略上的和組織上的問題以外，擊敗法西斯主義還合蓄着經濟的步驟，以便迅速有

效地實踐政府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需要。八月二十二日，孟陀奧勃里羅報著了一篇重要的政論，從左派的觀點，來述說軍事工作和最急切的社會經濟問題之間的關係。

「人民受着寶貴的政治直覺的嚮導，深知軍事的勝利必須有社會的和政治的改革，來加以奧援和充實。我們的戰鬥不單要懲罰軍人和政客中的叛徒。同時對那個放任反動派組織團體，籌集資金，屠殺人民，以使西班牙糜爛的政制，也必須加以改革。」

「我們常時闡發着民衆的熱情，反覆地述說，我們是爲德謨克拉西的民主而戰。那是的確的，我們是爲民主而戰，全西班牙的人民也是爲民主而戰。但是我們和民衆的心目中，民主一字並不是空空洞洞的。在這個德謨克拉西的概念中，我們必須指出新社會的和經濟的深刻內容，這種內容，已爲廣大羣衆所澈底領悟的。單單執行幾件經濟的和社會的改革是不夠的，因爲這種改革，民衆自己也在零零碎碎的執行着的。」

「現在我們的軍隊大有進展地克復着在叛徒手中的土地，戰爭的最後勝利馬上可以逆睹了。在這時候，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實行社會性質的和經濟性質的廣大改革，以繼續充實軍事

的勝利。這個工作是屬於政府的。德謨克拉西民主的意思就是迅速實行畫分土地，把貴族，大地主和高級教士的土地分給農民和僱農，實行特種農村借款，減低賦稅，取消債務，改革社會立法，改善勞工的生活狀況和工作狀況。它的意思也就是保護小商人和小實業家，正式解散反動派和法西斯派的團體……」

一九三六年的內戰不過是兩年來人民陣線和 C. E. D. A. 在議會中的鬥爭的繼續。鬥爭的形式當然更加尖銳化了。法西斯派因為以前的反對方法失敗，就發動了流血的內戰。政府的擁護者也就執起干戈，保衛民主，以求實踐政府的諾言。

武裝鬥爭通常都不過是政治鬥爭的另一方式的繼續。

第十四章 革命的經濟根源

西班牙受了數百年的苦，並不是因為她從未企圖脫離封建的常軌，卻是因為那些解放的企圖都是十分畏怯，十分冷淡，十分一致的失敗。一切打破封建政治的企圖都是在經濟的淺灘上蹶跌的。有許多基本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使西班牙直到現在還成爲過去時代的奴隸。在未能成功地運用這些問題以前，西班牙不論採行何種政制，都不能現身於大國的行伍中的。澈底地分析起來，這就是一九三六年民主派和法西斯敵人鬥爭的真實意義。民主政府表示要實行某限度的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法西斯派以及團結在他們旗幟下的一切人們，對這些改革，卻都是深惡痛絕的。

要把西班牙經濟的一團亂麻解析開來是很不容易的。西班牙資本主義過遲的，不平衡的發展，造成了許多特殊而矛盾的問題。大多數的人民還在土地上謀生，全國大部分的財富還賴

在土地上面。封建的生產關係和封建的社會關係也仍舊留在這裏——土地上，有許多大地主，無土地的貧農，攤分收穫物的佃戶以及爲工資工作的佃工。

但是在封建基礎的上面却已興起了近代生產方式的上層建築。產業工人雖然還是少數，但也有數十萬人了，他們不但必須反對封建主義，同時也必須反對資本主義。西班牙的資本主義可以說是比較落後的，但它終究是資本主義，它已發揮了資本主義的特有現象，如罷工，工會，和革命的勞動政黨。

同時，西班牙的資本主義是和別的資本主義不同的。它有某種變形的影響，加到封建主義的上面。同時封建主義也有一種更大的影響加到資本主義的上面，以作回敬。在勢力的互相牽制中，却苦壞了資本主義，因爲它從未擺脫過封建主義的根本矛盾。在英法諸國，資本主義都會和封建主義起過猛烈的，基本的衝突，只有在西班牙，他們並不如此。我們不妨說，西班牙資本主義和實業的發展，是出於封建利益所容許的範圍之外的。教會，王黨和貴族之所以有龐大的寄生勢力，原因就在於此。

除這一切之外，西班牙的封建主義已進展到帝國主義的時期，已把生產事業集中到金融貴族優勢下的少數人手中。近代的西班牙也有着帝國主義的形態，也有着可以任意剝削的殖民地。同時外國的帝國主義已經透入了西班牙，用着投資的方式，扼住了西班牙實業的咽喉。

一個多麼複雜的背境！這就是近代的西班牙。它是一個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並存的國家，在這三種主義上面，因為外國金融的透入，又有了半殖民地的特性。但是封建主義却是底部的基本階層，就是這個階層，把其餘的一切都拖到下面，扼住了工業的自由發展。過去時代窒住了未來時代的呼吸。

只有在這些基本的經濟問題的光線中，我們才能瞭解一九三六年的內戰，以及近百年來一切政制的改變。在現勢下所牽涉的一切因素中，我們知道得最少的就是這些經濟問題。倘若規避了或誤解了他們，就會使近代的西班牙史變為一團神祕。

★ ★ ★ ★ ★
直到一九三一年，西班牙一切的財產制度和社會制度都還是代表着道地的封建主義。統

治着現代的教士，朝廷，和軍隊都是過去時代的殘餘。他們在組織上完全是寄生的。軍隊從未在國外戰爭中打過勝仗。教會是大半靠着地租維持着。王黨和貴族都是地主，而不是工業的牟利者。

西班牙的統治階級，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擁有古羅馬式大地產的地主。它的財富基礎就是大地產。在這些大地產上勞作的佃農和僱農，地位和農奴並沒有多大的不同。根據估計，在二千四百萬以上的全人口中，大地主僅佔五萬。他種統計的數字還要低落，說貴族的人數只有二萬到三萬。至多，他們僅佔全人口的五分之一，而所佔有的土地却為百分之五一·一。他種統計上土地的百分比還要高些。這些大地主扶持並統治着王國，而且他們都是貴族階級的成員。

在等級上略為低一點的，就是富農，平均每人佔有五五·七英畝土地。根據估計，七萬富農佔有了全國土地的百分之三五·二。他們在政治上並不是獨立的角色，而是上層貴族的親密同盟。

第二次民主政府成立的第一年，它是和嚴重的農業危機聯袂同來的。

一九三一年，在一家西班牙的經濟報上，發表過一張西班牙財富各部門的表格。雖然現在各部門間的差數已不會有這麼大了，一般的關係是仍舊存在着的。這張表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的經濟報（El Financiero）上所發表出來的，內容如下：

單位貝沙太（Pesetas）；

農業	一一九、九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牧羊業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礦業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工業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國外貿易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沿海貿易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國內貿易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因為西班牙工商業發展的落後，資本主義的推動力——布爾喬亞——非常軟弱，布爾喬亞出現得很遲，很慢，很不完全。它的弱點使它不能扮演獨立的角色。在反對普羅列塔利亞的階級鬥爭中，它需要同盟者。自然，它不得不依賴社會的優越勢力，雖然這些優越勢力多半是封建性的，因此在本質上也多半是反資本主義的。一面做大地主，一面做大資本家的實例究屬是很少的。

此外還有兩個環境也阻礙着大資本家的發展。加泰隆尼亞一向是全國的大工業區。這在歷史性上是很重要的，因為西班牙老早就把加泰隆尼亞視為殖民地的。其次，由於西班牙資本主義發展的困難，遂使大規模的外國投資乘機潛入，多數的大企業遂盡落入外人的手中。

扮演着比較獨立的角色，還要算城市中的小布爾喬亞，如工匠，小商人，店主，政府機關的下級職員，還有最重要的，知識階級。一九三一年以前，他們是反君主，反貴族和反教會運動的先鋒。貴族阻礙着工業的發展。教會壟斷着自由職業，尤其是教書的職業。君主政府是特權階級的最高營利機關。

現在，西班牙最分明的，最純一的，最決定的階級就是產業工人。在工商業和運輸業中，工人的數目約計一百五十萬。他們多數在加泰隆尼亞區。西班牙的主要實業是加泰隆尼亞的紡織工業，和巴斯克與安達盧西亞的屬金礦工業。加泰隆尼亞約有二十萬紡織工人。全國的礦工和五金工人約有十七萬五千。

* * * * *

一八三〇年加泰隆的紡織廠中早就採用蒸汽機了。第一條築成的鐵路是在巴塞羅納和馬太羅 (Martorell) 之間，長約三十英里。後來冶金工業也在畢爾巴周圍發展起來了。

殖民地的喪失和以後的世界大戰使西班牙的工業疾驅前進。當大戰時，加泰隆的紡織工業都經過改組和集中。人造絲工業也出現了。化學工業也發軔了。由於在大戰中的中立，西班牙遂有機會，接受交戰雙方的軍火定單。一九一三年西班牙貿易的入超是五千萬萬元。一九一八年她竟有了六千萬萬元的出超。

但是通盤說來，西班牙的工業，除少數主要工業之外，是不逮歐洲各國遠甚的。它很像十九

世紀中葉英國資本主義的情狀一樣。

鐵道是一國中工業發展的最好指針。西班牙鐵道的運費很高。一桶葡萄從西班牙東南部的亞爾美里亞（Almería）運到敦倫，再運到西班牙西北部的畢爾巴只要化五個貝沙太的運費。如把同一桶葡萄從亞爾美里亞運到瑪德里，那就要化八個至十二個貝沙太。一九二九年西班牙每一居民的平均運輸數是二噸，同時在法國就有九噸。許多有五六千居民的城市和最鄰近的火車站都有六七十英里的距離。西班牙的鐵道是以兜遠圈子著名的。起初建築鐵道的目的，多半爲了適合貴族的幻想，很少注意到近代工業上的效率問題，因此才會有這些兜遠圈子的情形。每一要人都有火車旅行券在手頭的。結果，從瑪德里到努爾高斯（Zaragoza）這條路，從公路行去只有一百五十英里，從鐵道行去就有二百二十五英里。

近代的主要企業大半在外人的手中。許多大的工業會社，在西班牙政府登記，算是西班牙的商行，以規避限制，但實際上他們全受着外資的操縱。法、英、比、德、美各國的資本很早就流入西班牙了。曾有一時西班牙銅的產量位列第一，但是現在它已降居第六位了。一八七三年，西班牙

把她最大的礦產里奧挺多 (Rio Tinto) 薩爾柴 (Zarza) 和泰爾西斯 (Tharsis) 以一萬萬貝沙太的價格，賣給了一個英國公司。這個英國公司歷年所得的利益約計二百三十萬萬貝沙太。

亞利干的 (Alicante) 的杏仁工廠是一八九二年爲法人所創辦的。操縱鋅礦和鉛礦的阿斯都里亞王家公司是比利時人的。西美電氣公司是比法美德諸國人民合營的。巴塞羅納的電車每年要爲它比利時的主人獲得九百萬貝沙太的贏利。

當大戰時，西班牙正在發展中的工業經歷了一個蓬勃的時期，同時外國的操縱也格外加緊了。德人通過非立克斯 (Felix) 電氣化學公司，操縱着各種酸素和肥料。另一家德國公司操縱着染料。法人操縱着安達盧西亞的礦產，比人操縱着鉀田，加拿大皇家銀行和法國電氣總公司聯合操縱着加泰隆的電氣托拉斯。美國的資本是新近才和佔優勢的英法投資家競爭的。里維拉把電話的專營權給了國際電話電報公司，這個公司，在一九三〇年，獲得了三千四百五十萬貝沙太的贏利。該公司在一九三五年的年報上說，在西班牙電話公司中，該公司的投資在四

千八百萬美元以上，它在西班牙的總投資共達六千七百萬美元。

一九三六年九月，勞動調查所的經濟情報上登載着美國商業局經濟組主任瓊斯（George M. Jones）的話：「在一九三三年年底，美國在西班牙長期投資的總數約計七千萬美元。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大概不會有多大改變的。」他種統計說美國的總投資有一萬萬美元。

一九三〇年美國的商業部發表過一篇美國在歐洲各國的直接投資的文章，說美國在西班牙共有十八所製造廠，投資約計一千二百五十萬美元，又有九個油公司，投資約計八百五十萬美元，又有十三個商行，投資約計四百萬美元以上。一九三〇年的總投資約共計七千二百二十三萬美元。

突然的戰時繁榮釀成了工業幼稚國的大量生產過剩。當戰爭結束時，經濟的真空真足驚人。貿易的差額又轉為負數了。加泰隆的紡織工廠和巴斯克的礦場都受了嚴重的打擊。罷工運動蔓延了全加泰隆尼亞，警察和軍隊在街道上巡邏。一九一七年，巴塞羅納的工人在要求分潤

戰時繁榮的總罷工中，竟橫遭着機關槍的掃射。戰爭結束之後，繁榮就瓦解了，勞動的「爭端」遂變成了經常的固定。

一九一九年，巴塞羅納又爆發了一次十分有效的總罷工，在這次罷工中，以及在罷工後的一個時期中，一切憲法上的保證都被擱置了起來，巷戰已把街道染成殷赤了。據半政府的機關報民族報（*El Nacional*）的記述，單在巴塞羅納一省中，一九二三年一月至九月的九個月中，就有三三七人被殺和四三四人受傷。里維拉在九月中實行了「冷酷的奇襲」。

里維拉竭力想使西班牙的工業站定腳跟，甚至犧牲農業亦在所不惜，他把工業品的關稅加以空前的提高。他收回了幾個外國公司的專營權。凡他認為最好的事業，他都慷慨地給以津貼。但是里維拉的大計畫都很少實效。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並不會把西班牙輕輕的放過。

西班牙的工業，在擴展力上，又受着一種更基本的限制。農民和佃工像農奴一樣的生活狀況，使民衆的購買力降到最低的程度。生產費的高昂以及外國關稅壁壘的森嚴使它在世界市

場中不能有成功的競爭。封建地主獲得的贏利是不肯再投資到生產事業上去的，他們只把地租拿到國外，或在不生產的消耗中浪用。

西班牙工業進步的前提，是徹底的農業革命，只有農業革命才能使生產力脫離封建的桎梏。這個農業革命已經歷期得很久了，它的本性，在西班牙歷史中是埋得很深的。

第十五章 無土地的人民

一位聞名的新聞記者卡斯脫羅 (Cristobal de Castro) 在一九三一年寫了一本論到西班牙的書，其中有一個小標題說：「無土地的人民和無人民的土地。」

這就是西班牙在本質上的情狀。在這個沉痛的、觸心的訴詞後面，還專一件事實，就是它在歐洲各國中人口要算最稀，而同時，土地却集中在最少數人的手中。

本地人常喜歡說：「西班牙是貧瘠的國家。」有些地方雨量不夠，有些地方是一片酷熱的焦土。其他的國家是有方法對付這些問題的。馬克斯在資本論上說：「阿拉伯統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利，工業之所以繁盛，祕密全在灌溉工作的上面。」話雖如此，現在的西班牙，即使自然條件最有利的地方，農業也是癡痺而無生氣的。得天最厚的區域並不就是生產最多的區域，這件事實，我們萬不可忽視的。

西班牙經濟的衰微是開始於十七世紀。當一六〇九年百餘萬的摩爾人被逐出時，西班牙就失去了最優秀的農業工人。在中世紀，就有了一個全權的畜牧會社，叫做梅思塔議會（Council of Mesta），這個會社有權圈定遼闊的皇家羊地，嚴禁人民擅入。一本古書上說：「羊羣於四月間從拉曼察（La Mancha）和意斯德勒馬都拉（Extremadura）出發，蹂躪着卡斯提爾，於九月間再回到原處。」這事一直繼續到十九世紀。政府歧視農業，袒護牧羊，損害土地的方法很多，梅思塔不過是其中之一。劫掠、復仇和偏執的許多次戰爭，結果除了民衆受苦和經濟衰微之外，都一無所獲。同時，封建的軍事貴族却霸佔了大塊的土地，他們榨取着土地，以從事冗長的戰爭，以豢養寄生的從僕。

封建經濟是一種道地的大地產經濟，農民在大地產上工作，以服役，或付款，或二者俱備的方式報效着貴族。農民是附繫在土地上的，一代復一代的耕種着同一塊土地。在貴族和農民之間有一個監督階級，他們是貴族和農民之間的社會的和經濟的中間人。實際上，在一切對農民的要事中，貴族是有全權的，他的使者的話就是法律。

西班牙的封建領主，在許多地方，比歐洲一般的封建領主還要不經濟。他們聽任着地產荒廢，尤其在安達盧西亞和卡斯提爾兩處。牧羊大規模地代替了種植。許多土地都保留起來，專供游獵和畜養野牛，以備到民族遊戲中去犧牲生命。

降至今日，西班牙的農業尙未擺脫封建制度的麻痺狀態，實際上全國已耕的土地僅有百分之四〇，其中有四分之一還是每年休耕的。一九三二年的西班牙已耕地和未耕地的數字要算是最近的：

(單位英畝)

山地和牧場	五八、四一九、〇〇〇
荒地	一二、五九四、〇〇〇
城市和道路	三、五六〇、〇〇〇
已耕地	五二、二三四、〇〇〇
休耕地	一一、四〇一、〇〇〇

總面積	一二四、八一〇、〇〇〇
未耕地	七四、五七四、〇〇〇
已耕地	三七、九三三、〇〇〇

當有人說起西班牙人民「缺乏」土地時，我們必須加以某種解釋和斟酌。除法國外，西班牙要算西歐幅員最大的國家，它是有很多的土地的。小農和佃工之所以感覺土地不夠，完全是由於佔有土地和分配土地的方式。意思就是說，只要把地主們需要以外的或是所能耕種以外的土地收回來，就決不致不夠了。

農民和漁民要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六·一。單是農民也要佔全人口的半數以上。西班牙的統計是很不完全的，僅有一部分可信的，但是他們究竟也能供給一些事態的意見。這裏是最好的數字：

一九三一年有五十個省分舉行登記（上次的土地登記是在一八八一年舉行的）。在二十七省中，有百分之七六·五的人民佔有了百分之四·七的土地，同時有百分之二的人民却

佔有了百分之七六的土地。

受大地產痛苦最深的區域要算意斯德勒馬都拉（*Extremadura*）安達盧西亞和卡斯提爾了。在這三區的十二省中，有百分之二三的地主是稱爲大地主的，他們操縱着百分之六三·一五的土地。南部一帶共有地主七五八，九五二人，其中有二七三，六二三人各佔不足一公頃（合二，四七一英畝）的土地，有二九一，六二三人各佔一至五公頃，有八二，五一七人各佔五至十公頃。

一九三二年政府設立了一個土地改革院，來研究土地問題。據它的論點，在八十萬戶家庭中，土地足以維持全家的不足一百萬戶。其他的七十萬戶中，一半是一點土地也沒有的，還有一半僅有小塊的土地，他們不得不爲人做短工或是叫家庭中的某人去做長工，以補助收入的不足。有些省分中，大地主佔有了一半的土地。有些省分中，大地主佔有了三分之二的土地。

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用佃戶制或攤分收穫物制耕種的。常時，佃戶和二佃戶合種着一塊土地，因此，中間人又得抽去收穫物的一部。生產品的一大部分要充作封建的租稅。加里西亞，雷

翁 (Leon) 阿斯都里亞和薩摩拉 (Zamora) 的農民都得付一種封建的重稅。加泰隆尼亞的「來倍卡瑪太」 (Rabacca morta) 規定種葡萄的農人必須以三分之二的收穫物付給地主。

在加泰隆尼亞和地中海沿岸，主要的土地問題倒並不是已耕的或未耕的大地產，却反是小地產。這裏，大地產是沒有的，田地都小得可憐，不足以施展有利的，經濟的種植。西班牙的土地問題最主要的是劃分大地產，但同時也有着一個適得其反的問題。

在鄉村中，村長 (Oceli Ques) 是西班牙封建政治的頭目。村長是地主的家宰或代理人，後來又成爲銀行家和大商人的家宰或代理人。西班牙的村長和別的封建國家中的監督頭目 (ward boss) 一樣，不過權力還要廣大。村長常能左右市政和議會的選舉，使那些有權階級的直接代表當選。

一眼看去，我們就知道土地問題是一個嚴重問題。只有沙皇時代俄國流行的土地問題才能和它相比。佃戶們都窮得買不起農業機器和近代的耕種工具。大地產上廣大的耕種法是很

浪費的。灌溉制度更不用說起，因為沒有人出錢，也沒有人計畫。

結果，西班牙遂成了比較不生產的國家。農業技術的落後，反映到它的出品上面。最大的農產物是麥。一九三三年歐洲各國麥的平均產量是每公頃三，〇二〇磅。在西班牙，只有二，一〇〇磅。法西兩國都是產酒的國家。一九三三年，西班牙有三，八一五，九〇三英畝葡萄園，出產了五二一，四六一，九五八加侖的酒。法國只有三，七七六，六三〇英畝葡萄園，但酒の出產却差不多比西班牙要多一倍——一，一三八，八五二，〇〇〇加侖。

所以，不管西班牙人口的生產率有這樣的高，人民的貧乏已使人口大為減低了。西班牙在歐洲要算是人口最稀的國家。連以人口問題出名的法國也比她還密。西班牙平均每方哩有二五人，葡萄牙，一九二，三人；法國，一九六八；意大利，三四四人；德國，三六三人；不列顛，五〇四人。那就是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土地問題的實在情形。當時，農民已開始爭權。當時，人民陣線選舉的勝利已實行了一些改善。當時，法西斯派已發動了武裝叛變，以反對民主，以阻止土地革命的徹底實行。實際上，在君主政府下，絕未有過一些補救現狀的方案。因為君主政

府是依賴着大地主和教會的。它不依賴大地主和教會還有什麼辦法呢？土地改革就將成爲結束君主的信號。

土地改革的最早提案，在第一次民主政府成立以前就出現了。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亞蘭斯在議會中提出議案，主張把未耕的荒地分給無土地的人民。亞蘭斯是一個貴族，後來轉變爲民主主義者，并爲民主黨的重要發起人之一，這個議案並沒有多大的成就，但它表示目光遠大的民主黨員，即使在那時，已懂得西班牙在本質上最爲迫切的問題了。

直到里維拉當權，情狀絕未有過多大的改變。這位獨裁者——里維拉——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的勅令中，實行了他的分散大地產的提案。法案上說，在地主的荒地上工作的佃戶，可以出價收買土地。這勅令分明是一個滑稽。

當一九三一年民主政府到來時，它在土地問題——革命的中心問題——上作成得最壞。這裏，民主派和教會，貴族起了正面的衝突。這裏，他們竟最可恥地妥協了。但是土地問題若不解決，民主主義是一定要遭殃的，因爲反動派一有機會，就能重握權力。地主階級的經濟權一天不

加以摧毀，他們就一天無須擔心政治權的失墮的。

民主憲法並不會具體說出收買，沒收，或分配。它只答應着說，政府當立即着手這個問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他們討論着土地改革法案，到九月九日，這個草案終於在議會中通過了。其時，離民主政府的成立已一年有半了。

法案的條款和過去時代迥然不同了。他們是遠大的，雖然還不及有些人所預期的基要。但是他們總算已作了一個決定的起頭，以打破西班牙封建地產的產權。法案上說，政府可以徵發流亡的王黨的地產，以及未耕的荒地。除封建地主之外，一切的業主，政府都當給以補償。徵發來的土地，當依社會的選擇，分配給佃戶，佃工，或合作社。法案又根本取消了封建的租稅，並沒有一點補償。在一九三二年正月間，有一個較早的法案把耶穌會會員的一切財產都沒收了。現在這個較遲的法案又將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實行了。

不幸，當時掌權的民主黨和社會黨的集團，在延遲了一年又半之後，還是沒有勇氣，以採取直接的，有效的行動。他們規定以一年為全部問題的「研究」期間，因此，在他們的遠約中，法案

又不能立即付諸實行了。

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民主黨和社會黨的集團統治着西班牙。他們延宕着和半封建的地主算帳的日子，真是自斷政治的咽喉。土地改革法的條款，意思就是地主的經濟和社會慘敗。地主對這些條款都十分惱恨。於是他們竭盡了全力，以冀重握政權。當然，在這時期中，民衆行動黨和勞伯爾斯的 C. E. D. A. 都組織起來了。右派對付敵人的手段比左派來得高明，在一九三三年秋季的選舉中，他們又回到政府中去了。這個反動的勝利，在經濟上的含義，就是土地改革法的遭殃。

一個和第一次土地法相反的法案在勒樂內閣的友善議會中，風馳電掣般的通過了。新法案並不全部否認土地改革，他們看到農民難耐和好戰的情緒，就知道全部否認土地改革是不可能的。政府每年只提出五萬貝沙太，以作徵收土地的賠償。收買的條件又大有利於地主，如果他們請求「收買」，他們就能使國家破產的。

總之，這點土地基金即使全作收買土地之用，也不過是杯水車薪。這法案立刻把有一百四

十萬英畝田地的一百個貴族，救出了收買的威嚇，勒樂政府更贊助着勞伯爾斯的民衆黨所提出的另一議案，把前政府所沒收的一切土地，歸還了原主。勒樂和勞伯爾斯的選舉勝利使經濟的時鐘又倒撥到君主時代去了。

這種顛倒現象，一直繼續到一九三六年二月間人民陣線選舉勝利後，那時土地改革又前進了，而且前進得更迅速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議會通過了一個法案，主張把農民因欠租而被勞伯爾斯政府逐出土地的案件重加審查。數千萬農民的家庭有了重回以前所種過的土地的權利。最主要的，我在以前已經說過，約有十萬農民和他們的家庭已定居在土地上了。

二月選舉後，地主的利益受了決定的威脅。他們拚命地努力，以冀重得這些利益，這就是一九三六年的法西斯叛變。法西斯的勝利意思就是土地改革的廢止。人民陣線的勝利意思就是土地改革的加速。在戰爭的最初數天中，柏來拉政府就沒收了一切和法西斯有關的地主的財產。教士的大地產也被褫奪了。

顯然，農民的獲得土地是以鬥爭的結果爲轉移的。

第十六章 西班牙的教會

在西班牙有一個組織，比任何個人更強，比任何貴族或全體貴族更有力量，比君主政府更有權勢，比軍隊更能說服民衆。

那個組織就是天主教的教會，和它的僧衆。西班牙非天主教徒的人數只有三萬五千。

天主教的教會是西班牙最大的地主。它也是最主要的實業家，銀行家，教師和放債者。它的財富約佔全國財富的三分之一。它的許多男女僧衆和上下級的教士組成了一枝真實的職業軍隊。

每九百人中就有一個教士。教王的所在地意大利，每二萬人中也只有一個教士。當教士和供聖職的人共有十萬零六千七百三十四名，其中有二萬五千四百七十四名是教士，有八萬一千二百六十名是男女僧衆。沒有一個其他國家的教士會組成這樣有紀律的，有力量的既得權

益。只有政府的主要行動方能驅逐他們。無怪左翼社會黨議員納爾根 (Margarita Nelken) 要說：「在其他國家的民衆運動中，羣衆襲擊着銀行和王宮，同時，在這裏，它却焚燒着修道院和教堂。」

教會時常通過它自己的政治代言人，直接干涉國家的政治。它有自己的報紙，在國中設備要算是最完備的。在每一重要問題中，它終要左袒着一方的。

數百年來，教會一向是全國真正統一的中心，地位比君主政府還要重要。和摩爾人血戰了八百年，卒告勝利的就是那些篤信天主教的公侯。屢次的叛亂都是反對政府的，而不是反對教會的。爭權奪利的雙方都是天主教的教徒。

教會問題，在歐洲各國中早已被遺忘了，在西班牙，它却還和土地問題一樣，正待解決。在中世紀，經濟的和社會的活動和組織，構成了有世俗權力的封建制度，教會因爲是大地主，也就加入了這個複雜的機構。這是歐洲一般的真情。概括說來，因爲西班牙的封建制度特殊的長壽，西班牙的教會也就把古代封建的僭越權利保存下來，直到現在。這就是現狀下的爭點了。西班牙

的教會是半封建的，一點不像別國的教會一般的富有伸縮性的。

個人的貴族有生有死，封建的邸宅有盛有衰，教會却依照着它的受託人——教士，永遠地進行着。在中世紀和以後的一個時期中，有宗教信仰的地主，常以大量的金錢和土地捐贈教會，以求贖罪。那個老式的，永遠管業的封建信條，到十八世紀還仍舊有效。依據這個信條，教會只能獲得新的土地，一經獲得之後，它却永不能出讓或喪失的。

教會本身，在一種純然營業性質的基礎上，經營着它的土地和財富。它經營的效率比貴族高過萬倍。它是富有的地主，就僱用着千萬的佃工。它是大地產的業主，就從佃戶那裏勒索着巨額的租費。各教派，尤其是耶穌會派，在土地的生利上，表顯出偉大的營業幹才。他們投資於工業，運輸業和銀行業，都獲厚利。他們和世俗的企業競爭，都得了勝利。

舉例來說，耶穌會派在瑪德里開設着班哥歐克夏銀行（Banco Urguio），有資本一、二、六、〇〇〇，〇〇〇貝沙太。它更控制着四個較小的省銀行，共有資本八五，〇〇〇，〇〇〇貝沙太。北部的鐵道，安達盧西亞的橋林，巴斯克省和里夫的礦產，據說都或明或暗地為他們

所操縱的。

在農村中，教會組織了信用合作社，因此鄉村牧師都兼營着放債者的職務。一九一〇年，教會組織了一個全國天主教工人聯合會，當作天主教聯合的中心。他們組織這個團體，尤其是爲了義斯德勒馬都拉（Estremadura），卡斯提爾，和安達盧西亞的佃工。

在其他的國家中，沒有一個教會是這樣地壟斷着人民的「心靈」的。學校很少，但修道院和教堂却有許多。所有的學校都在教會的操縱之下。一八五七年以前，教育實際上還是教會的特權。那年通過了一個促進國民教育的法案，但是因爲教士的反對，這個法案就變成死的文字。在一九三一年，至少有半數兒童是直接由教士授課的，同時國立學校和市立學校也都受着教士的監督。

但是教會在這件事中，也正像在一切其他的事件一樣，竟遭了可憐的失敗。根據一九三〇年所作的最後的戶口調查，有百分之四·五四六的民衆不能寫讀。同年的美國只有百分之四·三三，西班牙的人民只有百分之二

○是識字的。

民主政府，如果只爲自衛，爲什麼必須打破教會的勢力呢？主要的理由完全是爲了教會施展着巨大的經濟權力，社會權力和政治權力。因爲教會是最大的地主，它自然就成爲土地改革的最前列的敵人。所謂收買土地，意思就是要首先收買教會的土地。所謂分配土地，意思就是要首先分配教會的土地。教會如果要想保持優越地位，就不得不站在保持舊狀派的一面了。但是沒有土地改革，教育改革，和政治改革，民主政府簡直是不可能的。教會橫臥在進步的大道上，難免要自取滅亡的。

直至一九三一年，西班牙的教會和政府是並未分開的。即使一八一二年那個使君主隸屬於議會的憲法，對教會也從未有所侵犯。憲法上毫無保留的說：「無論現在或將來，羅馬天主教永遠是西班牙人民唯一的真教。國家當用聰明正直的律法，加以保護，並絕對禁止任何異教。」後來，教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是根據於一八五一年的政教契約（Concordat）的。這契約宣告着說：「羅馬天主教是排斥一切異教的。它將繼續成爲西班牙全國唯一的宗教，並將在

天主教君主的領土內永存弗替。它根據上帝的法律及聖典上所制定的法律而獲得的一切特權，都將永遠保存。」

過了十七年之後，一八六八年的臨時憲法，在紙面上，把一切教會的特權掃除得乾乾淨淨了。臨時政府解散教派，拒絕支付對教會的津貼，沒收各教派的財產。但是教士對當前的大危險，很及時的醒悟過來了。他們奮力地加入一八六九年的選舉運動，結果，獲得了許多足以取消法律的議員名額。一八六九年所採行的憲法仍舊迫令政府維持天主教。當一八七五年亞豐瑣七世登極時，教會的財富和權力都重復舊觀了。

在十九世紀中，天主教總共受過四次壓迫，但他們終是倒而復起的。這已成爲西班牙天主教的特性了，它能較敵人更活得長久，能克勝壓迫，能衝破一切憲法上的限制，能擴張財富。同時西班牙的國家，概括說來，已一步一步的沉淪到擾攘的貧乏中去了。

當一九二三年里維拉當權時，他是和教會相依爲命的。和他的政制相符合的口號是「國家，君主，宗教。」

從下面的插話中，我們就可看出他是多麼眷顧着教會了。一九二九年三月——里維拉是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八日辭職的——他發佈了一個敕令，使兩個天主教的最高學府，裘斯多
(Duro) 的耶穌大學和哀斯哥立厄 (Escoria) 的奧古士丁大學，有權頒發文憑及自立
考試委員會。以前，在十七個國立大學之外，所有的私立學府都是在教會的手中的。但是教會學
校是不准發給文憑或學位的。學位考試權還保持在國立的學府中。授權教會學校發給文憑，實
際上就是使教會學校離國家獨立。當這個提案提到全國顧問會議時，那個優柔寡斷的機關，在
經過一番冗長熱烈的辯論之後，也終於以這提案為反動，而把它否決了。但是敕令竟使它付諸
實行了。這件事，教會是應該感謝君主政府和獨裁者的。但是有了這次教會的抬頭，才會有下次
教會的沒落。

當第二次民主政府的憲法公布時，教會的機構就開始崩裂了。教會和政府分離了。信教自
由確立了。民事法庭可以判決人民離婚了。墓地世俗化了。教會不能再徵免稅了。在一九三二年
的預算中，付給教會的津貼減削了三分之一。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津貼就將全部取消。一九三

二年一月間，議會解散了耶穌會派，並沒收了它的財產。議會并禁止各教派收買維持生活和執行教務以外的產業。軍隊中的宗教軍團也被解散了。接着，又有一個立法，禁止教士經營工商業和教育事業。

一向操縱着西班牙事件的梵諦崗——在十九世紀中，教王是扮演過政治的主角的——立刻反攻了。西班牙的牧師發出教書，嚴禁兒童進入國立學校。一九三三年六月，教王庇護士十一世頒發特諭，抗議政教的分離。政府的人員都被逐出教會。

其時，握權的民主黨和社會黨的集團，處理教會問題也像處理其他的事情一樣。它不能言行一致。政府沒收耶穌會派的財產還不到四分之一。解散教派，沒收土地，須等到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實行清算的日子又是稽延着，遂產生了同一悲慘的結果。

當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到來時，民主黨和社會黨的集團已不再在位了。那時正舉行着選舉，結果，教會取道於勞伯爾斯的民衆行動黨，又重回原座了。

勒樂總理藉口世俗教育的不可可能，立即宣布不再禁止宗教教育。他并任用勞伯爾斯的親

隨羅茂羅 (Pita Romero) 做外交部長，和梵蒂崗教廷修好。勒樂和勞伯爾斯的聯合政府倒撥着土地改革的時鐘，穩定了教會的經濟勢力。各教派凡是有所損失的，都補償了過來。於是他們惱怒的情緒都平靜下去了。

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選舉以後，鐘擺又盪到另一面去了。老法案都重新制定了。二月選舉和七月叛變相隔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是一切的激烈政策實際上都實行了。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教育部長執行了一九三一年憲法的第二十六條，把一切教派的房屋和財產都沒收了。

人民陣線的勝利意思就是完成一九三一年的革命，這是毫無疑義的。以前民主派並不會完成他們自己的決意，現在內戰的危急，迫令他們不得不加以完成了。

第十七章 軍官階級

在民主運動和勞動運動未成爲值得注意的勢力以前，全西班牙只有兩個有組織的，同性質的勢力。一個就是教會。還有一個就是軍隊。

在歐洲沒有一個軍隊是像西班牙的軍隊的。它在許多方面都是獨樹一幟的。在對外的戰爭中，它時常是打敗仗的。它在近代的歷史上最是不經濟的，也是最乏實效的。然而沒有一個其他的軍隊在民族的生命上曾經扮演過這樣重要的角色。它是給養簡陋，武裝窳敗的，然而沒有一個其他的軍隊消糜着這樣大的經費。它是接二連三地違逆着民意的。然而當拿破崙侵入西班牙時，把他逐出的，却並不是軍隊，而是民衆。

這些一對對的事實，一點也不是相剋的。他們都是相成的。

曾有一時，西班牙是南北美洲最先進的征服者。在一八九八年，和美國惡戰之後，西班牙在

南北美洲的地位完全被逐去了。此後，這個廣大的殖民帝國所殘存的殖民地，只有在非洲的幾小塊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西屬摩洛哥。海外殖民地的喪失，使西班牙有了一大批多餘的軍官和士兵。但是軍隊的數量却並未裁減。

軍官和士兵都無處安插。征服者的傳統觀念是很強烈的，但是征服的機會却已經過去了。軍隊變成了國家的贅疣，犧牲着民衆的自由以維持上級軍官的現狀。以前軍隊的有毒素的勞力是向外伸展的。現在它的活動只好轉而向內——向西班牙本國了。

因着一八九八年以後工業的發軔，因着民主運動遲緩而堅定的發展，君主政府不得不更加依賴着軍隊，把它當作緩衝器和武器，以防阻社會的不安和經濟的變遷。

君主政府，教會，地主，和大資本家急切地需要軍隊，以對付農民，民主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等繼續增長的不滿。這就是軍隊特殊重要的理由了。一國中社會和經濟的機構越加腐敗，站在機構頂層的人們，地位也就越加不穩。革命的危險使社會的特權階級不敢和軍隊敵對。

西班牙軍隊特殊而原始的組織，正迎合着統治階級的需要。它正可爲軍官階級爭取更大的光榮。

在組織上，西班牙的軍隊是常以兩件事著名的：軍隊多過國家所需要的比例，軍官多過軍隊所需要的比例。

一八九八年，西班牙共有四九九個將軍，五七八個校官，和二三〇〇〇其他各級的軍官，他們所指揮的軍隊却不過一五〇〇〇人左右。一九一三年，在西班牙有一一，三五八個軍官和八七，四七一一個士兵，在摩洛哥有一，二四九個軍官和三四，四六九個士兵。軍官和士兵的比例是一個軍官對六個到十個士兵。

這個比較上龐大的軍官階級在另一方面又是佔着便宜的。在一九三一年以前，軍事預算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充作軍官的薪水和乾薪的，其餘的部分是充作士兵的薪水，以及置備給養，軍火和軍需。

一八九八年的軍事預算如下：

(單位貝沙太 Peseta)

軍官薪給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士兵薪給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軍需，軍器，軍火等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這種情狀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一年，這年，在六五一、〇〇〇、〇〇〇貝沙太的軍事預算中，軍官的薪水要佔到四九〇、〇〇〇、〇〇〇貝沙太。士兵的薪水一天不過五個貝沙太。只有一六一、〇〇〇、〇〇〇貝沙太用於軍需和給養上。

結果，西班牙的軍隊中另有一個軍隊，或者還不如說，另有一個階級。這個階級保持着牢不可破的階級區別。它是由軍官組成的。軍官都是從貴族和地主中遴選出來的。平民出身的很少，連中等階級出身的也不多見。騎兵隊尤成爲反動派的淵藪。因爲騎兵是並不機械化的，它一點沒有專門技能的性質。專門技能往往能改變近代軍隊的階級性的。

除正規軍之外，還有幾個重要的武裝組織。保安隊，人數有三四萬，紀律嚴明，訓練有素，是武

裝勢力中的精銳。它是百餘年前開始組成的，原來是爲鎮壓盜匪。自世界大戰以後，政府常用保安隊來鎮壓農民的騷動和工人的罷工。他們不使保安隊和民衆接近，使他們駐紮在離城市很遠的特別軍營中。

勞動運動是久已要求着解散保安隊的。當一九三一年民主社會兩黨的集團執政時，政府除了慷慨的允諾之外，實際上並未有何動作，以滿足這個要求。政府藉口要解散保安隊，另外組織了一個武裝隊伍，叫做突擊隊。意思是想創造一枝比保安隊更傾向民主的隊伍。果然，突擊隊要比保安隊略爲進步。它的成員都是從失業工人中招募攏來的。但是保安隊却並不會解散。而且突擊隊的軍官都是從客籍軍，正規軍和保安隊中抽調出來的。第三個特別的武裝勢力是守衛隊 (Security Guard) 充作邊境稅關衛士的稅警，人數約計一萬五千。

軍隊干政的最早嘗試是在一八二〇年，當時，里哥 (Rafael del Riego) 將軍所統率的數團軍隊發動叛變，以恢復一八一二年的憲法。這是十九世紀中西班牙軍隊干政的初次。這次叛變是勝利的，而且是反對君主的，這真足令人驚異。二年以後，法國的軍隊開入西班牙，恢復了

非琅多 (Fernando) 七世的王位，於是，里哥叛變的影響都一掃而空了。

一八三五年，軍隊迫令行政院長羅薩 (Martinez de la Rosa) 辭職，這是干政的第二次。以後，在一八七四年反卡羅斯黨的戰役中，軍隊又發生了一次叛變，阻礙着政府的軍事行動，但是到第二年，紀律就恢復過來了，使戰爭有了成功的結局。

到一九一七年，軍隊已開始成爲政事的決定因素了。他們組織了一個軍人會 (Officers' Junta)，表面上是保衛他們本身的地位的，但實際上却保衛着搖搖欲倒的君主政府。在民主政府下，西班牙軍人聯合會就起來代替了舊式的軍人會了。

西班牙軍隊在鎮壓摩洛哥的十八年戰役中所受的挫折，真是世無其匹的。發出一九二三年里維拉獨裁的導火線的就是這個摩洛哥的挫折。

有一次反對摩洛哥人的戰爭，是在一八五九年開始的，到第二年就勝利地結果了。但是更近的一次戰爭却是一個全軍覆沒的慘敗。里夫部落的領袖阿布的克靈 (Abd-el-Krim) 以數千的軍隊，作着頑強的抵抗。摩洛哥的瘍瘡終於在安紐厄爾 (Anwal) 的慘敗中化膿了。里夫

人正佔着上風的時候，雪爾斐司脫 (Fernandez Silvestre) 將軍所統率的一萬軍隊來和他們交戰了。一九二一年七月，雪爾斐司脫將軍佔領了離安紐厄爾的軍事地位有一英里之遙的意格立朋 (Iguerihen) 鎮。阿布的克靈就向西班牙的軍營大施猛撲，結果把他們悉數殲滅了。據說逃出的人只有七個。雪爾斐司脫將軍本人也是在屠殺中自殺的。

民主政府的第一任財政總長卡納爾 (Jaime Carnet) 說，在摩洛哥大失敗中所化費的金錢，已足完成西班牙的經濟復興。根據他的說，君主政府在最後的五年戰役中，已經浪費了五萬萬貝沙太。一九二九年五月間辯論報 (El Debate) 的特刊上說，十八年摩洛哥戰役的經費共計八萬萬美元。西班牙在這十餘年中，每年平均要損失一萬三千兵士，以反對機敏勇敢的里夫人。摩洛哥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的預算，撐起了百分之八五來維持軍隊，而教育、衛生和公共工程的經費却只有千分之二。

一九三一年的革命是不曾流過一滴熱血的，但革命以前，曾有兩次流血的軍事叛變作爲朕兆。第一次在一九二九年的一二月之間，是格拉 (Jose Sanchez Guerra) 鼓吹着破兵團

發動的。格拉曾做過一任議會的議長，是一個目光遠大的反動政治家。他要推翻里維拉以拯救君主政府。他以為若不把君主的憲法恢復過來，不久，無君主的憲法就會出現的。叛變的計畫事前洩露，遂遭了全部的失敗。

格蘭少校和里南提士大將的扎卡（Zaca）叛變，是一回更嚴重的事情，但是民主社會兩黨領袖的怯懦竟把它斷送了。

自民主政府成主以來，各次軍事叛變都是反動性質的。在一九三六年的叛變以前，桑耶雅將軍曾在一九三二年八月領導過一次最重要的叛變——一九三六年叛變的初期，從葡萄牙飛到西班牙，中途墮機殞命的，就是這個桑耶雅。

當一九三一年民主派獲得政權時，他們認識軍隊和軍官階級是一個最迫切的，最困難的問題。這個頭重腳輕的寄生軍官階級一天不能制服，就一天有着恢復反動的威脅。民主社會兩黨的集團作了一個獨特的妥協。他們把軍隊的數量大加裁減，但舊的秩序却仍舊保存着。

所謂裁判法——使軍隊有權對非議者實施軍法裁判的惡法——被廢止了。所有的軍官

都須宣誓效忠民主政府。現役軍官的名單竟從二六〇〇〇人大減到七六六二人，再加上在非洲供職的一七五六人。其餘的都算是後備軍官。作成一九三二年桑耶雅叛變的脊骨的就是這些深懷不滿的後備軍官。軍官學校從五個減到兩個。正規軍減到一〇五三六七人——還嫌太多，但已較從前大減特減了。

到了一九三三年，反動派重握政柄，實際上把這些改革都統統打消了。民主派和反法西斯派的軍官和士兵都有組織地被裁汰了。千百個參與桑耶雅事件的人都重據高位。他們又發佈法令，禁止兵工廠的工人加入工會。

一九三六年二月人民陣線選舉勝利以後，左翼民主黨政府又重蹈了一九三一到三三年的覆轍。他們僅把幾個主要的將軍「放逐」了出去。他們把富蘭科放逐到加那列羣島，把哥代特放逐到巴利阿里羣島。共產黨和社會黨曾指出這件事的愚妄，但是沒有用處。把那些將軍「放逐」出去，祇是提早了他們叛變的日期。

西班牙的軍隊，像西班牙的教會和西班牙的土地問題一樣，在過去的一世紀中，比歐洲任

何國家的軍隊，教會，和土地問題要更少改革，林肯的著名國務卿和作傳者約翰海（John

Hay）在一八七〇年遊歷瑪德里，他對當時的西班牙軍隊會說過獨到的話。他的說話一點無須修改，就可當作我們自己要說的話：

「在一切國家中。對自由最有危險的機關……就是常備軍。但是西班牙軍隊的精神恐怕在全世界要算最壞了。在其他國家中，軍隊至多不過壞到無用……但是西班牙的軍隊，從將軍到下士，都深中了陰謀的毒素……歷任的大臣都利用軍隊，以完成他個人的野心，他們在軍隊中遺留了大批多餘的軍官，這些軍官靠着個人服務或政治服務而獲得位置，多少是有些非法的……西班牙沒有一個將軍不是靠着陰謀獲得位置的。」

第十八章 國內民族問題

在多數國家中，少數民族的問題總是和經濟落後的區域聯繫着的。在西班牙，恰巧是相反。常爲西班牙當作殖民地看待的，恰巧是主要的工業區和農業區。

有人說，如果加泰隆尼亞的人民到美國來，他們就會變成美國人的，但是如果他們定居在瑪德里，他們却永不會變成卡斯提爾人的。加泰隆尼亞，全西班牙最富足的，出產最多的區域，常自視爲另一民族的。它的居民如果說是西班牙人，還不如說是加泰隆人。巴斯克和加里西亞的情形也是這樣的，不過程度比較淺點，那裏，民族問題也已變成急迫了。

這三個區域之所以能保持着自治的形式，完全因爲西班牙的統一過遲。意大利曾有一時被人視爲「地理上的名字」，但是這個綽號，西班牙更能受之無愧。高大的山脈畫成了許多自然的，獨自存在的區域。在火車飛機未通以前，這些區域都是各自孤立的。

加泰隆尼亞在九世紀的初年馬德爾（Charles Martel）侵入半島時，早就成爲一個民族的單位了。加泰隆抵抗着侵掠，保持着自治，直到十二世紀。在這幾百年中，他們發展了一個獨立的語言、文學和政府，加泰隆語言是和西班牙語言不同的，它很像法國南部的布魯溫斯（Provençal）方言。誠然，加泰隆尼亞曾有一時是屬於法國的。

在十五世紀，加泰隆人終於爲基督教的諸君主征服了，逐出最後的摩爾人，差不多也在同時。但在當時，加泰隆人還保存着代表機關。到一七一四年，西王腓力普五世把他們的代表機關取消了。到了十九世紀左右，他們的一切自由都被在卡斯提爾的京城瑪德里的專制主義褫奪殆盡了。

加泰隆人是永不會忘記的，也永不肯饒恕的，他們作着週期的努力，以求恢復獨立的地位。當里維拉獨裁的鉄血腳踐踏着加泰隆尼亞的泥土時，民族問題又開始重要起來了。現在它在革命的西班牙的逆風中，已成爲一個最重要的分子了。

加泰隆尼亞有四個省分，巴塞羅納（Gerona），勒黎達（Lerida），和塔拉哥那（

Tarragona) 人口有三百萬強。在巴利阿利羣島、在亞拉岡 (Aragon) 的各部，在伐朗西亞 的一角，都有加泰隆人住着。法國和西班牙兩國的加泰隆人統共有五百萬人。

經濟的不平等強調了區域的，和歷史的異點。君主政府從未把加泰隆尼亞抓得像其餘地方一樣的緊。工業遂有了較好的發展機會。在中世紀，加泰隆尼亞的主要城市巴塞羅納是一個和威尼斯一樣的商業城邦。商業資本已足夠擊退十七世紀以後的，封建凋落時期的衰弱勢力了。

巴塞羅納，加泰隆四省中最主要的一省，是全西班牙人口最密的省分。加泰隆尼亞的農產大約佔全國總生產的百分之二〇。巴塞羅納是全國最重要的海口，它處理着全國四分之一的貿易。

加泰隆尼亞最大的工業是紡織工業。全國總出品的百分之九〇是在這區域中生產的。這門工業約摸僱用着二十萬工人。它又生產着全國百分之五〇的化學品和百分之二〇的紙。

全國百分之二五的企業是在加泰隆尼亞的，然而，即使在這個最進步的工業區中，封建主

義的殘餘直到最近還是很強烈的。最可恨的「來倍卡瑪太」(rabacca morta) 就是一個加泰隆的機關。封建的土地佔有制度在加泰隆農民的身上要抽取很重的租稅。加泰隆的農民大多數是沒有土地的；同時土地都是最零碎的小塊。

加泰隆尼亞的工業發展說明了該區中無產階級的特殊重要。這裏的勞動運動和民族運動都強過其他各處。

加泰隆人要求自治的首次努力是在一八六八年發動的，當時巴塞羅納的議會專向「加泰隆」人發表了一篇宣言。當第一次民主政府宣佈成立時，加泰隆人是竭誠歡迎的，但是他們不久就醒悟過來了，原來民主政府並不就是他們的自治。一九一七年，加泰隆的諸議員在退出瑪德里的全國議會之後，另在巴塞羅納開了一次尾間議會。他們要求着更大的自治權，但是政府竟不加理睬。

一九一八年以前，加泰隆尼亞的民族運動是在大布爾喬亞的手中的。他們組成了一個區域同盟 (Regionalist League) 受着大資本家兼大地主坎波 (Francisco Cambó) 的領

導一九一八年，坎波担任了國王的大臣，這件事使許多地位較低的信徒都打破了迷夢，他們以前以為在反對着君主的。

此後，加泰隆民族運動就分成左右兩翼，坎波是右翼的領袖，麥西亞（Francisco Macia）上校是左翼的領袖，現在加泰隆左黨的領袖就是康配聶斯。

君主政府，教會，地主，和軍人會都反對和加泰隆運動妥協。社會的反動勢力也一致反對加泰隆人自治的志願。這個事實大大地逼迫着加泰隆左黨，和勞動運動日漸合作。勞動運動常對加泰隆人的願望表示同情，以達到他自己的目的。當一九三五年的鬭爭爆發時，加泰隆左黨就走到左翼民主黨和人民陣線的一邊，同時坎波的區域同盟擁護着法西斯派。

當里維拉當權時，加泰隆尼亞就立即遭災了。里維拉第一步手段是禁止學校，教堂和公共集會中使用加泰隆的文字。他壓制着將近三十家的巴塞羅納的報紙，解散了數百職業的和教育的機關。蒙特求克（Montjuich）監獄充滿着加泰隆的「訪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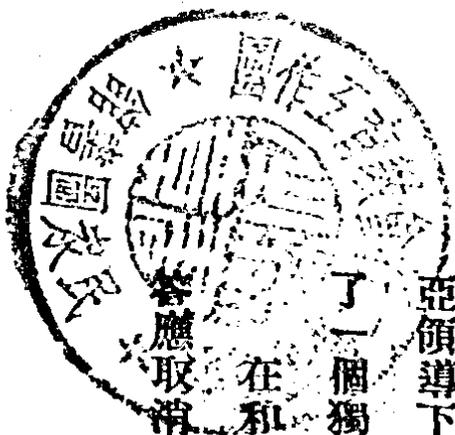
里維拉暴政的反動來了。一九二六年加泰隆左黨的領袖麥西亞上校領導了一次反對獨

裁的叛變。這次叛變很短命，只持久了三天。以後，在一九二六年，里爾市（Ciudad Real）的叛變中，巴塞羅納也有着牽連的。

這時候，加泰隆的民族主義者覺悟過來了。他們知道必須與民主派和勞動者聯合，以贏得本身的自治。這是一件自助助人的勾當。君主政體和獨裁，意思就是民族的壓制和社會的壓制。民主政體却顯示着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希望。這一點，當聖瑟罷士梯安公約簽訂時，是很顯明的。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七日，一切民主團體第一次聯成了聯合陣線，簽訂了聖瑟罷士梯安公約，以反對君主政府。這個公約就包含着加泰隆自治的條款。

民主政府終於成立了，加泰隆人經過了數百年的不耐和期待之後，要求自立政府了。麥西亞領導下的加泰隆左黨竟不及待儀式，在瑪德里民主政府成立的數小時之後，也宣布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加泰隆民主政府。麥西亞擔任了「加泰隆民主政府的總統。」

在和新總統柴摩拉談判了五天之後，麥西亞又動搖了。加泰隆左黨接受了讓步的條件。它答應取消獨立的民主政府，另立自治政府（Generalidad），和瑪德里政府在平等的條件下



聯成聯邦，但這也不過是臨時性質的。柴廉拉也有交換條件的。他答應先由加泰隆尼亞起草一個特種的加泰隆法案，再經過全民的審核，然後提到下屆的議會中儘先討論。

加泰隆法案按時草成了，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二日所舉行的全民投票中，又經過極大多數的贊同，十二天之後它已提到議會中去請求批准了。但議會是遲延而又遲延。直到一九三二年五月方才提付辯論，直到九月間方才宣告表決。

加泰隆法案規定加泰隆尼亞爲一西班牙國中的自治區域。這比君主政府已大有進步了，但它在聯邦的基礎上，否認着加泰隆的獨立。其他的條款使加泰隆文成爲全區的正式文字，但在和中央政府往來的文件中仍須用西班牙文。加泰隆自治政府由議會、總統和行政院組成。議會共有議員八十五名。總統由議會選舉。第一次的加泰隆議會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開幕的。

許多加泰隆人，尤其是極左派的加泰隆人，對這法案並不滿足。他們決定不放棄對政府的鬭爭，以求澈底的平等。他們痛斥政府是「卡斯提爾人的」。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這種不滿

終於表示出來了，當時加泰隆左黨參加着阿斯都里亞和各處的北方暴動，以反對勒樂和勞伯爾斯的集團。麥西亞上校已在一九三三年死了，加泰隆左黨和自治政府的繼起的新領袖就是康配聶斯。

加泰隆尼亞的暴動，在一夜之間，已被巴塞羅納的防軍司令巴塔脫 (Batet) 將軍擊成粉碎了。加泰隆的降服不單是由於軍人的反抗，加泰隆領袖的畏怯也很有關係。自治政府想不付代價，以推翻勒樂和勞伯爾斯的政府。它並不曾發過武裝工人的命令。加泰隆左黨的領袖實際上在各處都阻止着工人武裝的。如果他們像在一九三六年一樣的把工人武裝起來，一九三四年的暴動或許已有了成功的最好機會了。

勒樂和勞伯爾斯的政府對原有的法案，以及流產的康配聶斯暴動，都採取着廣大的報復手段。他們在「統一祖國」的口號下，反對着加泰蘭法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議會投票表決，把加泰隆法案無限期的延擱了起來。他們組織了一個加泰隆的臨時政府，并由瑪德里委任了一個總督。康配聶斯，我在以前已經說過了，被帶到法庭前受審，并被判處了三十年徒

。刑

加泰隆尼亞又回到殖民地的地位了，它甚至回到比里維拉獨裁下更可恥的地位了。民主政府的遺跡都被褫奪殆盡。槍桿統治是很跋扈的。甚至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選舉中，瑪德里政府竟發布法令，規定有選舉權的一切加泰隆人，須親身至警所登記。如果反動派在選舉中再得勝利，許多民族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共產黨員，社會黨員和無政府黨員的頭顱或許都已滾落了。結果，加泰隆的選民只有四分之一是服從登記法的。

人民陣線選舉的勝利解放了加泰隆尼亞，也像它解放了工農一樣。大赦令使康配聶斯和他的信徒恢復了自由，廣大的自治地位和德謨克拉西的權利都恢復過來了。

民主黨和社會黨的集團把很大限度的自治權給與加泰隆人。但它對待其他的兩個少數民族，巴斯克和加里西亞，却並沒有這樣的慷慨。

巴斯克佔有了四個省分，比斯開，基普士科（Guipuzcoa），阿伐拉（Alava）和那瓦拉（Navarra），共有人口一、三〇〇、〇〇〇人。在法國南部也有二十萬以上的巴斯克人。比

斯開是一個僅次於加泰隆尼亞的工業區域。

巴斯克的被征服也經過多次勇猛流血的鬥爭的。一八七五年以前，他們從未投入西班牙的軍隊。他們享受着一個特種的自治權，叫做「斐羅斯」(Fueros) 他們徵收着自己的賦稅，每年以一筆整款付給瑪德里。這樣過了一個很久的時間。

在巴斯克，教會的行動要比在加泰隆尼亞柔順，它並不和民族運動發生直接的衝突，反而扶助着民族運動。舉例來說，巴斯克的教士截留什一稅充作自己的經費而不充作中央教會的基金，這就表示了它的民族主義的堅信了。那是很好的勾當，也是很好的民族主義。

在這個區域中，有三個主要的政治團體，叫做：守舊黨 (Traditionalist) 或稱卡羅斯黨 (Carlists) 和左右翼的民族黨。在一九三六年的叛亂中，卡羅斯黨和右翼民族黨是維護巴斯派的。巴斯克左黨是幫助着人民陣線作戰的。

當一九三一年民主政府宣告成立時，加泰隆人是很活動的，但是巴斯克人却比較疎懶了一點。他們等待了十天，那時已經太遲了。話雖如此，民主社會兩黨的政府是答應他們自治的，可

是這個答應却從未實踐。

一九三四年十月，巴斯克的民族黨員是參加反對勒樂和勞伯爾斯政府的戰鬥的，尤其是爲了數月以前杉浦爾內閣曾向他們勒收重稅。巴斯克的民族黨員，小商人，工匠，工人和農民在城市中巷戰了兩天，在山區中野戰了兩星期。曾有一時，比斯開主要的礦區全部落入了反法西斯軍的手中。

民族問題在加里西亞也存在着的，雖然它不及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諸省的迫切。這個區域也有四省，科倫那（La Coruña），路哥（Lugo），亞蘭斯（Orense），和蓬梯斐特拉（Pontevedra），共有人口二、二七五、〇〇〇人。在葡萄牙也有加里西亞人，他們的語言很像葡萄牙語。封建的殘餘在這裏比在西班牙任何別處要強，工業一點沒有地位。加里西亞是以牛和麥著名的。它的土地畫分得很小——一個道地的例外。

在加利西亞和卡斯提爾之間是有着強烈的敵愾的。卡斯提爾的地主要想儘量提高他們小麥的市價，對進口的燕麥就建立了很高的稅則。加里西亞的農民是種着燕麥的，因爲他們的

牛必須喫燕麥，他們一面祇好買着高價的卡斯提爾小麥。

在一九三一年，加里西亞的民族主義者也草成了自治的要求，然而結果却一無所獲。但是，加泰隆和巴斯克叛變的高潮已使加里西亞問題活躍起來了。自治運動已在長成中了。

第十九章 勞動運動

在前世紀的中葉，西班牙的勞動運動和革命運動已經埋下深根了。

一八四〇年，規模狹小，目的空洞的勞動團體已開始出現。但是他們實際的力量和趨勢我們却確知得很少。一八六八年九月六日至十五日，國際工人協會在布魯塞爾開第三次大會，當時已有一個巴塞羅納的機器匠，安格羅拉 (Ansonia Marsal Anglora) 出席參加。這個國際，後來就成爲勞動社會主義(第二)國際和共產(第三)國際的直系先驅。它的主要人物就是馬克斯和恩格斯。

正在布魯塞爾大會的不多數月以前，偉大的無政府主義者兼大斯拉夫主義的使徒巴枯寧加入了第一國際。他想用「從內部攻穿」的手段，來奪取這個團體。巴枯寧在布魯塞爾會議中並不曾強請採用他的觀點，但是全個團體不久就成了一個戰場。馬克斯和恩格斯的社會主

義思想和巴枯甯的無政府主義觀念大戰起來了。

這兩派衝突的哲學在各國都互相爭逐，在西班牙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在西班牙有一個特點，就是巴枯甯的信徒竟佔了上手，無政府主義的早期的優勢已把西班牙勞動運動的路線全部畫定了。

第一國際在西班牙的基礎實際上是由一個巴枯甯的意籍信徒范納立（Jose Fanelli）所奠定的。一八六八年，范納立組成了國際的第一支部，共有會員二十一，人，並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瑪德里開始活動。不久，在瑪德里和巴塞羅納，更多的支部組織起來了。到一八七〇年左右，已有了一百五十三個小組和一萬五千個會員。

巴塞羅納在最初就成爲無政府派的大本營；那裏，會員的人數比馬克斯派控制下的瑪德里要多三倍。在一八七〇年以後的數年中，無政府派聲稱，在西班牙，他們靠得住的會員有五萬人至七萬人。

恩格斯本人擔任着西班牙的通訊秘書，但他好像也老早認識了巴枯甯派的優勢；一八七

○年二月，他在的一封信中寫着說：「意大利和西班牙，祇好讓給他（指巴枯甯）至少是在目前。」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傾覆之後，馬克斯的女婿拉法格（Paul Lafargue）逃亡到西班牙，那時，兩派的衝突已到達頂點了。拉法格看到國際受着無政府派的操縱，不久就實行了最後的試驗。在那年，西班牙就有了兩個團體，一個是馬克斯派的，另一個是無政府派的，雙方都自命為國際的正式代表。

在一八七二年的海牙大會中，巴枯甯派終於被國際開除了。西班牙的分部也就分裂，大多數的會員都歸到無政府派的一邊。出席海牙大會的五個西班牙代表中，有四個是無政府派。他們四人極力損害着證明文件，險些兒使第五個代表，拉法格，失去出席的資格。

巴枯甯立即就建立了自己的國際，西班牙支部無疑的成爲無政府的鍊條中的最堅強的一環。但無政府派却忽略了組織，他們不能很久的使運動在堅實的基礎上進行。一八八一年，他們改組爲國際工人協會的西班牙區工聯會，但是這個工聯會到一八八八年就解體了。

同時，社會主義的運動也進展得很慢，直到一八七九年五月二日，方才組成了一個工人社

會共和黨。它的傑出人材是意格里雪斯 (Pablo Iglesias)，是個印刷工人。社會主義派直到一八八八年，才創辦社會主義報 (El Socialista)，當作正式的機關報。第二年，社會主義影響下的總工會成立了。總工會開始只有三，〇〇〇會員；在一九〇〇年，加到二六，〇〇〇人；在一九一〇年，加到四二，〇〇〇人；在一九一五年，加到一一二，一九四人。

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早期的異點，到現在，在本質上仍舊存在的。無政府主義派反對着任何種類的政府，無論是資本家的政府，或是工人的政府，他們都不分軒輊的。在他們的目光中，這兩種政府是同樣地可責的。爲此理由，他們在一九三三年遂拒絕投票，一任勒樂和勞伯爾 斯的集團跳上政治舞台。

在經濟的領域中，無政府派是蔑視罷工手段，以達到部分的、直接的目的的。他們的理論，以爲工人所獲得的些微改良，足以減退他們求基本改革的鬪爭的勇氣。無政府派崇拜着總罷工，把它視爲萬應的靈藥。

早期的社會主義派是屬於經院式的改良主義學派的，他們以爲和平合法的逐漸改良，總

有一天會使工人獲得社會主義的。他們並不把政府視爲虛無的，因此參加着選舉競爭，這是他們和無政府派基本上的異點。他們的眼界着重於議會，他們並不看到，也並不擁護革命的鬥爭，以摧毀資本家的政府，而建立工人的政府，這是他們和以後的共產黨的異點。

在工會的領域中，無政府派所領導的勞動協會和社會主義的所領導的總工會互相競爭着。他們時常在戰略上和主義上起着衝突。社會主義派說無政府派是無望的不負責者，是危險的浪漫者。無政府派說社會主義派是犯罪的機會主義者，是左派中化裝的資本主義政治家。

一八九一年，社會黨提出了第一個候選人，得了五千選票。一九一〇年，意格里雪斯（Grigorakis）當選爲瑪德里選區的議員，這是要感謝和民主派的聯合的。一九一八年，社會黨推出了六個黨員，加入議會。

共產黨是最年幼的主要工人政黨。它是在一九二一年四月九日西班牙社會黨全國大會後組成的。社會黨在該次大會中投票表決和共產國際聯合的議案，反對的是八、八〇五票，贊成的是六、〇二五票。這是顯然的，在俄國革命的衝力之下，西班牙社會主義派中已有了一種

決定的左傾。在該次全國大會中，多數人主張擁護所謂維也納國際或稱第二半國際，但當數年後勞動社會主義（第二）國際復活時，它就加入第二國際了。

從一九二一年四月議會中分裂出來的少數派就組成了西班牙共產黨，成爲共產國際的西班牙支部。一九三三年，共產黨被里維拉的獨裁壓迫得成了一種完全非法的組織。只有社會黨是爲當局所容忍的，他們甚至受着里維拉的鼓勵。連當時傑出的社會黨員卡波斐羅也做着獨裁者的樞密院的委員。另一個社會黨的領袖蘭尼柴（Manuel Llaneza）做了政府的燃料委員會的委員。還有戈梅士（Triton Gomez）加入了鐵道部。

直到一九三一年，共產黨方才再在公開合法的活動中出現，當時他們反對着民主社會集團的活動，使他們獲得了半合法的地位。他們又患着內部的黨爭。直到一九三二至三三年，他們方才真的成爲統一的政黨。此後，他們在國事中遂演着重要的角色，現在那個角色已變成爲決定的主角了。

有幾個被共產黨隨時開除出去的團體，都設法成立了獨立的組織。安得烈斯甯（Andres

寧) 所領導的托洛斯基派和毛林 (Joaguin Maurin) 所領導的「右翼反對派」以前都比共產黨更有勢力。寧和毛林兩人最近都受過托洛斯基的痛斥。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以後，他們的勢力就很快的低落了。他們已聯合組成了馬克斯主義統一工黨 (P.O.U.M.) 勢力差不多僅限於加泰隆尼亞一區。

無政府派在一八六〇到一八八〇的一個時期中，已有了早期的發展。他們後來走到了一個窮境，直到法國的工團主義進入西班牙為止。無政府派和工團主義運動都是反對一切政府和政治活動的，他們遂自然地配合了起來。一九一〇年，工團主義派以無政府派做着組織的中心，組成了全國勞動協會 (O.N.T.)。一九二七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無政府運動合組了意卑里亞無政府同盟 (I.A.F.)。工團主義派和無政府派雖然仍舊存着各別的組織，但他們的黨員都是跨黨的。全國勞動協會的領袖，實際上都是無政府派。勞動協會的主力是在加泰隆尼亞，亞拉岡，安達盧西亞，伐朗西亞和亞利干的諸處。在一九三六年舉行的薩拉哥撒大會上，勞動協會宣稱共有六十萬會員。正在法西斯叛變以前，它公布的會員數目已增至七十萬人。它號稱

領導着一百萬工人，連許多無組織的工人在內。

總工會也有同樣數目的會員。它的組織力集中在新舊卡斯提爾，巴斯克和義斯德勒馬都拉諸地。一九三五年，社會黨所領導的總工會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勞動統一總同盟進行着合併。這個合併的團體。在無組織的工人中大大的增加了統一工會運動的力量。現在，聯合以後的總工會是受着共產黨和左翼社會黨的領導。

自一九三六年二月選舉以後，社共兩黨已進行着一種堅強的聯合運動，並且已獲得重要的成績。社共兩黨的青年運動已經合併為一個團體，並加入了少年共產國際。當法西斯叛亂爆發時，合併運動正在進行之中。合併的結果，使社共兩黨的青年團在會員數量上和勢力上都有了巨大的進步。二月選舉以前，社會主義青年團有會員二萬四千人，共產主義青年團有一萬四千人。在合併時，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到六萬五千人，共產主義青年團加到五萬零六百八十二人。在合併兩星期以後，這個新團體就有了十四萬會員。

加泰隆尼亞的社會黨，共產黨，和無產黨合組了一個團體，叫做加泰隆尼亞統一社會黨，并

加入了共產國際。這個合併的政黨已在發展，但它還比較無政府派薄弱。自一九三三年以來，社會主義運動和無政府主義運動也有了極大的轉變。

在一九三一到三三年的民主社會兩黨的集團政府失敗之後，社會黨的內部興起了一個左翼，不久就得了全黨的多數。社會黨左翼的傑出領袖就是卡波婁羅。有人說，只要他把列寧的著作早讀十年，全部無產階級的運動或許已得了無窮的利益了。

社會黨中也有右派和中派，右派的領袖是卑斯推羅 (Julian Beteiro)，一位論理學教授，中派的領袖是不里托。一九一五年在社會黨大會中提出擁護協約國的議案的，就是卑斯推羅。這議案以四、〇九〇票對一、二一八票宣告了否決。

不里托拉攏了卑斯推羅的右派。他現在做着社會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但是極大多數的下級幹部都是站在卡波婁羅的背後的。不里托對黨內的政治是審慎周詳的。他們原定一九三六年六月召集特別大會的。顯然，卡波婁羅已有了把黨部拿過來的必要力量。全國委員會在五個月間用了一個突然的巧計，把一切空位都安插了「安全」分子，並決定把大會延期至十月舉

行。不里托希望在那時已可一躍而爲內閣總理，或者已跳出了社會黨。卡波婁羅對這戰略提出了嚴重的抗議，并說它是不誠實。

無政府工團主義派已受到了一九三三年拒絕投票的懲罰。他們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暴動後，勢力大受損失，因爲他們主張一切勞動協會屬下的工會在戰鬪中消極。許多無政府派的領袖慢慢地轉變了傳統的地位，尤其是那個資格最老的，最有名的卑斯太那（Pestara）。同時工團派的下級幹部都決計參加下次的選舉，他們再不肯讓反動派在工人陣線的裂縫中進來。

問題已變成這樣的尖銳了，勞動協會的全國委員會遂不得不發一宣言，表明它以後對選舉的態度。這篇宣言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沙立代立代特奧勃里拉（Solidaridad Obrera）報上發表的。它辯正着一九三三年選舉中無政府派反政治政策的合理，並再肯定了勞動協會反對參加選舉的態度。宣言上說：「暴政和罪孽是同樣地應受罪責的，不論他們存在於紅黃色的君主旗下，或是在民主的三色旗下，或是甚至在無產階級獨裁的紅旗下。」

但當一九三六年二月選舉舉行時，千萬的無政府派都違反命令蜂擁到選舉場去投人民

陣線候選人的選票。勞伯爾斯也說，此次選舉的勝利，無政府派的投票也是一個原因。

勞動協會在一九三六年五月舉行的薩拉哥撒大會，更加重了無政府派的主義的轉變。卡波婁羅是演說者之一。他伸出了友誼的手，要求着工會的聯合。這也表示着卡波婁羅的轉趨激進，因為他已認識了聯合工團主義派共同行動的重要了。

在一九三六年戰爭正烈的時候，加泰隆尼亞的無政府黨，社會黨和共產黨合組了一個「聯合委員會」(Liaison Committee)，以求共同行動。無政府黨贊成這個步驟，就無異打破了孤立的傳統觀念，打破了對其他工人政黨的敵視。他們草成了一個合同，作為「聯合委員會」工作的基礎。這個文件可以決定西班牙未來的歷史。合同上說：

「為欲使工人反法西斯的革命行動更有效力，為欲補充和指導前月十九二十兩天戰爭中所造成的聯合趨勢，我們於本日成立了一個「聯合委員會」，其中有勞動協會的代表二人，總工會的代表二人，意卑里亞無政府同盟的代表一人，和統一社會黨的代表一人。

「第一：委員會的任務應當找出這些團體的共同點，並把他們提出討論，以求審定，然後把

審定的結果定爲適當的口號和訓令。

「委員會的成立並不限制各會員團體的個別性。

「任何議案在簽名的各團體討論通過之後，委員會就當督促各團體參加各種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等）的代表，一致執行。

「委員會規定每三星期舉行常會一次，但各會員團體認爲有必要時，當舉行特別會議。

「委員會向會員和會員團體提出勸告，在各工作所在地，應由勞動協會和總工會各按比例推出代表，以組織工廠委員會。

「工人有選擇加入勞動協會或總工會的自由，各工會不得干涉。委員會的成立就含蓄着這個相互的尊重。

「當委員會存在時，各會員團體同意屏除一切相互的攻擊和批評。互惠的批評必須出於完全的善意。

「委員會當致函報館，宣告成立，並把它的目的報告工人和一般的輿論。

「聯合委員會當把這個合同申詳到勞動協會的全國委員會和總工會的執行委員會，并教請把這合同推廣到全國各地。」

西班牙的共產黨有兩個主要人物：一個是總書記狄阿士，一個是女黨員伊拔勒里（Dolores Ibaruri）。狄阿士年紀還輕，生命的前面還有着最好的光陰。他的父親是一個麵包工人，他的母親是一個塞維爾的香烟工人。他於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到一九三二年就成了黨的領袖。他和卡波斐羅都是勞動運動中最堅強的人物。

伊拔勒里是以「熱情之花」（La Pasionaria）著稱的。她是一個礦工的女兒。年輕時，她曾在一個富戶家中當過使女，以後當過咖啡館的女招待員。她不會受過正式的教育。在十七歲那年就在比斯開加入了社會黨。她是個煽動的人物，能使聽眾騷動，也能使聽眾落淚。在一九三六年的戰爭期間，她每天到瓜達拉瑪前線去鼓勵兵士，作更大的努力。

西班牙的勞動運動已在獨裁和恐怖中鍛鍊了多年，它已用驚人的策略，克勝了許多挫折和阻礙。它的前途是光明無比的。

第二十章 結論

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內戰是近代最嚴重的社會衝突，在這次衝突中，反動團體和最有力特權階級，都被迫退到了最後的地位，他們除了訴諸武力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方法，來反對合法組成的政府了。在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掠取了國家的權力，並運用着國家的全部機構，以反對德謨克拉西的，革命的異己政黨。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勒樂和勞伯爾斯的時期中，也想看人學樣。它却失敗了。不久它就來不及了。

在這方面，西班牙已建立了一個重要的，或許也是劃時代的先例。德謨克拉西的政府能把一切擁護民主的，以及以反法西斯主義為主要目的的人們，團結在它的周圍。叛軍中法西斯爭權的特性，自然會使它失却民衆的擁護的。政府反抗優越的叛軍，如能獲得寸土，這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人民陣線正是爲了這樣的事變而組成的。依照它最幹練的發起人的說法，人民陣線是一個民主的，勞動的，和革命的各派勢力反對法西斯威脅的集團。以社會階級的術語說來，它就是中等階級和左派的工農運動，以及革命政黨的反法西斯同盟。在德國和意大利，左派已有過悲慘的經驗。他們知道中等階級在社會的衝突中並不是獨立的角色。在社會極度緊張的時候，中等階級不是和革命的左派同盟，便是和法西斯的右派同盟，不是和工人同盟，便是和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同盟。凡是法西斯主義獲勝的地方，總有一部分中等階級做着社會的儲藏庫，法西斯派可從那裏招募衝鋒隊和獲得民衆的助力。

人民陣線可選擇的道路是如此的明白。如果反法西斯的勢力分裂，極左派就要陷於孤立。彷徨未決的中等階級就會傾向到極右派的一邊，使法西斯派採取攻勢。如果人民陣線堅定不拔，法西斯主義要想掌權，除非先來一次毀滅的戰爭。

極左派（共產黨和社會黨）無論在叛變發動時，或在有意義的衝突時，絕未有過把民主政府改變爲無產階級獨裁的企圖。在第二次民主政府和法西斯威脅之間保持中立，就無異保

證了法西斯的勝利。二月以後的政府若無左派工人奮發的，堅決的，立時的擁護，是馬上就會崩潰的。反之，工人階級當然也沒有單獨獲勝的力量。除加泰隆尼亞以外，各處的產業工人在數量上都是極對的少數。單是一個在優良環境中的加泰隆尼亞是不能持久的。

工人階級的政府並不採用向法西斯派和民主派同時進攻的政策，因為這樣的政策，在結果上，是等於政治的自殺。實際上，法西斯派只好在各處造謠，以求擁護，尤其是在西屬摩洛哥。他們用謊話把摩爾人騙到本部作戰。他們說激進派已發動了反對立憲政府的叛變。在許多場合，常謠言為叛軍的新兵揭穿時，騷動和逃亡就會接踵而起的。

一切進步的勢力何以會一致團結在德謨克拉西的一邊呢？要瞭解這個問題，觀察一九三一年以後的環境是十分重要的。一九三一年的革命離成功很遠。民主社會兩黨的集團政府，在最初的兩年中，作了許多遠大的口頭諾言，但重要的具體事實却作成得很少。西班牙和歐洲其餘的國家比較起來，是如此的落後，竟連折中的改革也不可能。一九三一到三三年的政府不僅做得太少，而且也做得不澈底，這就是它的真實的罪狀。為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所做的事，若不

澈底，是決無效果的。從君主政體承襲過來的社會基石是太腐敗了，不足以構造德謨克拉西的上層建築。

勒樂和勞伯爾斯的「反革命」把這些黯淡的成就也都拋到垃圾桶中去了。死人已起來加害活人。雖然一九三六年二月間右派又被驅走，但到七月間就發生了亂事。其間相隔的時間太短促了，不能使一九三一年的憲法有澈底的更生。這個憲法是提供着一個和貴族，教士，以及半封建的過去時代截然劃分的可能性的。爲了這個憲法鬭爭，即使從極左派的觀點看來，也是很值得的。

人民陣線在內戰中團結得十分堅固，而且更加增強了。這不單是爲了消極的理由，同時也爲了積極的理由。在消極方面，他們認定，人民陣線的破裂無異爲法西斯的狂潮打開了社會的隄防。在積極方面，他們認定，必須以鬭爭來完成德謨克拉西的革命，來收取德謨克拉西革命的果實。

在內戰的烈火中，一定會有一個新式的西班牙鍛鍊出來的。法西斯的西班牙意思就是從

第二次民主政府的灰燼中，跳出了一個德意兩國的新盟友。像它的前任者一樣，它要把工會運動，無論是工團主義派的或馬克斯派的，打成粉碎，把民主黨和勞動黨逼成非法，使大多數人的公民自由成爲過去的陳迹。法國將受着納粹黨，西班牙法西斯派，以及大海的包圍。全世界的政治形態也必將改樣。

勝利的民主政府必然和過去的民主政府大不相同的，中等階級已不再有極右派的壓迫和影響了。這個事實就會使它更和左派接近。社會上最貧乏的，最微賤的階層當然利益最多。在鬭爭的初期，政府已沒收了附逆的貴族的財產，單以這一點而論，農民已可擺脫大地產的古代桎梏了。

勞動階級和革命政黨中將發生最大的改變。工人階級聯合的趨勢將成爲極度有力，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合併運動，即使在戰爭期中，仍奮十分起勁。共產黨所領導的工會和社會黨所領導的工會已經組了統一的總工會。社共兩黨的青年運動已經實行了組織上的聯合。加泰隆尼亞的社會黨和共產黨已經實行合併，這個最後的發展是和法西斯的叛變互相呼應的。

社共兩黨聯合的成功，還不能治愈勞動階級的分裂，因為西班牙有根深力強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存在。社共兩黨的聯合運動必須和統一工會運動的努力互相呼應起來，使總工會和勞動協會也合而為一。在這方面，已有了很大的成就，但待做的事還有許多。

實踐這些先決條件，打開了未來西班牙的，廣大革新的道路。共產黨和社會黨從未放棄過絲毫終極的目的，雖然他們的政策是基於現實中所固有的可能性的。對於這兩黨，只有一個生產社會化的完全新的社會秩序，才能使一九三六年的內戰勝利轉變為不變的社會主義的勝利。

在內戰的屠殺和毀滅中，一定會有一個新的西班牙出現的。不是法西斯主義的，殘酷橫暴的奴化統治，就是德謨克拉西勝利所能獲得的，自由進步的發展。

附 錄

各政黨表

左派

左翼民主黨：左翼小布爾喬亞的政黨；德謨克拉西的意識很強；反對法西斯；反對教士；主張進步的社會改革。

領袖：阿柴那 (Manuel Azana)。

民主聯合黨：略較左翼民主黨右傾。

領袖：波立奧斯 (Diego Martinez Barrios)

加泰隆左黨：社會政策和左翼民主黨相仿，但着重於加泰隆尼亞的自治。

領袖：康配聶斯 (Luis Companys)。

加里西亞同盟：社會政策和左翼民主黨相仿，但着重於加里西亞的自治；現已成為左翼民主黨的一部。

領袖：吉羅格 (Santiago Casares Quiroga)

社會黨：以打倒法西斯主義為目前的任務，但終極的目的是在建立生產社會化的集體政府。

領袖：卡波婁羅 (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 左派) 不里托 (Indalecio Prieto

中派) 和卑斯推羅 (Julian Besteiro 右派)

共產黨：以實踐德謨克拉西的民主為目前的任務，但終極的目的是在建立蘇維埃式的工農政府。

領袖：狄阿士 (Jose Diaz)

加泰隆尼亞統一社會黨 (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 簡稱 P.S.D.C.) 是加泰隆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混合體；是共產國際的支部。

領袖：康摩里拉 (Joan Comorera) 和范提士 (Miguel Valdes)。

渣卑里亞無政府同盟 (Federacion Anarquista Iberica 簡稱 F. A. I.) 主張「自由意志的共產主義」，反對一切政府的權力，對人民陣線的反對已逐漸薄弱了，尤其在下級幹部中。

領袖：寶路蒂 (Buenaventura Durruti) 奧立浮爾 (Juan Garcia Oliver) 和

柏斯塔那 (Angel Pastana)

馬克思統一工黨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on Marxista 簡稱 P. O. U. M.)

着重於反對共產黨；為共產黨除分子所領導；托洛斯基的影響很深；反對人民陣線。

領袖：寧 (Andres Nin) 和毛林 (Joaquin Maurin)

中派

急進黨：極右派的小布爾喬亞；法西斯黨的同盟者；強烈反對社會黨。

領袖：勒樂 (Alejandro Lerroux)。

保守黨：略較急進黨右傾贊助教會。

領袖：羅廉 (Miguel Mauva)。

自由共和黨：渺小的反動團體。

領袖：阿伐利士 (Melquiades Alvarez)。

右派

稱 O. E. D. A.) 西班牙自治諸右黨同盟 (Confederacion Espanola de Derechas Autonomas 簡稱 O. E. D. A.) 法西斯領導下的右派集團，成分從反動的民主派起到保王黨為止。

領袖：勞伯爾斯 (Jose Maria Gil Robles) 和索德羅 (Jose Calvo Sotelo) (已故)。

民衆行動黨：法西斯派；強烈贊助教會。

領袖：勞伯爾斯。

西班牙復興會：主張以法西斯的政制，恢復亞豐瓊十三世的王位。

領袖：哥科基 (Antonio Goicoechea) 和索德羅。

西班牙長槍會：納粹式的公開法西斯團體。

領袖：里維拉 (Jose Antonio Primo de Rivera，故獨裁者里維拉的兒子)。

卡羅斯黨 (Carlists) 是一八三三年卡羅斯 (Carlos) 的黨徒，贊助卡羅斯繼承非琅多

(Fernando) 七世的王位；反對亞豐瑣十三世；強烈贊助教會；十分反動。

巴斯克國民黨：主張巴斯克自治；強烈贊助教會；十分反動；有卡羅斯黨的傾向。

領袖：賀倫 (Jose Horn)

加泰隆區域同盟：保守性和區域觀念很強；反對加泰隆左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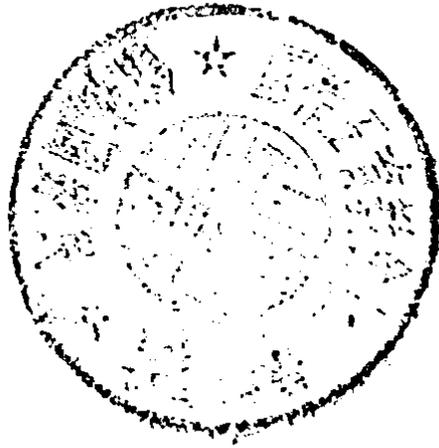
領袖：坎波 (Francisco Cambó) 和開多沙 (Juan Ventosa)

工會

總工會 (Un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簡稱 U.G.T.) 為社會黨左派和共產

黨所領導。

勞動協會 (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 Trabajo 簡稱 O. N. T.) 爲無政府工團主義派所領導。





動亂中的西班牙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實價國幣五角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發行

版權所有

譯者 王 厂 青

發行者 郭 激

不准翻印

印刷者 上海天馬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永甯里 上海天馬書店

分發行所 各省特約所各大書坊

